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2013年12月号

金融与发展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论贸易

对纽约大学商学院院长

彼得·亨利的采访

保罗·科利尔论管理预期

驶向未知

全球贸易
的不确定性之路





Jeffrey Hayden

主编

Marina Primorac

责任编辑

Khaled Abdel-Kader Natalie Ramírez-Djumena

Jacqueline Deslauriers James L. Rowe, Jr.

Hyun-Sung Khang Simon Willson

高级编辑

Glenn Gottselig

网络编辑

Maureen Burke Lika Gueye

助理编辑

Lijun Li

印制/网络产品专员

Sara Haddad

媒体经理

Aissata Sidibe

高级编辑助理

Melinda Weir Jeamine Yoo

编辑助理

Luisa Menjivar

创意主管

Catherine Cho Kenneth Nakagawa

Michelle Martin

美术设计

编辑顾问

Bas Bakker Laura Kodres

Helge Berger Paolo Mauro

Tim Callen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Paul Cashin Paul Mills

Adrienne Cheasty Martin Muhleisen

Alfredo Cuevas Laura Papi

Domenico Fanizza Uma Ramakrishnan

James Gordon Abdelhak Senhadji

Thomas Helbling Janet Stotsky

欲知广告事宜，请与IMF出版部联系。

地址：700 Nineteen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7430

传真：(202)623-7201

电子邮件：publications@imf.org

© 版权所有，IMF 2013年。翻印本刊文章

应向主编提出申请。地址：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8300

传真：(202)623-6149

网址：http://www.imf.org/fandd

本刊对非经济目的的翻印一般会迅速

免费予准。

本刊的文章及其他材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

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中文版由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翻译出版。

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电话：88190916

传真：88190916

邮政编码：100142

网址：http://www.cfeph.cn

中文版刊号：ISSN 0256-25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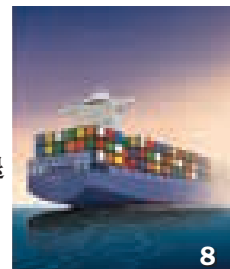


特辑

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之路

8 新体系的黎明

一位著名贸易经济学家担心，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着退化的一系列区域贸易协定的危险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



14 全球银行业重组

全球金融危机促使加强对国际金融服务业，尤其是国际银行业风险与利益审慎监管的程度
斯蒂恩·克雷森斯、胡安·A. 马尔凯蒂

18 智力贸易

从经济角度审视21世纪知识产权的跨国流动
蒂埃里·维迪尔



22 附加价值

公司将产品生产和服务提供分散在许多国家，从而形成供应链并借此降低总体成本
伯纳德·霍克曼

本期还有

25 谁让基尼系数飙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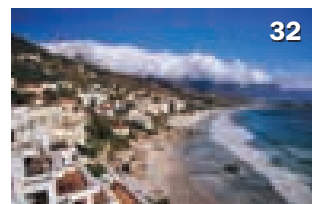
资本账户自由化和财政整顿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加剧了收入差距
大卫·福尔切里、普拉卡什·洛嘉尼

28 致命弱点

收入不平等制约亚洲续写增长奇迹
拉维·巴拉里斯南、查德·斯坦伯格、司马喆

32 公正的评估

财产税是一种减少不平等的有效但不受欢迎的方式
约翰·诺雷加尔



38 新货币

启用新货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土库曼斯坦取得了成功
阿克·隆纳博格

44 透明度至关重要

国家透明程度越高，抵抗全球金融形势波动的能力就越强
路易斯·布兰多-马奎斯、加斯顿·杰罗斯、娜塔莉·梅尔加

47 选举与波动

低收入国家通常在大选前会出现政府支出扩张，而大选结束后则会出现财政紧缩
克里斯汀·艾柏科、迪兰·奥尔可



50 压力之下

对资源开发进行良好的管理需要公民和政府树立正确的认识
保罗·科利尔

其他内容

2 简讯

4 经济学人物

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莫林·伯克对彼得·布莱尔·亨利的采访



36 图表释义

全球房价节节攀升

房地产市场正在复苏，然而很多国家的房价仍然过高

海茨·阿希尔、普拉卡什·洛嘉尼

42 回归基础

什么是价格？

或许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答案可能因交易不同而有所变化

伊雷娜·艾斯门德逊

54 书评

《大逃亡：健康、财富以及不平等现象的起源》，安格斯·狄顿

《垃圾星球：行走在价值10亿美元的垃圾贸易之间》，亚当·敏特

《大众的繁荣：草根创新如何创造就业、带来挑战和变革》，埃德蒙·费尔普斯

57 索引

插图：封面、第8—9页，Michael Gibbs；第18—21页，Randy Lyhus；第36—37页，Michelle Martin/IMF；iStockphoto.com；第38页，Tom Wood/IMF；第47页，Randy Lyhus。

摄影：第2页，Ton Koene, Inc/Visuals Unlimited/Corbis；Samuel Aranda/Corbis；Hervé Hughes/Hemis/Corbis；第3页，Hanan Isachar/Corbis；Adam Wiseman/Corbis；第4页，Michael Spilotro/IMF；第10—11页，David Lawrence/Corbis；第14页，Martin Zabala/Xinhua/ZUMA Press；第22页，Susana Gonzalez/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第25页，Janine Wiedel/Photolibrary/Alamy；第28页，Dinodia/Corbis；第33—34页，Richard T. Nowitz/Corbis；第38页，Tom Wood/IMF；第44页，Soeren Stache/DPA/ZUMAPRESS.com；第50页，Reuters/Corbis；第52页，Karin Duthie/Alamy；第54—56页，Michael Spilotro/IMF。

本刊在线阅读网址：www.imf.org/fandd

浏览《金融与发展》的Facebook：
www.facebook.com/FinanceandDevelopment。

狂热甲壳虫

我第一次见到大众的甲壳虫汽车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当时我的邻居把一辆黄色的甲壳虫汽车停在路边。在那时，纽约西部的路上随处可见来自底特律的美式肌肉车，因此这辆来自德国沃尔夫斯堡的、有着后置引擎且行李箱前置的小车引起了大伙儿的注意。

我当时年纪不大，也没有意识到全球贸易正在改变着美国汽车市场。体型更小、更节能的汽车很快就从底特律手中抢到不少市场份额，而这些车完全是在德国和日本生产，并被运来美国的。大众甲壳虫汽车便是这个时代的标志，托全球贸易的福，它在各地兴起。

时间来到2013年8月。我在西雅图—塔科马机场租了一辆黑色的“新甲壳虫”。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汽车现在的设计更符合空气动力学且外观更好看。但这还不是新老甲壳虫汽车的唯一不同。新甲壳虫和如今其他大多数汽车一样，都是全球集成供应链的产物，其各个部件由位于十几个不同国家的上百家供应商生产，并被“及时”运到工厂进行最后的组装。

正如伯纳德·霍克曼(Bernard Hoekman)在本期《金融与发展》“附加价值”一文中所阐述的，全球供应链是当今全球贸易中最有力和有前途的一股力量，它为那些更贫困的国家参与到这个全球工厂当中提供了新的机遇。

如何推动全球供应链的扩张仅是本期《金融与发展》中的一个内容，我们关注全球贸易的未来。此外，本期内容还包括金融服务贸易，斯蒂恩·克雷森斯(Stijn Claessens)和胡安·马尔凯蒂(Juan Marchetti)阐述了全球金融危机是如何影响国际银行业和金融服务业的。蒂埃里·维迪尔(Thierry Verdier)关注了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政府是如何规范知识产权的创新、传播以及跨国流动。

当然，知识产权的跨国流动与商品和服务一样，都要遵循多边“游戏规则”，这些规则是各国间进行的全球贸易谈判的产物。著名的贸易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介绍了最新的多边协商，并就多边主义提供了热烈的讨论。

此外，莫林·伯克(Maureen Burke)采访了纽约大学商学院最年轻的院长彼得·布莱尔·亨利(Peter Blair Henry)，后者有关债务减免的研究对于传统智慧而言是一个巨大挑战。本期的其他文章还关注了亚洲的不平等问题；透明度；金融冲击的传导；面对自然资源繁荣时，如何管理民众的预期；大选前的财政政策；以及一国的货币改革。

一直以来，我们旨在提供有关全球经济发展的那些吸引人的、发人深思的报道。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听到读者对《金融与发展》的看法。你可以通过写信、电子邮件或者Facebook(www.Facebook.com/FinanceandDevelopment)告诉我们你的观点。

杰弗里·海登
(Jeffrey Hayden)

主编



阿富汗儿童捡拾可回收垃圾来换钱。

贫困儿童太多了

在过去 30 年中，全世界的极端贫困人口总数急剧下降。然而，根据世界银行一项新的报告《贫困现状》(The State of the Poor)，在 2010 年仍有约 4 亿儿童生

活在极度糟糕的环境当中，大约占极端贫困人口 1/3。该报告对全球最贫困人口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报告称，与 1981 年相比，2010 年处于极端贫困（即每天生活费不足 1.25 美元）状态的人口减少了 7.21 亿。但报告还得出结论，极端贫困人口中儿童所占比例高：2010 年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中有 1/3 是儿童，而仅有 1/5 生活在贫困线以上。在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更低，有一半的儿童处于极端贫困。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考什克·巴苏 (Kaushik Basu) 表示：“超过 4 亿儿童处于极端贫困，并且他们比成人更可能处于贫困状态，这令人感到不安，因为这会加剧童工问题并产生代际贫困陷阱。”

极端贫困率在所有地区都已下降，但全球 35 个低收入国家——其中 26 个位于非洲——的极端贫困人口比 30 年前多了 1 亿。



也门萨那老城。

加入俱乐部

也门 13 年来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努力将以其在明年年初正式成为这个全球性的贸易俱乐部中的一员而画上圆满的句号。

也门入世工作组的成员在 9 月 26 日同意了也门成为 WTO 成员国的条款。这一入世一揽子文件将提交于 12 月 3—6 日在巴厘岛举行的部长级会议，由部长们进行正式的决定。这也给也门提供了 3 个月的时间，以批准该一揽子文件。

也门于 2000 年 4 月第一次提出加入 WTO。它将成为 WTO 的第 160 个成员国。

入世对于这个正在挣扎着摆脱困境的国家来说是一剂强心针。2011 年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使得国家动乱，迫使总统下台，并将也门推到了内战的边缘，同时对本已不景气的经济带来巨大打击。

总部位于日内瓦的 WTO，其成员国都要遵守全球贸易规则。成为该组织的一员，将有助于增强对这个贫困经济体的信心。

粮食形势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最新的季报《作物前景与粮食形势》(Crop Prospects and Food Situation report)，2013—2014 年销售季的谷物供给将超出 2012 年水平的 8%，尽管这一数据已因全球谷物产量和期末存货的预测而被调低。

27.44 亿吨，这是 FAO 目前对 2013 年全球谷物产量的预测，比 9 月份报告的数据略有下降（下降了 300 万吨），这主要是因为恶劣天气导致南美洲的小麦收成预期较差。

该报告预计今年的全球谷物产量将高出 2012 年水平的 8%，主要是因为粗粮产出预计会上涨 11%，达到约 14.2 亿吨。

美国，全世界最大的玉米生产国，其产量预计将达到 3.84 亿吨，比前一年因干旱而导致减产时的水平高出 27%，占据全世界产量增长的大部分。

该报告还强调了粮食不安全的热点地区：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朝鲜、马里北部地区以及叙利亚。



秘鲁谷物丰收。



爪哇海的石油平台。

强大的能源需求

亚洲开发银行（ADB）一项新的综合研究称，跨境电力交易将在满足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激增的电力需求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未来 20 年内，该地区的电力需求增长将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区。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能源展望》（Energy Outlook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指出，化石燃料在未来 20 年仍将占据能源结构的主导地位，煤炭需求将增加 50% 以上，每年增长近 2%，这是由于在各国寻找低成本能源，以实现供应来源多样化的过程中，中国是主要的煤炭消耗国，而东南亚国家的煤炭需求也有所上升。

石油需求也将以每年 2% 的速度增长，其中交通运

2014年大记事

- 1 月 22—25 日，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 4 月 11—13 日，美国华盛顿特区 IMF 和世界银行春季年会
- 5 月 2—5 日，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亚洲开发银行年会
- 5 月 19—23 日，卢旺达基加利非洲开发银行年会
- 5 月 29—30 日，莫桑比克马普托非洲崛起会议，由莫桑比克政府和 IMF 主办
- 6 月 4—5 日，俄罗斯索契八国集团峰会

输行业的增长最快，因为刚富裕起来的南亚人购买机动车的需求不断增加。另外，由于天然气对环境的影响较小且易于使用，对其的需求增长速度更快，每年将增长 4%。

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带来了定价、能源安全和环境问题，到 2035 年，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翻一番，占世界总排放量的一半以上。ADB 基础设施和公私合作特别高级顾问钱德尔（S. Chander）表示：“单个国家无法满足其庞大的电力需求，因此该地区必须加快电力和天然气网的跨境互联，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利用剩余能源。”

骑车出行

在一项有关拉丁美洲自行车使用计划的新研究所调查的 11 个城市中，有 6 个已经或准备推出公共自行车计划，该地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这 6 个城市是墨西哥城、利马、布伊诺斯艾利斯、波哥大、蒙得维的亚以及昆卡。

泛美开发银行与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美利坚大学的一个学生小组合作，对该地区最大的几个城市的自行车友好型基础设施的范围、政策以及行动主义进行调查。

在这些样本城市，有 0.4%—10% 的人口将自行车作为出行工具的首选。在中等城市，每天的自行车出行总数平均为 2000—48000。而在该地区的大城市中，每天平均在 84000—100 万，其中墨西哥城最多。

名为《自行车城市 2013》（biciudades 2013）的研究发现，尽管城市中的自行车基础设施有限，但



墨西哥城的公共自行车。

其正在努力增加这种设施。然而，公众对于自行车的意见不一。在很多人赞美自行车的优点的同时，不少人将自行车视为低等社会经济地位的象征，并且还存在着对安全问题及被盗的担心。

研究指出，一股日益增长的强大的力量在社区层面推动着，以使城市变得更加自行车友好。

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莫林·伯克 对彼得·布莱尔·亨利的采访



彼得·布莱尔·亨利（Peter Blair Henry）出生于牙买加。小时候，他经常看到一个邻近地区的女人不时来到他祖母的门前讨要食物。他对此感到很困惑，想知道为何自己家总有足够的食物，而这个头发蓬乱、肚子肿胀的女人却没有。

几年之后，当亨利与他的父母移民美国，在生活舒适的芝加哥威尔梅特（Wilmette）郊区定居时，他所看到的贫富差距更加明显。仅仅看周围人的财富状况，九岁的亨利就对美国人的富裕程度大大超过家乡牙买加人这一事实大为震惊。自此以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为何国与国之间的生活水平存在差异以及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就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亨利如是说。

从生活在牙买加农村的少年到最终成为位于纽约市中心的纽约大学（NYU）斯特恩商学院的院长，亨利走过了很长一段路。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早晨，亨利从对面华盛顿广场公园的街道走进纽约大学的亨利·考夫曼管理中心（Henry Kaufman Management Center），先后与碰到的保安、学生和教授亲切地打招呼。然后，他穿过大厅，没有坐电梯，而是从楼梯走到他的办公室——总共 10 层。

制度与政策

亨利现年 44 岁，作为斯特恩商学院 113 年发展史上最年轻的院长，他将其绝大部分的职业生涯用来研究经济改革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生活的影响。他的研究有时会对传统的经济理念提出质疑，无论是在债务免除、国际资本流动，还是经济增长中制度的作用等方面。

亨利与康拉德·米勒（Conrad Miller）2009 年合著的研究论文《制度与政策：双岛记》（Institutions versus Policies: A Tale of Two Islands）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

该项研究对巴巴多斯和牙买加两个岛国截然不同的经济成就按年代顺序进行了梳理。“读者很可能会将

本论文当作是对两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岛国进行的描述，认为这两个岛国更为有名的是其海滩、音乐和奥运短跑冠军，而非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亨利和米勒写道：“不过，我们认为人们完全可以从这个加勒比海奇迹中汲取到很多重要的经验教训。”

“双岛记”一开始就对“制度在一国的发展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假说提出了反驳。该理论是由戴龙·埃斯莫格卢（Daron Acemoglu）、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和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等经济学家在 2000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认为经济繁荣是由激励措施造就的，而激励措施是由制度决定的。2012 年，埃斯莫格卢和罗宾逊在其广受赞誉的、名为《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利、富裕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

不过，当时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工作的亨利和米勒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部分国家富裕而其他国家贫穷的决定性因素是政策，而非制度、地理或文化因素。在对巴巴多斯和牙买加两个岛国（两个国家此前均为英国殖民地，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方面几乎完全相同）进行对比后，他们认为这两个国家如今的生活水平之所以存在显著的差异源自其他因素，即政府选择的经济政策。

20 世纪 60 年代初宣布独立以后的 40 年间，牙买加和巴巴多斯这两个英国前殖民地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牙买加政府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期间出现了巨大的预算赤字，限制国际贸易的发展并对经济进行大量干预。相反，巴巴多斯的财政赤字较小、最大限度控制国有制经济，并且实行开放市场的政策。

其结果也显著不同。1960 年，巴巴多斯和牙买加的人均实际收入分别为 3395 美元和 2208 美元，相差不大。如今，这种状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巴巴多斯的富裕程度明显超过牙买加，其人均收入达到 15198 美元，远远超过牙买加 5358 美元的人均收入。

“当然，亨利和米勒是对的，我们应该注意宏观经济政策的单独影响，”埃斯莫格卢和罗宾逊在近来发表的博客中写道：“不过，经济政策不会无缘无故地出现。这些政策是由政府和政治家们选择做出的，而他们的动机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因此，他们认为那种声称导致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经济繁荣状况存在显著差异的因素是政策而非制度的论点并不具有说服力。

尽管并非所有的人都认可亨利和米勒的观点，但很多人认为其研究成果很有意思，因为他们的研究是对决定经济发展成功与否的因素所开展的近似自然的实验。

“没有百万富翁的栖身之地”

亨利在牙买加度过了生命最初的八年时间，因此“双岛记”对他来说有着特殊的含义。“我记得，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听过迈克尔·曼利（Michael Manley）的讲话，”亨利回忆道。曼利是牙买加前总理，在亨利当初看来，他是一位很有才华和富有同情心的领导人，他希望改善所有人，特别是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

“然而，曼利所采取的政策完全不利于市场的发展，并最终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他推出的一系列经济试验使牙买加负债累累，并导致牙买加经济连续八年陷入极度萎缩之中，”亨利解释道。

在1977年的一次讲话中，曼利宣称“牙买加没有百万富翁的栖身之地。如果你想成为百万富翁，那就去迈阿密吧，每天都有五次航班飞向那里。”亨利表示，这被视为对商业的公开抨击。

当时很多牙买加人相信曼利会说到做到，这其中包括亨利的父母。尽管亨利的父母（他的父亲是药剂师，母亲是植物学家）并不希望成为百万富翁，但他们认为在曼利统治下的牙买加将越来越难以得到发展，于是他们与彼得及其三个年幼的兄弟姐妹迁至靠近芝加哥的地方居住。

走出安逸状态

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C）求学时，亨利对经济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他看来，经济学似乎为他提供了一个将其对数学、科学和解决问题的喜好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兴趣融为一体的最佳途径。

在此期间，亨利参加了莫尔黑德奖学金计划（现名为莫尔黑德—凯恩奖学金计划，Morehead-Cain Scholarship）。这是一个为期四年的针对UNC学生的奖学金计划。该计划受到著名的罗德奖学金计划（Rhodes Scholarship）的启发，主要基于学生的人格力量、学术成就、身体活力和领导能力，为精心挑选出来的优秀

学生提供奖学金。

莫尔黑德奖学金计划包括一个暑期强化项目，参与者可以到除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地方开展全资助工作或学习。在其母亲的鼓励下，亨利申请并成功获得了担任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一名教授的研究助理的工作。当时该名教授正负责对自由经济区在苏联经济解体前几年所发挥的作用进行研究。1991年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亨利回到牛津大学并获得罗德奖学金，开始进修第二个学位——数学。

“获得罗德奖学金的经历是我走出安逸状态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亨利回忆道。

在习惯了美国大学生忙碌的作息时间表后，亨利发现牛津大学的生活节奏完全不同。当时手机尚未普

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商业在社会中的作用。

及，很多学生甚至没有固定电话。学生间的主要沟通方式是“信鸽传书”，这是一种老式的通信方式，由大学的邮递员在校园人工传递信件。牛津大学的节奏“迫使我放慢步伐，读取另一个学位，这让我有机会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亨利说。

随后，亨利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开始其经济学博士课程。此前，当他仍在UNC求学时获得了MIT延期入学的许可。MIT的学习堪称又一个暑期研究经历，在此亨利确定了其博士论文题目，并可能对他最终步入商业教育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影响。

当时，亨利询问MIT教授鲁迪格·多恩布什（Rüdiger Dornbusch，已故）自己是否可以帮助其开展一项有关20世纪80年代席卷拉美的债务危机的暑期研究项目。然而，多恩布什建议亨利到时任东加勒比中央银行行长的德怀特·温纳（K. Dwight Venner）那里工作，获得部分实际工作经验。当时，温纳正寻求在东加勒比海地区建立长期资本市场，以避免困扰智利和阿根廷等国的各种问题。在获得少量的津贴和住所后，亨利在1994年夏季前往圣基茨岛。此后，他为温纳撰写的文章最终成为“东加勒比海货币联盟”（the Eastern Caribbean Currency Union）首个证券交易所理论基础的组成部分。

这一经历让亨利更多地思考资本市场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新兴市场经济体是否应该将其资本市场面向境外投资者开放？开放的后果是什么？——这会导致资本成本如经济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下降吗？这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在亨利1997年的博士论文中，他利用来自拉美和亚洲地区大型新兴市场的数据对上述问题集中进行了探讨。

蚂蚁和蚱蜢

如今，亨利仍对新兴市场的发展很感兴趣，这也是他在今年3月份出版的第一本专著《转向：第三世界提供给第一世界经济的增长的经验教训》(Turnaround: Third World Lessons for First World Growth)中探讨的主题。该书的前提是，此前的很多“第三世界”现已成功完成历史性的经济转向，成为目前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兴市场。

“对于我来说，(第三世界)在30年的经济改革中实现了这一转向，这一点似乎很重要。第三世界的经济改革是由第一世界国家所推动的，而现在第一世界国家正面临各种危机的困扰，但这些国家的政府似乎不愿采取针对自身的对策，”亨利在接受《福布斯》杂志记者丹·斯柯伯尔(Dan Schawbel)的采访时如是表示。

亨利在《转向》一书中使用有关股价、GDP和通胀的数据表明，新兴市场可以通过采纳三大原则实现巨大的经济成功，这三大原则分别是：自律——持续致力于务实、审慎和灵活的增长战略，重视有利于整个国家而非某些个人或利益集团的举措；清晰——国家领导人明确承诺改变政策方向；信任——如公民及其政府之间或者国与国之间保持相互信任。

为了阐释他所说的“自律”(discipline)的含义，亨利提到《伊索寓言》中“蚂蚁和蚱蜢”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蚱蜢在气候温暖的季节放声歌唱，而蚂蚁则为冬天储藏食物。当寒冬来临时，蚱蜢便觉得饥饿难当，只好向蚂蚁乞讨食物。

亨利说，现在的美国就好比发达经济体中的一只蚱蜢。在经济繁荣时代，当美国出现财政盈余时，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2001年决定以减税的形式来派发这些盈余，而非存储这些财政盈余。当美国在2008—2009年出现金融危机时，政府就没有了可用来缓解危机冲击的资金。

另一方面，智利则可被视为新兴市场中的一只蚂蚁。在安德列斯·贝拉斯科(Andrés Velasco)2006年成为智利财政部长后，随着铜价的不断上涨，智利的财政收入暴增。尽管面临民众的反对意见，贝拉斯科仍成功地抵御住了花费这笔意外之财的冲动。他的未雨绸缪的策略终于得到回报。当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时，智利政府因为拥有必要的财政资金，在2009年为智利公民提供了总价值40亿美元的税收减免，从而成功化解了金融危机的影响。

“如果我们拥有谦卑之心，注意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这些经验教训，那么所有国家的未来发展就将更加繁荣昌盛，”亨利表示。

在过去20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目前这些经济体的GDP总值占世界GDP总值(按购买力计算)的一半以上，而1990年的这一

债务免除：福兮祸兮？

在学生时代，亨利一度坚信免除贫困国家的债务是一个不错的建议。然而，当开展了实证研究后，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在研究中，亨利开始了解免除债务是否能够真正刺激高负债国的经济增长。一种观点认为，过多的外债会阻碍一国的投资，高负债水平意味着未来的高税率——这是因为要偿还债务必须增加税收收入。亨利对这一观点非常了解。这种“债务积压”(debt overhang)理论认为，免除一国的债务可以产生更多的投资和更高的增长率，为该国带来积极的影响。

亨利研究相关数据后发现，对于中等收入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被免除银行债务的拉美发展中经济体——债务免除确实为其带来了价值。

然而，那些此后根据IMF—世界银行“重债穷国倡议”的规定免除其债务的低等收入国家未能建立大量的私人资本市场。因此，亨利发现免除这些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并未促进其经济增长。与拉美地区的中等收入国家所不同的是，贫困国家所面临的主要经济困难并非是债务积压，而是缺乏可以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和增长奠定基础的基本的经济基础设施。

因此，此类债务免除计划对贫困国家不会有大的帮助，相反还可能给它们带来坏处。亨利指出：“增加资源是解决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免除债务并不会导致贫困国家所获得的净资源的增加。”在此情况下，多边机构减少了向这些贫困国家提供的等额的总援助包。因此，债务免除实际会导致双边援助的增加。不过，亨利认为由于多边援助往往是政治上推动的，因而多边援助的效果通常超过双边援助的效果。

亨利因为他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而饱受批评。不过他说：“如果我们想真心帮助那些国家采取有效的行动，而不是让我们自己感觉良好的行动，”我们就应重视实证研究。

比例不到1/3。此外，根据IMF在2012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这些经济体在过去十年间的表现非常出色，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首次在经济方面超过了发达经济体，而在经济衰退方面少于发达经济体。

不过，也有迹象表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势头已接近尾声。IMF指出，这些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在2010—2011年期间下降了1.5个百分点，而发达经济体的增长率则开始加快。

此外，部分新兴经济体近几个月开始出现市场动荡状况。巴西、印度、印尼、南非和土耳其(即摩根士丹利所称的“脆弱五国”)的货币汇率在2013年5—8月期间下降了13%—23%，可能存在发生货币危机的风险。尽管部分市场动荡来自于周期性因素，但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国家巨大的经常项目赤字、高通胀率和企业及家庭高杠杆率等问题令人担忧，并认为这可能是由不良政策导致的。

那么，近来的发展动向是否证明了亨利的观点是

错误的？不，亨利说，“必须把经济周期与发展趋势两者区分开来。”

“近几周来的金融文章称，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经济正在下滑，而发达经济体开始回升。这是一种零和博弈，某种程度上是霸权主义世界，我想这是一种错误的思考方式，”亨利谨慎说道，“实际上，新兴市场的增长有利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

“新兴经济体在过去20年间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来之不易的改革，”他补充道，但同时承认新兴经济体仍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为新兴市场争取更大的发言权

“彼得确实对有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做了很多的思考，从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一直如此，”IMF经济学家塞肯·阿斯兰纳普（Serkan Arslanalp）说。他在MIT时就师从亨利，此后在斯坦福商学院也是如此。亨利的生活背景影响了他的学术生涯——有时甚至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见专栏）。“我虽然出生在牙买加，但在世界一流的著名学府接受教育，现在又在这里工作，因为我认为我拥有一个独特的双重视角，”亨利这样告诉《福布斯》的记者。

可能正是因为他所具有的这一独特的视角，2009年，当时的美国候任总统奥巴马邀请他率领一个过渡团队，负责研究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情况。

当时，亨利强烈主张新兴市场应在IMF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现在依然如此。为适应全球经济的变化，部分投票权从发达欧洲经济体转让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举措，亨利说：“新兴经济体所取得的进展得到认可，这一点非常重要。”（2010年，20国集团通过了IMF的配额改革，批准了这一转让。但截至本文付梓之时，该项改革仍未获得IMF最大的股东——美国的正式批准）。

当奥巴马总统邀请亨利担此重任时，他正担任斯坦福商学院全球商业与经济研究中心国际经济学松下幸之助教授兼该中心副主任。早在12年前，还是初出茅庐的博士生时，亨利就曾在该中心学习工作过。

此时，纽约大学又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老实说，我从未想过我会离开斯坦福，”亨利说，同时表达了对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和约翰·泰勒（John Taylor）等斯坦福同事的感激之情。亨利说，是他们鼓励我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过，新的机会实在是太诱人了。于是，他和妻子丽莎及四个年幼的儿子举家迁往纽约。丽莎是儿童精神病学家，毕业于耶鲁大学。

亨利说：“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是一个伟大的商学院，拥有更加伟大的抱负，同时拥有一个世界一流的教师队伍，他们在金融危机期间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种感受是双向的。“一段时期后，我们都能看出（商学院）院长选拔委员会的决定了。我很少看到有其他候选人对院长这一职位如此有把握并如此期望获得这一职位，”纽约大学校长约翰·塞克斯顿（John Sexton）在2009年的讲话中如此评论亨利：“当我真正见到他时，这一切马上明朗了：（他是）一位杰出的、极富创造性的经济学者、与生俱来的领导者和社区创建者，无疑也是一位正直的人。”

做得好和做好事

亨利说，自2010年1月加入纽约大学后，他就对该大学最近的国际化扩张进程很感兴趣。2010年纽约大学在阿布扎比开设了分校，2013年年初又在上海开设了分校。尽管商学院在这两所分校没有自己的校园，但其已开始增加在海外开设的课程。在上海，斯特恩商学院已启动了有关商业分析的创新硕士课程计划，另外一些计划正在酝酿之中。

斯特恩商学院这一全新的国际扩张举动帮助亨利吸引到了很多世界一流的教授，包括其在斯坦福大学的前任同事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2001年诺奖得主）以及保罗·罗默（Paul Romer）等。此前几年在美国西北大学任教的陈宇新教授今年也重返斯特恩商学院执教。

“一些问题从本质上讲是全球性的问题，但必须采用更广泛的视角，使用其他的商业工具，”亨利说，“金融在帮助我们了解如何有效地在全球分配资本方面发挥什么作用？营销在帮助我们思考如何通过数字媒体到达贫困消费者方面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如何看待奢侈品消费者不仅包括欧美的高收入人群，还包括尼日利亚和印尼的新兴高薪女性企业主这一现象？”

今年年初亨利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纽约时报》向亨利建议，如果他想帮助发展中国家，最好到一家非政府组织工作，而不是担任商学院的院长。但亨利回应道：“推动股东价值的东西可能对整个社会都极其有利，我们必须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商业在社会中的作用。”

其他人也会赞同这一点。比如，世界银行行长金墉（Jim Yong Kim）近来就指出，每年全球官方的发展援助额仅为1250亿美元左右，只能满足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如果你想为贫困人口提供很大的帮助，”金墉说道：“就必须认真思考私营部门所发挥的作用。”

这也是亨利长期以来一直坚信的事情。“我从牙买加曼利执政期间所学到的一个重大教训就是，你如果抨击商业的发展，就不可能帮助到贫困人口。”■

莫林·伯克（Maureen Burke）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

新体系 的黎明





一位著名贸易经济学家担心，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着退化
成一系列区域贸易协定的危险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

1995年，在经历了八年的多边贸易谈判之后，乌拉圭回合谈判圆满结束，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此时，欣喜最终淹没了沮丧。政治企图一次次以失败告终，决议的通过成为庆祝的真正原因。GATT是一个为解决贸易问题而达成的临时性关税削减协议，并不是许多人所期待的国际性贸易组织，且始终也未能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设计的国际上层建筑的“第三”机构。WTO的诞生填补了这一空白。

以贸易自由化为基石的战后多边贸易体系在创造经济繁荣，进而在全球减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原因是，经济增长在提高贫困线以下人群收入的同时，也为有助于穷人的医疗和教育等社会性开支带来了收益（Bhagwati 和 Panagariya, 2013 年）。经过长期的讨论，贸易与发展以及经济增长与减贫之间的关系，目前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

但是，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未能在 2011 年 11 月的最后期限以前完成；另外，同时出现的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已成为美国和欧盟等大型经济体的首选，这给多边贸易体系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在 1989 年的达沃斯会议上，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前院长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有一句似乎过于夸张的论断：“GATT 已经死去”。如今的问题或许是，“WTO 是否也已经死去？”

既然贸易自由化行动已经从多边贸易谈判转变为双边和地区性特惠贸易协定，那么摆在面前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还能够重振 WTO 的地位。世界贸易体系已步入多事之秋，未来前景将会怎样？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应对当前的形势？

多哈回合谈判中发生了什么？

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于 2001 年在卡塔尔首都启动，旨在通过降低关税等贸易壁垒和改进贸易规则，实现国际贸易体系的重大变革。发达经济体将其视作对抵制国际经济秩序（包括战后贸易自由化）的经济体的一种回应。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坚持认为，在 GATT 贸易谈判中，他们的利益曾经被忽视；而在本次所谓多哈发展议程中，他们发誓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再次上演。

事实上，GATT 意在通过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设置有利于（而非不利于）发展中经济体的规则。发展中经济体享有全部关税减让的自动扩展，而不必提供互惠贸易减让。其结果造成，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平均关税高于发达经济体，这与普遍认为的世界贸易体系对发展中国家不公、不利的观点恰恰相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上，发达经济体对自身感兴趣的产品设定的关税普遍较低，而对发展中经济体传统出口商品设定的关税较高，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享有“非互惠”优待所致。尽管援助通常没有回报，但大多数国家都坚持互惠贸易减让原则。因此，发达经济体针对不需要或不期望实现互惠的发展中经济体，就面临着贸易减让的自动扩展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采用了产品选择倾向原则：仅对自身感兴趣的产品降低关税。如果发展中经济体也能作出互惠减让，那么这种产品选择倾向基本上就消失了。

行驶在美国加州达格特附近的货运列车。



尽管存在这种产品选择倾向，但发展中国家仍受益于发达经济体所推行的贸易自由化。随着发达经济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不断繁荣，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市场也得到了发展壮大。自二战到 1986 年期间，经历了七轮多边贸易谈判，发达经济体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市场的成长，也帮助了那些采取因势利导措施的发展中国家。韩国等一些推行外向型经济的东亚国家成功开发了发展中的海外市场，使出口和收入的增速得到显著提高，进而使贫困人口大大减少。而印度等国未能做到这一点。这一对比表明，贸易为各国提供了获利契机，但必须要紧紧抓住机遇。之所以错失良机，通常根源就在于造成国外市场获利低于国内市场的自给自足型经济政策。

然而，最终阻止多哈回合谈判在 2011 年结束的并不只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谈判作出让步（所谓“温和的多哈回合”）令美国商业游说团体无法接受。他们认为，印度（农业）和巴西（制造业）这些较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做出更多的让步。他们关于目前利益还不足以让美国接受的辩论在华盛顿取得了成功。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短视的观点。



不管怎样，较小的、政治上可行的调整（比如，处于对抗状态的美国和印度在农业领域彼此做出让步），就可以取得多哈回合谈判的成功以及一系列重大突破（包括一项终结农产品出口补贴的协定）。事实上，有许多国家首脑敦促过美国总统奥巴马以这种方式解决多哈回合谈判问题，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英国首相大卫·卡梅伦以及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2010年，卡梅伦和默克尔甚至还委派一支由本人和WTO第一任总干事彼得·萨瑟兰担任联合主席的专家小组来研究这一问题）。但结果都是无功而返。

如果问及奥巴马为何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无所作为，是因为他不愿面对美国的商业游说团体，后者坚持要求较大的发展中经济体进一步做出重大让步，并要求实现所谓“激烈的多哈回合”。但这是不切实际的，而且需要认真进行新的谈判。最后，这些要求未能得到满足，多哈回合谈判也就未能在2011年完成。

多哈回合谈判将何去何从？

我们面临两种选择。如果我们将多哈回合谈判视

作已死，这将使很多国家政府感到沮丧，他们通过谈判取得的微小利益将消失殆尽。这无疑意味着未来所有多边贸易谈判将会终结，并注定会对WTO造成破坏。或者，我们可以在今年12月举行的巴厘岛部长级会议上解决多哈回合谈判遗留议题（《金融与发展》将于会议前夕付印），达成最低限度的协定，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3年）深入研究过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与“温和的多哈回合”和“激烈的多哈回合”相比，我将其称之为“温和、适度的多哈回合”。最后这个选择并不那么令人兴奋，但却更适合那些希望将WTO和多边贸易体系受破坏程度降至最低的人。

若想知道任何新型多边贸易谈判希望破灭将会带来怎样的危害，需要将WTO视作一个三条腿的凳子。第一条腿是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谈判是WTO举办的第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而在GATT框架下相继举办过七轮多边贸易谈判。第二条腿是规则制定，如设定反倾销及补贴规则。第三条腿是争端解决机制，这是1995年终结乌拉圭回合所达成的协定最显著的成果，该机制用于解决成员国政府间的争端。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多边贸易谈判”这条腿变弱（如果多哈回合谈判彻底失败，甚至可以说是这条腿发生骨折）将对另外两条腿造成多大的影响。如果是这样，则在多边贸易谈判过程中时常用到的“规则制定”这条腿就会站立不稳，或者说发生重心偏移。如果解决争端的途径是其他双边和地区性论坛，而不是WTO，那么争端解决机制也将被削弱。

多哈回合谈判未能完成，多边贸易受破坏程度却在了一股强大推力作用下进一步加剧，这股强大推力由美国（其倡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欧盟（其倡导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发起，并向歧视性的特惠“区域”贸易倡议发展。由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秘鲁组成的太平洋联盟影响力则远不及其他两个组织。

跨越太平洋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现已进入第19轮谈判，并拥有12个成员。本质上讲，这是一项在美国领导下的倡议，其贸易份额占全球的30%—40%。大约在世纪之交，美国绕开更具活力的东亚地区，选择与南美地区开展区域贸易。东亚国家被排除在拟议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之外，因此，亚洲地区的贸易倡议也无意将美国排除在外。

美国因而寻求一种方式恢复与东亚的贸易。对新西兰、新加坡和越南这样的小国而言，美国是他们制衡中国在东亚和南亚外交政策的砝码，这一理念为美国重建其在该地区的存在提供了机会。TPP的动力似

乎来自商业上的动机，而并非来自遏制中国的言论。

然而，美国游说团体提出了各种与贸易自由化几乎不相关的要求来进行干预，他们将利己主义需求描绘成“21世纪贸易协定”的基础。怎么会有人反对“新型的”、“高水平的”贸易协定呢？比方说，即使当今美国加入工会的劳动者仅占11%，但游说者仍试图将

识到防止文化趋同（文化趋同通常伴随着美国的影响）的必要性。合理的反应应当是准许文化例外，但要坚持通过补贴而不是进口配额来实现。给雷诺阿提供补贴，但是要让他去和斯皮尔伯格竞争。将法国电影业保护起来，使其免于竞争，会助长他们享受“垄断租金”和悠闲生活的思想，这是一条完全错误的道路。



双边或地区性论坛的争端解决必须容许来自WTO非成员国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工会的要求纳入其中。纳入这些要求的企图在WTO中遇到巴西和印度等一些有影响力的民主国家的抵制。尽管保护知识产权的要求已被纳入1995年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见本期《金融与发展》“智力贸易”），但据说TPP所寻求的WTO保护大大超出对WTO成员国现有的保护范围。

如果仍然把接受这些要求作为加入TPP的一项先决条件，那么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伙伴关系将会把亚洲肢解成TPP国家、中国和印度三个部分。此举并非上策。正确的策略应该是，允许推行自由贸易的国家加入TPP，并且不附带与贸易无关的附加条件，不附带不可取的WTO要求。接受这些要求不应作为加入TPP的先决条件。可以这样说：如果我想加入高尔夫球俱乐部，那么我得打高尔夫球，但我不必非得和其他俱乐部成员一起去教堂唱圣歌。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是由美国总统奥巴马、欧洲理事会主席赫尔曼·范龙佩、欧盟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于2013年6月提议启动的一个贸易协定，目前美国和欧盟正在就此事进行磋商。TTIP所面临的问题与TPP截然不同。首先，两个市场都很庞大，但TPP实质上是要将亚洲小国纳入进来，随后再纳入日本和韩国等较大的国家。与TPP不同，美国的游说团体对欧盟的影响很小。甚至，欧盟内部在众多问题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从而会减缓谈判的进程。

我们来看几个重要的例子：

文化例外：法国希望搞文化例外。美国始终不赞同这种想法，并将其视作伪装拙劣的贸易保护要求。但事实上，不仅是法国，有近50个国家的文化部长认

转基因食品：在这方面主要的意见分歧仍然是，许多美国人认为这项技术是在解决问题，而欧洲人往往认为这是在制造问题。在我的《为全球化辩护》（In Defense of Globalization）一书中有一幅漫画，展示了一个美国顾客让服务员把没有味道的西兰花拿走去做转基因。不幸的是，批评者将转基因食品称为“毁灭创造者的食品”——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食品并不会对人类健康造成不利影响（WHO，2010年）——他们的反对之声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形成了一种威胁，其中不乏很多饱受饥饿之困的穷国。对这种并不确定的“毁灭”产生的恐惧正在让人们感觉到明确的死亡预兆。

托宾税：法国正在坚定不移地实施这一货币交易税种（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提出，旨在减少资本流动的波动性），而英国和美国历来对其持反对态度。在法国，很多人也仅将其视作提高收入的一种方法。另一些人则认为，银行似乎会获得救助，而穷人却得不到偿债基金上的帮助。因此，对银行资本流动交易征收重税对底层民众而言似乎非常公平，也是一种意外惊喜。很难预料TTIP是否会以某种方式迅速和解，即便真的和解，也会有不同的国家赞成或反对这一税收政策。

未来的挑战

贸易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特惠贸易协定是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毒瘤。增长迅猛的中间产品贸易——即所谓的价值链——这是一个误导性术语，因为形成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去往不同方向并可能又折回原地：法国可能从日本进口钢材，但日本的钢厂使用的中间产品来自世界各地，其中就包括法国，这个问题困扰着每个中间产品进口商——需要有协调一致的规则，

而这些规则无法通过双边和地区性协定实现（见本期《金融与发展》“附加价值”）。

实际上，即将离任的 WTO 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同前任总干事萨瑟兰一样，对特惠贸易协定的扩散进行过公开谴责。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的领导人——多边主义的长期捍卫者——已几乎完全将重心转向了特惠贸易倡议。

但经济决策无疑是一种次优理论的运用。目前，在双边，特别是大区域协定正在形成的局势下，新上任的 WTO 总干事罗伯特·阿泽维多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我建议，在双边贸易谈判这条腿几近骨折的情况下，必须确保另外两条腿（规则制定和争端解决）免遭伤害。阿泽维多必须告诫 TPP 和 TTIP 的首脑借鉴从多边层面获得的经验教训，来实现这些区域协定的规则制定和争端解决。规则制定不应仅局限在这些论坛，也不应以美国游说团体清楚什么最符合大众利益为借口，排斥那些非本区域协定成员的国家地区。同样，双边或地区性论坛的争端解决必须容许来自 WTO 非成

员国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这些任务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多边贸易谈判可能已经消亡，特惠协定成为唯一的选择，如果阿泽维多不将这些任务作为当务之急来抓，WTO 的领导地位还将继续遭到侵蚀。到时候，那将成为一种遗憾。■

贾格迪什·巴格瓦蒂 (Jagdish Bhagwati) 是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法学及国际关系学教授，并兼任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问题高级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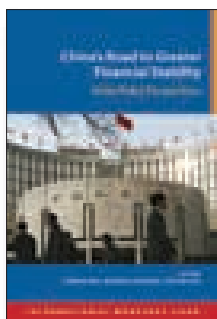
参考文献：

Bhagwati, Jagdish, and Arvind Panagariya, 2010, "Wanted: Jubilee 2010: Dismantling Protection," OECD Observer.

——, 2013, Why Growth Matters: How Economic Growth in India Reduced Poverty and the Lessons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10, "20 Questions on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Geneva).

IMF 最新出版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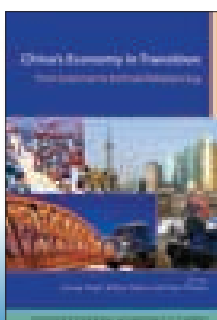


中国提高金融稳定性的道路 一些政策观点

Udaibir Das、Jonathan Fiechter、Tao Sun (编)

本书关注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主要的金融政策问题。参考中国当局高层及中国院校、IMF 的工作人员的研究，本书探讨了中国的金融政策背景、影响金融稳定性的宏观经济因素以及金融体系监管的重要作用。本书意在理解进行中的金融部门政策过程以及中国经济首要任务中出现的改变。

© 2013, 242 页，平装，ISBN: 978-1-61635-406-0 Stock# CRGFEA, 定价：38 美元



中国经济转型 从外部再平衡转向内部再平衡

Anoop Singh、Malhar Nabar、Papa N' Diaye (编)

本书从多角度探讨了中国当前的再平衡问题。重点关注三个主题：中国经常项目减少的原因以及国内不平衡增长的迹象；对中国贸易伙伴的影响；从中国增长模式（以达到稳定的、可持续的、更具包容性的改革）获得的政策经验与教训。

© 2013, 292 页，平装，ISBN: 978-1-48430-393-1 Stock# CETEDEA, 定价：30 美元

请访问 eLibrary.inf.org/page/free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全球 银行业重组

位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国际性银行分行。

斯蒂恩·克雷森斯、
胡安·A. 马尔凯蒂

全球金融危机促使加强对国际金融服务，尤其是国际银行业风险与利益审慎监管的程度

全球金融危机促使对金融业（包括国际金融服务业）的利益与风险进行重新评估，许多评论家认为金融业过于庞大且过于复杂，诸如复杂的资产证券化与衍生品等金融产品似乎提供的附加值不高但造成的风险却不少。

此次重新评估的情形在国际银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国际银行业经过20年的跨国快速扩张之后，目前正处于衰退之中。2008年前三个月的高峰期之后，外资银行贷款总量急剧下滑。直接跨国贷款下滑尤为严重。通过国外附属机构发放的贷款更具稳定性。由于资本不足的银行缩减了资产负债表，故市场力量是导致这种收缩情形的主要驱动因素，但某些国家监管政策的变更也促使国际性银行退回至本国市场。

全球金融体系——该机制能促进全

球金融稳定性，推动全球金融与服务跨国平稳流动——的部分缺陷在这种收缩过程中也得到了体现。这场金融危机表明，一国的危机能够大范围传播至其他国家，以及金融监管机构之间有限的合作增加了对拥有国际业务的破产银行集团进行危机管理与处置的复杂程度。此外，母国与东道国对银行及其国外附属机构予以监控与支持的动因也不相同。例如，在中欧、东欧和东南欧的许多国家，西欧国家银行位于这些国家的附属机构对东道国而言具有系统重要性，但与母行的全球业务相关度较小。当外资银行受其母国或者其全球业务冲击时，只有通过所谓“维也纳倡议”开展紧密的国际合作才能够防止该银行在东道国引发重大问题。在其他情形下，如果银行的业务与其母国经济密切相关，其母国未必具有能力或者愿意支持该银行的母行，更不用说其附属机构了。

全球化程度的提高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20年期间，金融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这种情形主要体现在：

- 直接跨国银行贷款、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资本流动（例如，股权与债券投资组合投资等）大量增长；以及
- 外资金融机构，尤其是外资银行，在其他国家设立分行并在当地经营业务。

在许多国家，银行以及其他产生债务的资金流动量大大增加。2002—2007年间，发达经济体的资本流动总额占GDP的比重从约8%增长到25%左右，而在新兴市场经济体，这一比重从约2.5%增长至12%以上。虽然金融全球化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但也提高了一个主要金融中心的负面冲击转移至其他国家的可能性。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发生的。2008年年初的高峰期过后，2009年全球资本流动总额占全球GDP的比重骤减至1.3%，这种情形对发达经济体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均造成了影响。2010年的资本流动额有所回升，



但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加剧又再度下滑。2012年，资本流动额仅占全球GDP的3.6%。

与此类似，在危机爆发之前，外资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在当地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在此前的20年间，银行通过在许多国家设立分行（银行直接扩张）与子公司（本地注册并从当地积累资本）来在当地开展业务，以此扩大其全球足迹。1995—2009年间，通过投资约成立了560家外资银行，使得外资银行的平均数量从占当地国银行总量的20%增长至34%（见图）。银行在当地具有营业执照与实际营业点，便于其在本国募集资金并向当地公司与家庭提供贷款。银行还能够使用其母行的资金，或者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募集资金。银行与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和终端客户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为其提供了重要优势，尤其是能够更好地评估其增长机会与风险。

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中欧和东欧等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整个银行系统目前均由外资银行主导，甚至基本由外资银行构成。而在另一些国家，包括许多发达经济体与亚洲经济体，外资银行发挥的作用较小。诸多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例如综合金融改革，包括向国际性竞争开放的程度；东欧在中央计划经济转型过程中国有银行的私有化；甚至之前的金融危机也是原因之一，当时通常将陷入困境的银行出售给外国实体。自最近一次金融危机以来，投资设立新的外资银行的速度有所放缓，在某些情形下，外资银行的业务反被本地金融机构收购。

尽管全球金融危机促使对国际银行业风险与利益重新评估并收紧国内金融监管政策，但危机并未降低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进一步开放其金融部门的速度。实际上，银行业、证券和保险市场的市场准入限制与歧视性措施（即对国内公司实施相比国外资公司更加优惠的政策）的情形反而有所好转，并且之前进行的改革努力也得到了巩固（见表）。此外，各国继续签署优惠贸易协定，以便签署国的金融机构进入另一国的市场。自危机爆发以来，签署的此等协定数量约52份，相比2000年至2008年9月期间签署的数量还多出两份。与此同时，尽管所谓的多哈回合全球贸易谈判在放宽市场准入与降低金融服务贸易壁垒方面进展缓慢，但近期出现了若干个支持金融服务自由贸易的计划。其中的三个计划有望进一步推动，甚至大力推动自由化。它们是有13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欧盟与美国达成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涉及21个经济体与欧盟的服务业贸易协定。

金融服务贸易的两面性

总体而言，特别是就外资金机构而言，金融服务贸易既有利，亦有弊。实证研究表明，外资银行的存在总体上能够提高本地银行业的效率，促进竞争，降低净利差，降低超额利润与成本率（Cull和Martinez Peria, 2010年；WTO, 2011年；Claessens和Van Horen, 2013年）。然而，这些益处似乎根据外资银行规模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在外资银行数量较多的拉丁美洲与东欧等地区，促进竞争的好处就表现得极其明显，但在亚洲等外资银行数量较少的地区则表现不太明显。无论就信贷总额、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数量或者获得存款与支付服务而言，外资银行在拓展融资渠道方面的效果都不太明显。各国取得的效果存在差异，这取决于外资银行参与的程度、国内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国家发展水平以及外资银行通过贷款技术（包括担保与依赖信用评分及其他技术等）来填补信息缺失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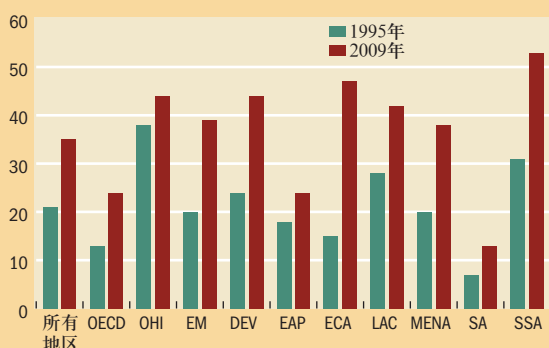
就金融稳定性而言，近期的研究表明，各国受危机冲击的程度不同，这取决于外资银行的相对规模，附属机构与母行的距离，外资银行从当地而非通过国际渠道募集资金的程度等因素。但研究结果发现，外资银行有两大相对立的效果：

- 本地附属机构在本地募集资金，其发放的贷款的稳定性高于跨国贷款。东欧国家外资银行贷款的下降程度高于本地银行，而在拉丁美洲最大几个国家则未发现显著差异。相对于东欧而言，外资银行在拉丁美洲的分行数量更少，但在当地注册的附属机构数量更

外资银行增多

外资银行的本地市场的份额在1995—2009年间大幅增加，尤其是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

（外资银行在本地市场所占的份额，百分比）



资料来源：Claessens和Van Horen（即将发布）。

注：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包括所有核心成员国。OHI=其他高收入经济体，包括非OECD成员的高收入经济体。EM=2000年标准普尔新兴市场与前沿市场指数包含的所有国家。DEV=发展中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EAP=东亚和太平洋地区。ECA=欧洲和东亚。LAC=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MENA=中东和北非。SA=南亚。SSA=撒哈拉以南非洲。所有的地区分类遵循世界银行的标准。

更改贸易条件

自 2006 年以来，大多数国家都进一步放开了金融服务业。

国家	行业	措施	年份
智利	保险	允许外资公司直接设立分公司	2007
中国	保险	允许外资公司提供强制性第三方车险的服务	2012
	证券	扩大合资企业的业务范围	2012
	证券	放宽外资持有证券公司股权限制	2012
	融资租赁	消除对外资投资的限制	2012
	银行与保险业	消除对直接设立分公司的限制	2009
哥伦比亚	金融	允许外资公司完全持股非银行金融公司	2010
印度	金融咨询	允许聘用外国投资顾问与投资组合经理	2010
以色列	保险	允许离岸公司在岸设立实体机构	2009
马来西亚	银行与保险业	放宽对外资股权的限制	2009
	银行业	允许直接设立从事批发性银行业务的分行	2010
尼泊尔	银行业	允许外资机构收购国内银行	2010
尼日利亚	保险	允许外资公司完全持股	2006
巴基斯坦	保险	提高外资持股比例的上限	2012
俄罗斯	保险	取消颁发许可证前的经济需求测试	2007
萨摩亚	保险	放宽对外资对保险经纪公司的持股上限	2011
沙特阿拉伯	证券	允许非居民外籍人士通过交易所购买并出售基金	2010
泰国	银行业	允许外资银行直接设立分行	2006
	银行业	放宽对外资银行分行开立支行数量的限制	2010
	银行业	放宽对外资银行子公司开立分行数量的限制	2012
乌克兰	银行业	允许外资分行开展银行业务	2006
阿联酋	银行业	限制外资银行分行的数量	2010
越南	银行业	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全资下属机构并直接开立分行	2007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 / 世界银行综合贸易情报门户服务部。

多，此种情形部分可归因于拉丁美洲监管机构提供的优惠政策。

• 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时，全球性银行通常会重新调整其投资组合，从国际市场上撤出。虽然全球性银行将危机带来的影响从发达经济体转移至新兴市场（因为其在组织内重新分配流动资金），但在受危机影响的发达经济体运营的外资银行也会减少其在当地的贷款金额，并调回资金以缓冲其在母国受到的冲击。

监管应对措施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总体监管应对措施由一系列国内与国际性措施构成，旨在缓解危机带来的冲击以及降低冲击的跨国转移风险。这方面的努力包括完善监管者对受困的全球性机构的处置方式（使这些机构恢复健康或对其调整过程予以指导）。另外，还就银行新的国际标准达成一致，例如要求银行提高资本要

求与完善流动性管理（最近，重要监管机构达成了所谓的巴塞尔协议 III）。为了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全球性银行进行合作监管，特别成立了监管协会。各管辖区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及金融风险敞口的披露也获得了完善，这可能有助于监管机构在早期发现风险并能够更多地发挥市场自律机制的作用。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银行进行更频繁的评估提高了金融监控力度，尤其是对国际性风险从一国扩散至其他国家的监控（IMF，2012 年）。其他的重要改革涉及信用评级机构的规则、场外衍生品市场以及影子银行等（见“什么是影子银行”，《金融与发展》2013 年 6 月号），但进展更为缓慢（FSB，2013 年）。

虽然国际金融体系的功能与稳定性得以改善，全球性与开放性系统得以维持，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对金融服务贸易不予限制，但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的监管机构都加强了对外资银行在本地的业务的检查与监管。例如，本地监管机构一直鼓励银行在本地保留较多的资本和流动资金，并鼓励银行将外资分行转变为子公司，以增加银行在其全球营业网点中自由转移资本与流动资金的难度，并使监管机构更易于限制本地银行开展国际业务。监管机构加强了对银行及其国外附属机构之间共享流动资产与资本的监管力度。

母国的一些新的监管措施还尝试限制自营交易活动（即银行通过其自有账户买卖证券，这使银行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并将此等业务与零售存款业务及其他业务分离开来。由于附属实体的国内与海外业务在法律层面上相互分离，此等围栅性措施能够限制银行集团的一种业务对集团内其他业务的影响程度，但也可能会造成国际银行内部业务效率的降低。

下一步措施

为了保护各国国内经济与纳税人的利益，并降低（如果无法完全消除的话）金融系统关联性造成的负面影响，对国际金融活动的监管与监督必须予以完善。尽管危机前期的监管合作开展较好，但金融监管与监督仍以在国内开展为主。为了在保护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利益的同时降低风险，还需采取新的政策措施，包括关闭受困的国际机构以及最为重要的方面，即应当由哪国纳税人支付此等费用及承担多少费用等。

最后，对关闭破产机构（及其国外分公司和分行）成本的担心促使各国监管机构重视国内监管。例如，瑞士监管当局最近提倡利用积分卡方法，以决定开展全球性业务的瑞士银行与在瑞士运营的外资银行的组织方式是否有利于危机过程中达成解决方案并保护此等银行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功能。

就解决以下事项制定计划也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处理从事跨国业务的疲弱机构过程中政府分担与投入所需资金的方式；如果某家机构破产或清算，其资产与负债的分配方法；以及任何最终成本（存款保险、除受保存款以外的债务担保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等）在各司法管辖区之间的分配方法等。尽管进展缓慢，但欧盟银行联盟通过其支持性改革已经致力于此等计划的制定、编制及制度化工作。

处置破产机构的问题并不仅是各国监管机构开展合作的唯一障碍。

处置破产机构的问题并不仅是各国监管机构开展合作的唯一障碍。在一家银行或其附属机构陷入财务困境且监管机构希望将资本与流动资金保留在当地国的情形下，或者在一国的金融周期处于上升期但在另一国处于下降期的情形下，跨国金融机构的母国或者东道国的监管机构可能发生冲突，因此有必要就各司法管辖区采取的工具及其应用开展合作。此外，一国未采取行动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负面溢出效应。近期，金融稳定委员会以及英美两国监管机构达成了一些机制安排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该问题。但仍有许多问题尚待解决。例如，巴塞尔协议 III 规定银行需在业务良好期间增加更多的资本并在业务不良期间减少资本，以作为降低反周期资本缓冲影响的措施，但难以确保不受此等规定约束的司法管辖区的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会实施这些措施。

在理想情形下，每一个国家均应当具备监管框架，规定母国中立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该国并在该国开展业务的相关事宜，并硬性规定母国应当对该机构进行充分的监管与监督且在需要时向该机构予以支持。然而，优惠贸易协商的扩大化意味着特定国家可以向特定外资金融机构提供特别准入与优惠。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来自少数几个司法管辖区的金融服务与提供者的集中化局面。这种局面容易造成如同 1997 年时部分东亚国家所经历的情形（当时日本银行是主要贷款提供者），或者如同近期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情形，即少数西欧国家的银行在这些国具有系统重要性。在此等情形下，母国的问题会引发这些机构的收缩，并使该机构在东道国发放信贷的问题恶化。允许来自尽可能多的国家的经营状况良好的外资银行准入的多边贸易自由化有助于预防发生这种集中化问题。监管机构通过完善的监管与监控框架促使形成无扭曲竞争，这不仅能够确保最健康、最高效的外资银行进入该国市场，同时也能降低银行在母国受到的冲击对整个东道国市场造成负面影响的风险。

全球金融一体化通过提高效率与竞争、丰富产品品种、转移知识与技术等，从总体上能够使东道国受益。但最近一次的危机表明，全球金融一体化也会使各国面临新的风险与挑战。尽管在本地金融动荡时期，大多数外资机构一直稳定地提供对外贷款，但金融业开放程度越大，世界其他地区的金融压力对当地金融系统的影响也会越大。这不仅仅是新兴市场面临的问题，更多的发达金融系统与经济体也会面临该问题。

此等问题并不会颠覆全球金融一体化的原理。但这些问题要求增强对国内与国际的政策应对措施的了解，并将其有效组合在一起，以确保金融一体化采取使所有国家均能风险最小化、利益最大化的方式。金融跨国开放是该方式的一项重要内容。金融跨国开放与进一步的支持性行动相结合，能够保证在国际范围内有效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将与此相关的风险最小化。■

斯蒂恩·克雷森斯（Stijn Claessens）是IMF研究部副主任，胡安·A·马尔凯蒂（Juan A. Marchetti）是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部顾问。

参考文献：

Claessens, Stijn and Neeltje Van Horen, 2013, "Impact of Foreign Banks," *The Journal of Financial Perspectives*, Vol. 1, No. 1, pp. 1-14.

———, forthcoming, "Foreign Banks: Trends and Impact,"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Cull, Robert, and Maria Soledad Martinez Peria, 2010, "Foreign Bank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at Do We Know about the Drivers and Consequences of This Phenomenon?"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WPS 5398* (Washington).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FSB), 2013, "Progress of Financial Reforms," *Report to the G-20* (Basel).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12, "The IMF's Financial Surveillance Strategy" *IMF Policy Paper* (Washington).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2011, "Trade in Financial Services and Development," *Background Note by the Secretariat S/FIN/W/76* (Geneva).



智力贸易

从经济角度审视21世纪知识产权的跨国流动

蒂埃里·维迪尔

一艘装载着用于缓解高血压的通用药氯沙坦钾的货船离开印度前往巴西。货物在荷兰转运时，当地海关指控其专利侵权并将其扣留36天，最终遣返印度。发生在2008年12月的这个事件是一系列在欧洲主要中转航线上没收通用药行动中的一个事件，它再一次让聚光灯投向医药产品的国际贸易，并且思考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让贫困人口买得起基本药品的问题。

此外，谈到知识产权的问题，就不得不提到iTunes、Spotify及Deezer这三家大型国际数字音乐服务商。在过去两年内，这些企业将业务由20个国家扩展到超过100个国家。2012年，全球唱片公司数字音乐部门的收入突飞猛进，超过了整个音乐行业收入总额的1/3，比前一年增长9%。同年，大批抗议者聚集在欧洲各地，反对一项国际反盗版协定（《反假冒贸易协定》）。他们担心该协定会导致采取更加严密的互联网监控，从而限制其免费下载电影和音乐的自由。

这些例子反映了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想法、信息和知识越来越变成可以交易的资产，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制作、发布并跨越国界传播。它们位于21世纪全球经济的中心。事实上，大多数新药品和高科技产品创造的价值体现在其内含的创新、研发及将其推向市场的测试方面。同样，电影、音乐录音、书籍和电脑软件的交易和消费本质上是因为它们嵌入的信息以及创新。即使是按照标准制造的产品和商品（如服装和农产品）如今也包含着很高比例的创意和设计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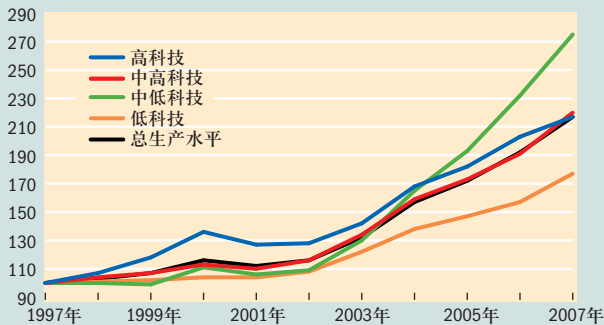
自1997年以来，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量稳步增长（见表1），但其在全球贸易的分布并不均匀（见表2）。一些国家的确比别的国家出口更多的高科技或中等高科技制造产品。

前面提到的例子还表明如何通过国际贸易进行知识传播，无论是传统的商品运输形式还是新兴的数字下载形式，都造成了国家之间和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图1
更高的流量

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流动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直处于稳定增长状态。

（OECD制造业贸易技术强度指数，1997—2007年，1997年=100）



资料来源：OECD（2010年）。
注：OECD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知识的拥有者有权阻止他人使用自己的发明、设计和创造，还可以与那些使用其成果的人协商报酬，这通常是激烈争论的主题，也是政府间、公司间和社会组织间利益冲突的来源。所谓的知识产权有多种形式：创意和文化产品的版权、创新制造业产品的专利以及设计和时尚产品的商标。对这些权利的合法性及保护程度在世界范围内分歧较大，而且需要考虑社会、文化、人道主义、政治等诸多因素。在此，我们专注于经济层面的问题：知识产权在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对于发展和全球福利的影响，以及如何缓解由其导致的全球紧张关系。

知识产权建立在信息和知识的基础之上，具有两个特定的经济属性。其一，人们使用信息和知识并不

相互妨碍。想想看，几个人可以同时或依次使用一个计算机程序，欣赏同一首歌或某种时尚设计。与消费苹果和汽车之类的商品不同，信息属于非竞争性产品；换言之，多人可同时消费该类产品，而并非只能一人独享。因此，此类产品一经创造，可以也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广泛传播。

其二，一般来说，要阻止人们在未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复制或得到信息是很难的。因此，仅靠个人的行动很难阻止他人擅自使用知识产权。如果信息的创造成本很高，人们更倾向于等到别人创造出来再坐享其成。这一“搭便车”问题转而扼杀了人们在创造、创新过程中投入资源与努力的积极性，这又将阻碍经济增长与发展。这一问题可由定义和实施有权使用和消费信息的所有制结构来弥补。

这一补救措施需要通过体现基本利益权衡的公共干预来实现。一方面，经济效益需要知识产权信息通过各种渠道广泛传播。另一方面，经济效益又需要通过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来鼓励人们为社会创造价值超过成本的新信息。在这个问题中，更复杂的是，知识的创造是以其自身为基础的序列性过程：有信息的输入才会有新的信息产出。专利和版权系统解决了这一矛盾，即政府赋予发明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专有权和法定专卖权，而发明者必须公开所有发明信息作为交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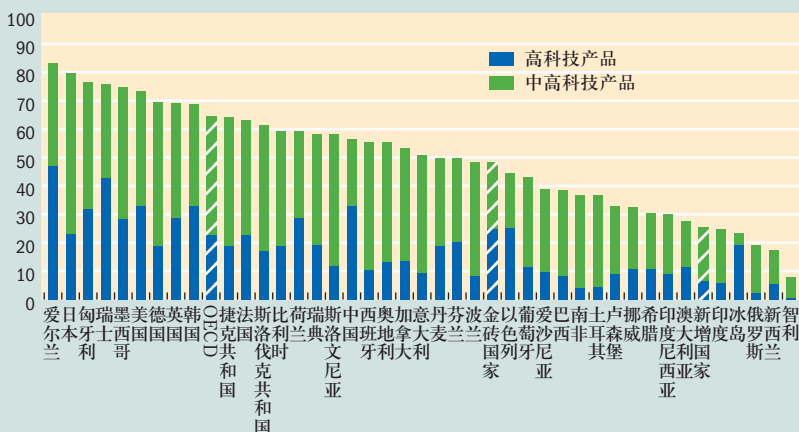
在国际大环境下，附加的权衡随之出现，因为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在地理分布上并不均衡。多数具有商业潜力的发明来源于那些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公司。然而，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

图2

技术输出国

科技相关的产品交易在发达经济体中更加普遍，而在其他经济体中则较少。

(制造业出口中高科技和中高科技产品的比例，2007年)



资料来源：OECD (2010年)。

注：新增的国家有智利、爱沙尼亚、以色列、俄罗斯和斯洛文尼亚。金砖国家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以及南非。OECD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资的逻辑显示，知识更可能会在生产成本较低的地方，即低收入国家得到传播和应用。关于上述权衡以及知识产权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关经济理论给出了一些启示。

关于知识创造的经济学

在创新型的发达经济体中，大力保护知识产权可以减少仿制现象，并且允许创新者从其创造性活动中获得较大的利益。这些举措鼓励了创新活动，促进了更高的生产率增长。然而，在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会影响知识的传播，从而又会影响到高成本国家的创新者和低成本地区的知识应用者之间的生产对接。此外，经济推理又表明额外的间接影响会抵消前面所说的积极影响：对知识产权更好的保护可以使商品在创新型发达经济体获得更长的使用寿命。长期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将包括技术工人、工程师以及资金在内的各类资源重新配置到实际生产中，并且远离在创新型发达地区的研发活动。最终，这可能既减缓了创新速度，又减缓了世界经济的增长。

对于大部分低收入国家，知识产权与技术的转移和传播密切相关。这一转移和扩散的过程是通过全球经济中的多种渠道开展的。商品与服务的国际贸易，尤其是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进口，是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这些都是通过逆向工程原理（把商品拆开，从而发现商品背后蕴含的技术）实现的，同时也是通过学习国外生产方法、产品设计、组织设计实现的。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渠道是外国直接投资，也就是跨国企业与其子公司分享技术成果，这些技术随后便会传入当地。最后，技术的传播可以通过国际许可证交易得以实现，而许可证交易需要购买生产和分销产品的权利，以及有效使用这些权利的知识。

提到创新，经济理论认为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传播的影响不是非常明确，而且通常依赖于各国的特点。过度的知识产权保护限制了技术的传播，因为专利权阻碍了其他人使用专利产品。国外知识产权的所有者日益增长的市场力量将本国公司和消费者的收益转移到了国外垄断公司，导致了价格上涨，进口产品越来越贵，国内产出下降，这也阻碍了知识的传播。但是知识产权依旧在知识扩散方面起着积极的影响，因为专利申请的信息需要向该国其他潜在的发明者公开，而不是创新者自己藏起来。而且，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刺激技术通过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外国直接投资以及技术授权流向低收入国家。的确，当创新被很好地保护起来，免于被模仿和伪造时，创新者们更乐于出口、投资以及对技术和设计进行跨境

授权。知识密集型商品交易量的增加最终会产生有利的溢出效应，继而信息就被传播至所有应用该知识经济体中。

虽然基于理论性假设，创新型国家能受益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但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创新程度不高或无创新的国家而言，其受益效果则并不明显。更确切地说，对于实行自由贸易并在创新型技术研发方面拥有比较优势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能促进其发展。而对于那些不具备这些优势，尤其是那些创新能力低或根本没有创新能力的国家来说，这样的保护也许仅仅意味着外国公司更强的垄断力和不

制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初衷是为了就知识产权保护而产生的利益与成本找到一个平衡点。

断减少的国民福利——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它们反而可以免费享受到国外的创新成果。

鉴于全球经济中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理论相当模糊，我们需要依靠经验证据的帮助。一项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所做的研究（Falvey、Foster和Memedovic，2006年）总结了知识产权在科技创新、经济增长、技术转让过程中的作用。该研究表明知识产权对不同的国家带来不同的影响。越是拥有强大的国内创新能力（根据人均GDP或人力资本存量评估）并且为国际贸易流通提供更为开放环境的国家，知识产权的保护越能促进创新与发展。相反，知识产权保护为那些创新能力匮乏的低收入国家带来的影响微乎其微。

同样，知识产权通过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和专利授权这几个途径对技术扩散所起到的作用也取决于各国的特征。事实证明，只有在那些已经有一定的能力去适应、应用甚至进一步研究外国先进知识的国家，以上途径才能成为技术扩散的重要来源。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刺激贸易量，从而起到推动技术扩散的效果。当然，高科技型或是知识密集型产品和产业并不需要这样的保护，例如在电子、电信、航天航空和核能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就与竞争力关系不大，因为对于那些低收入国家而言，这些行业的产品太过高端而难以模仿。很多公司也会采用像工业保密一类的策略来巩固发展自身的创新成果。除此之外，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也能推动技术扩散，在此过程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同样有着重要作用，但其作用主要表现在化学品和药品这些特定行业。外国直接投资中的一些特



定生产阶段，如零件制造、产品组装和研发环节对知识产权更加敏感，加强这些阶段的知识产权保护将比全球生产链中其他环节更重要。

从研究中所得出的广泛结论是：在一体化的全球经济背景下，知识产权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所起的作用因国家和产业不同而差异显著。知识产权保护能促进那些拥有强大国内创新能力的国家进一步增强其创新能力，同时还能加快技术转移——当然只是对民众有着相当高的教育水平并且拥有能够应用、适应这些新科技的基础设施的国家而言。而且，越发达越开放的经济体能够拥有越大的市场，与国外公司相比其竞争力更大，也越能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获益。

全球性对策

鉴于国家和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知识产权问题导致公司、政府和利益团体之间激烈的辩论、对立以及紧张关系就不足为奇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是从多边层面上减少知识产权保护在不同国家间产生的差异的最重要举措，该协议是世贸组织大框架的一部分，旨在遵守常见国际规则的前提下，协调知识产权问题，以保护专利、版权、商标和设计。协议在世贸组织成员国之间建立了最低的保护水平，同时坚持多边交易体制的非歧视原则。

制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初衷是为了在创新国家和尚无能力创新的国家之间，因知识产权保护而产生的利益与成本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且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促进国内的知识创新和国际之间的技术交流。但是自从这项协议实施以来，就遭到了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国际运动的强烈抨击。据反对者称，这项协议反映了北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游说诉求，将那些有能力创新的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强加到缺少资源和基础设施的低收入国家。的确有证据显示所谓的南北技术差异在不断扩大(Correa, 2011年)，该协议造福世界贫困国家的能力受到质疑。

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趋势不是对《与贸易相关知识产权协议》放松管理，而是更加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在过去的十年内，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前之间签订了一系列的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议，近期的《反仿冒贸易协议》就是一个例子。这些协议规定了明确的知识产权保护义务，甚至超过了目前的《与贸易相关知识产权协议》的保护标准。

怎样才可以在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利益冲突中达成更好的经济平衡并且缓和紧张的国际关系呢？灵活性是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并有一些明确的政策含义。首先，政策应随着国家发展水平与创新模仿能力的不同而相应变化。

对于那些国家体制薄弱、研究发展能力有限的贫穷国家来说，知识产权并没有真正的意义。对它们而言，更重要的是改善投资环境，实施贸易政策，以促进包含于商品中的技术进口。在这些国家，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可能行不通。同时，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联合国归类的最不发达国家），应建立相应的机制，降低受知识产权保护产品的进口成本。对于一些拥有更高模仿创新能力的中等发展水平经济体来说，按照《与贸易相关知识产权协议》的要求来保护知识产权能够促进国内企业从模仿跟风到自主创新的转型，促进国际贸易间的技术传播，同时也能够鼓励从其他创新地区引进国外专利。但是，为抵消失去模仿机会而带来的负面影响，此举措必须提供能够更加顺利地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市场。

但是双边贸易协议好像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协议中知识产权的条例主要体现了发达经济体的关注点。所以，要更加接近上述的政策成果，一个方法就是利用该协议的灵活性，利用协议允许的例外性和过渡期，帮助知识产权体系在多边和更平衡的环境中适应各国需要的目标。这种方法能够促进智能商品的国际贸易，比如治病救人的药品和愉悦生活的数码娱乐。■

蒂埃里·维迪尔 (Thierry Verdier) 是巴黎经济学院路桥总工程师教授、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参考文献：

Correa, Carlos, 2001, Review of the TRIPS Agreement: Fostering 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Penang, Malaysia: Third World Network).

Falvey, Rod, Neil Foster, and Olga Memedovic, 2006,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Working Paper (Vienna).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0, Measuring Globalisation: Economic Globalisation Indicators (Paris).



墨西哥普埃布拉州大众甲壳虫生产线上的员工。

附加 价值

伯纳德·霍克曼

公司将产品
和服务
提供分散在
许多国家，
从而形成供
应链并借此
降低总体成
本

一辆汽车通常包含数千个部件，而这些部件是由几百家供应商生产的，这些供应商又往往来自几十个不同的国家。以一辆大众汽车为例，其发动机可能产自德国、墨西哥或中国，其线束可能来自突尼斯，而其排气滤器系统则可能产自南非。

由于贸易、运输和通讯成本的降低，各家公司得以将其不同的产品线布局在全球各地。每一个生产阶段都是在不同的生产厂家完成，而且这些生产厂家往往位于不同的国家。这种类型的生产需要产品和服务通过供应链实现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转移，这是近年来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原因。自1950年以来，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量增长了27倍，达到约20万亿美元，增长速度超过全球GDP三倍。其中，大部分增长来自公司的国际供应链所带来的中间产品和服务在不同国家之间的转移。产品在供应链上的每一个国家中都会实现增值（这一过程被称为垂直贸易

或纵向专业化)。通过将生产活动和各项任务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分布在不同国家，可以实现总体生产成本的下降。

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欧洲的转型经济体以及墨西哥等许多其他国家已经成为供应链贸易的积极参与者。供应链贸易不仅仅局限于汽车行业，还涵盖计算机、手机以及医疗设备等产品。总体而言，制成品在发展中经济体出口总额中的占比已经从1980年的30%上升至目前的70%以上，其中零部件在制成品出口增长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供应链贸易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会增添新的风险和政策挑战，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全球贸易量骤然缩减就属于这种情况。由危机引发的信贷和需求的急剧下降对那些严重依赖供应链贸易的国家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如果一个为供应链下游经济体的生产厂加工产品的国家遭受意外事件的冲击，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如2011年的泰国洪灾对包括电子产品、汽车和鞋类在内的许多产品带来了不利影响。

有助于较为贫困的经济体

供应链有助于较为贫困的国家参与面向全球市场的制造业，因为厂商可以将劳动力密集型和低技能要求型的生产任务安排在这些国家，比如说，可以在柬埔寨或越南进行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的组装。

尽管低收入国家的加工生产活动对产品的附加值贡献通常较少，但生产活动所创造的就业和收入则可能带来巨大收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随着上述国家不断扩大在此类贸易中的参与程度，它们可能能够提高其在本地附加值增值中的份额。一直以来，中国和其他在供应链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发展中经济体对全球制造业附加值的贡献率不断增加（见图1）。

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以及很多拉美和中东国家至今还尚未实现朝着纵向专业化和供应链贸易方面的转变，而东亚、北美以及欧洲已经凭借这一转变推动了贸易的发展。促进更多发展中经济体积



极参与到供应链贸易之中是十分重要的。供应链贸易可以为各国提供利用各自比较优势的机会，而无需纵向发展为制成品厂商提供中间投入要素的一体化行业。

供应链贸易发展不均衡的一个原因在于，低收入国家运输、基础设施、贸易壁垒以及边境政策等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成本要远远高于更为富裕的国家（见图2）。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地理因素的作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也有政策所产生的影响。比如，有关产品的规定会提高贸易成本。降低贸易成本并提高与区域和全球市场的联系是扩大供应链相关活动投资的前提条件，而且并不仅限于贸易便利化（如减少边境通道的延误），还需改善与运输相关的基础设施服务以及区域过境制度的实施（WEF、Bain & Co. 和 World Bank, 2013年；Arvis 等人，2012年）。

支持供应链贸易

供应链贸易的扩张以及相关生产设施建设带来的外国直接投资极大地降低了各国采用关税等贸易政策工具的积极性。供应链专业化要求各家公司能够进口产品和服务，并在加工处理之后予以出口。如果进口保护水平较高，则会增加成本并降低公司的竞争力。

对失去竞争力的恐惧是供应链依赖型国家进口关税下降的一个原因，这也导致不同国家的供应链贸易参与程度不同。在那些参与程度较低的国家，很多都有更高的贸易壁垒，这不仅反映在平均关税水平上，也反映在对作为全球价值链上游投入要素的自然资源的出口限制措施上。不过，一般而言，那些增加贸易成本的国内政策会降低供应链的效率，或增加其他国家位于供应链上游或下游的公司的成本，并抑制该国的供应链投资。

各国政府可能未必意识到政策对投资激励措施和运营的影响。现有贸易协议以及类似的国际合作形式在制定之初并未考虑到供应链贸易。但是，应对这些影响供应链贸易的政策却会对贸易协议和贸易合作形式的确定产生影响，这对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均是如此。那些会导致商品、服务、知识以及专业人士（供应链贸易的全部核心要素）的成本增加的政策，越来越具有监管的特点。其中包括产品安全和健康规则、许可要求以及评估程序等。在监管政策上实现国际合作存在难度，因为监管机构担心此类做法会阻碍监管目标的实现。由于许多机构可能在制定和实施产品和工艺规则时都有一定的职责，这使

得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在制定上述规则时没有考虑到它们将如何对供应链激励措施产生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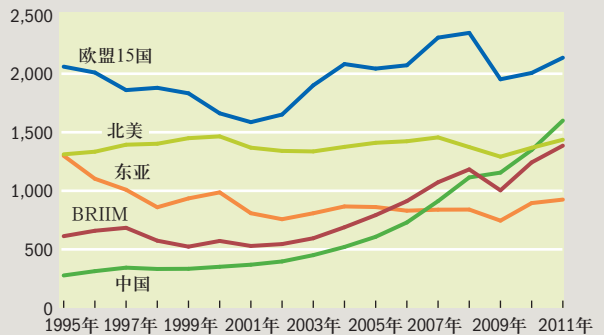
从供应链贸易的角度来看，贸易便利化比国际贸易谈判更加有效，因为后者是孤立地针对产品标准、海关估值以及进口许可等具体政策领域。而对于供应链运营而言，起决定作用的是对供应链整体产生

图1

附加价值

中国和其他参与供应链贸易的新兴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制造业中所产生的附加价值持续增加。

（附加值，10亿，1995年美元）



资料来源：Timmer等人（20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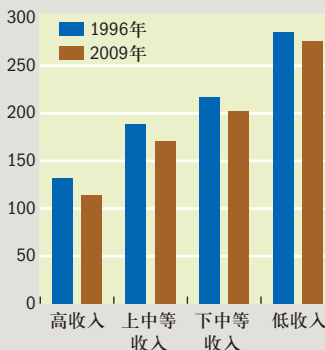
注：东亚包括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BRIIM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土耳其。欧盟15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北美包括美国和加拿大。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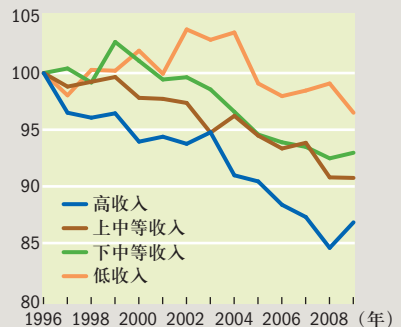
成本是重要因素

供应链贸易发展不均衡的一个原因在于，低收入国家的国际贸易相关成本要远远高于更为富裕的国家。

（贸易成本，从价等值）



（贸易成本，指数，1996年=100）



资料来源：Arvis等人（2013年）。

注：以上左图中的柱状代表每个国家与其前十位贸易伙伴的平均贸易成本，以价值隐性税收（从价等值）的形式体现。右图代表在一段时间之内贸易成本的变动趋势。贸易成本是国内交易成本与国际交易成本之差，体现了地理距离、贸易壁垒、边境政策以及基础设施或国际交通便利等因素的影响。成本根据样本中178个国家各自的贸易和生产数据得出。将各国根据基于个人年均收入的世界银行收入分类来进行分组：低收入为1035美元或以下，下中等收入为1036—4085美元；上中等收入为4086—12615美元；高收入为12616美元或以上。

影响的所有监管政策。如果采取逐项解决的方法可能会遗漏一些重要的政策领域，这提示我们，贸易官员在制定贸易协议时应该更多地考虑整体供应链的情况 (Hoekman 和 Jackson, 2013 年)。

公私合作关系

在制定更具综合性方法的过程中，第一步是选择六个左右供应链并创建一个机制——一个供应链“委员会”，借此将相关各国的企业界、监管机构以及贸易

供应链委员会的一项关键任务是制定一项应对最具危害性政策的计划。

官员汇聚在一起，以确定对其运营产生最大危害的政策约束。企业的积极介入和参加十分关键，这是因为监管机构和官员通常对供应链的运作方式以及政策对其产生影响的方式并不了解。

监管政策通常基于某种依据，如确保人员健康和安。但是，不同机构之间由于彼此缺乏沟通可能在规则制定和要求上存在重复和重叠的现象。例如，一家进口乙酰用于生产阿司匹林和扑热息痛（也称为醋氨酚）的美国化工公司通常必须遵守五个不同部门制定的类似规定，而这五个部门彼此之间通常缺乏沟通和协调。结果，该公司的三批货物有一批被延误，而每延误一天将对该公司造成 6 万美元的损失 (WEF、Bain & Co. 和 World Bank, 2013 年)。供应链委员会可以通过集中进行供应链分析，帮助确定所存在的规则重复现象以及进行整合的各种可能性。

供应链委员会的一项关键任务是制定一项应对最具危害性政策的计划。相关监管机构以及负责经济政策的政府官员的参与是必须的，以便使委员会决定在不影响监管目标实现的前提下帮助企业降低合规成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企业界可以帮助确定潜在的解决方案。

上述公共和私有领域的供应链合作应该针对每个供应链建立一个政策绩效基准，以便对政策变化的影响予以监测。基准应基于有关具体结果的数据，如延误时间、清关时间的变化以及争议解决机制的使用和效率。对效果进行测量非常重要，因为假设其他政策继续增加额外成本的话，那么取消重复和多余的监管成本就不会产生助益。企业界必须为绩效监测提供所需的数据。

上述建议发挥实效还需解决如下问题：

- 公司出于竞争性方面的考虑可能不愿意提供相关

数据，且通常也不愿为其目前尚未进行整理的数据的收集花费额外费用。绩效指标的制定基于公司收集的数据，这些数据的基础越好，就越利于供应链委员会在较长一段时间之内进行直观的结果监测。

• 政府可能不相信企业所提供的数据，而企业则担心提供的数据会被竞争对手利用。这就需要对数据进行汇总，使外界无法确定哪些企业提供了信息。目前已有一些优秀的模式，如公司和家庭调查所制定的模式，可用于解决上述问题。必须由一家机构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处理，该机构需具备相应技术能力并独立于企业界。

供应链贸易为低收入国家跻身于“世界工厂”之列提供了新的机会。为上述贸易提供便利不仅需要降低国内贸易成本，尽管这是参与各种类型的此类贸易的最重要前提，还需要进行国际合作以降低重复性监管政策对贸易带来的阻碍作用。不论是世贸组织、欧盟和美国正在谈判之中的《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等区域性贸易协议，还是涉及发展中经济体的协定，基于公共和私有部门之间密切合作的新的方法均将有助于提高贸易合作在支持供应链贸易中的相关性。■

伯纳德·霍克曼 (Bernard Hoekman) 是欧洲大学学院罗伯特·舒曼高级研究中心的教授。

参考文献：

Arvis, Jean-François, Monica Alina Mustra, Lauri Ojala, Ben Shepherd, and Daniel Saslavsky, 2012, Connecting to Compete, 2012: Trade Logistics in the Global Economy (Washington: World Bank).

Arvis, Jean-François, Yann Duval, Ben Shepherd, and Chorthip Utoktham, 2013, "Trade Cost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1995-2010,"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6309 (Washington: World Bank).

Hoekman, Bernard, and Selina Jackson, 2013, "Reinvigorating the Trade Policy Agenda: Think Supply Chain!" VoxEU, January 23. www.voxeu.org/article/reinvigorating-trade-policy-agenda-think-supply-chain

Timmer, Marcel P., Abdul Azeez Erumban, Bart Los, Robert Stehrer, and Gaaitzen J. de Vries, 2013, "Slicing Up Global Value Chains," GDGC Research Memorandum 135 (Groningen, Netherlands: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World Economic Forum (WEF), Bain & Co., and World Bank, 2013, Enabling Trade: Valuing Growth Opportunities (Geneva: WEF).



谁让基尼系数飙升？

英国伦敦一家商店外无家可归的妇女和购物者。

大卫·福尔切里、普拉卡什·洛嘉尼

收入差距再创历史新高。2012年，美国10%的有钱人将全国一半收入揽入囊中。自20世纪20年代起，这种近似掠夺的情形在美国尚属首次。2008—2010年，经合组织成员国收入差距相比之前12年加速扩大。而许多发达经济体最近几年的差距扩大态势更是过去20多年中最严重的。

差距缘何继续扩大？原因有很多（Milanovic, 2011年）。最近几十年的技术变革让精通电脑及信息技术的人才获得了优势，而全球供应链又使得技术

含量较低的工作能够在发达经济体之外完成，因而发达经济体对高技术类人才的需求增加，其薪酬相对低技术人才也有所提高。

我们的最新研究发现，另外两个因素也直接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一个是资本市场开放，允许外国资本进入竞争，也就是所谓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另一个是政府削减预算赤字的政策举措，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即指财政整顿，或者如批评家所称的紧缩政策。

这并非意味着各国不能进行资本账

资本账户自由化和财政整顿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加剧了收入差距

户自由化亦或财政整顿。毕竟这些政策举措也非一时兴起，它恰恰反映了政府对于其经济振兴作用的判断。该研究所表明的是，各国政府在考虑其政策福祉的同时，也应权衡其对分配的影响。因为，很多时候政府

开放资本账户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扩大收入差距。

对于是否减少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有很大的决定权。IMF 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2012 年）敦促“各成员国要致力于制定效率与公平并济的财政政策，特别要重视在共同承担调整成本方面实现公平并保护弱势群体”。

引发收入差距

根据 IMF《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Annual Report on Exchange Arrangements and Exchange Restrictions)，过去 30 年间，跨境金融交易的限制措施数量持续下降，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数稳步提高，跨境交易限制不断减少。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收入差距扩大——以基尼系数衡量（所谓基尼系数是指一国收入均等分配时系数为 0，如果收入为一人所占，则系数为 100 或 1）（见图 1）。

为了揭示上述两项指标变动的关联性，我们对影响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数波动较大的事件进行了研究。这些事件可能表明，政府似乎有意采取了相关政策开

放金融领域。根据这一标准，在 17 个发达经济体中，与大规模资本账户改革有关的大事共有 58 个。

在这些大事之后，收入分配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事实证明，在开放资本账户以后会出现收入差距的持续大幅扩大。开放一年后，基尼系数上升约 1.5%，五年后上升约 2%（见图 2）。

这一结论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在研究中已经详细阐述了这一点（Furceri、Jaumotte 和 Loungani，即将发表）。即使在考虑诸如产量、对外贸易开放度、政府规模变化、产业结构变化、人口统计学以及产品、劳务、信贷市场变化等决定因素的情况下，资产账户自由化加大收入分配不均的结论仍然成立。

开放资本账户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扩大收入差距。例如，许多融资受限的企业因为资本账户开放而获得外国资本。如果资金与技术互补效应较大，那么开放就会直接导致高技术人才需求的增加，从而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事实上，行业对外融资依赖程度越大，资金与技术互补性越强，则资本账户开放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越大（Larrain，2013 年）。

谁的利益受到损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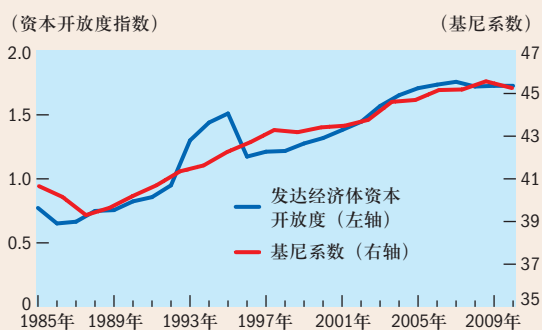
削减开支、增加税负是政府常用的用于削减预算赤字的财政整顿手段。因此，历史是最好的研究素材。我们选取了过去 30 年中 17 个发达经济体共 173 次财政整顿事件。据统计，每次整顿方案削减的预算赤字约占 GDP 的 1%。

大量事实表明，预算赤字减少的背后是收入差距的扩大。整顿政策实施之后的两年，基尼系数上升约 0.2 个百分点，而八年后则上升近 1 个百分点（见图 3）。

图1

开放会带来危害吗？

过去20年间，发达经济体资本账户自由化与收入差距同步增长。



资料来源：资本账户开放度：Chinn-Ito (2008年)；基尼系数：Solt (20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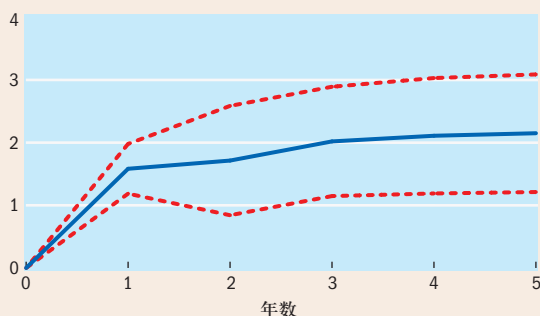
注：17个经济体的平均值，包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英国、美国。

图2

只有一部分人能够轻松赚钱

伴随资本账户自由化随之而来的是收入差距的扩大。

(资本账户开放后数年后对基尼系数的影响，百分比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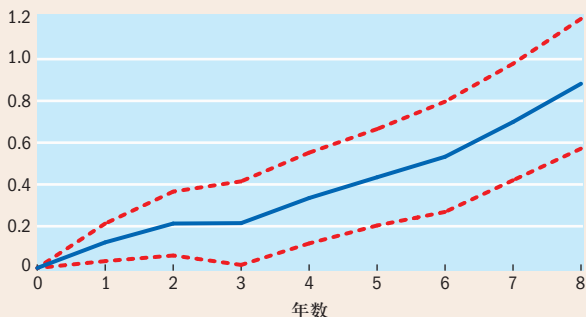
注：该图显示的是点估算值，误差范围为1个标准差。详情请查阅本文及Furceri、Jaumotte和Loungani的文章（即将发表）。

图3

艰难的削减

过去30年的财政整顿导致收入差距扩大。

(财政整顿实施数年后对基尼系数的影响, 百分比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

注：该图显示的是点估算值，误差范围为1个标准差。详情请查阅本文及Ball等人的文章（2013年）。

可能有人解释说，虽然财政整顿与收入差距扩大同时发生，但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例如，经济衰退或者经济增速放缓时，收入差距扩大，债务与GDP之比上升，政府实施财政整顿的可能性加大。然而，排除经济衰退及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财政整顿扩大收入差距的结论仍然成立。以上结论的可靠性在最近IMF的两篇报告中(Ball等人, 2013年; Woo等人, 2013年)均有验证。

财政整顿可以通过许多渠道扩大收入差距。例如，削减社会福利以及公共领域的薪酬和就业（通常与财政整顿相关），这都会对低收入人群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而长期失业与收入大幅下降相关，使得财务整顿对长期就业的影响成为另外一个可能的渠道(Morsy, 2011年)。

政策教训

无论资本账户自由化还是财政整顿政策都带来了收益。前者是使国内公司获得国外投资——往往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让国内企业在取得外国资本的同时，获得相应技术。而国内的储户也可进行境外资产投资，如果管理到位，多样化投资将获得收益。同样，财政整顿一般用于将债务降至安全水平，而较低的债务有利于利率回落，长此以往，政府债务利息负担减小，可以承担减税成本。

然而，当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以至政府不得不加以考虑时，如何权衡收益与公平则变得十分重要。再三考虑之后，政府出台相关政策调整收入差距，如大力实施累进税，保护弱势群体社会福利等。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财政整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而通过加强中低收入劳动者的教育与培训，也可在一定

程度上减缓长期收入差距的扩大。■

大卫·福尔切里(Davide Furceri)是IMF研究部经济学家，普拉卡什·洛嘉尼(Prakash Loungani)是该部门顾问。

参考文献：

Ball, Laurence, Davide Furceri, Daniel Leigh, and Prakash Loungani, 2013,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Fiscal Consolidation," IMF Working Paper 13/151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hinn, Menzie D., and Hiro Ito, 2008, "A New Measure of Financial Opennes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Vol. 10, No. 3, pp. 309-22.

Furceri, Davide, Florence Jaumotte, and Prakash Loungani, forthcoming,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MF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Lagarde, Christine, 2012, *op-ed*, China Daily, December 28.

Larrain, Mauricio, 2013,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Wage Inequality,"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Research Pap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Milanovic, Branko, 2011, "More or Less," Finance & Development (September).

Morsy, Hanan, 2011, "Unemployed in Europe," Finance & Development (September).

Solt, Frederick, 2010, 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Version 3.0.

Woo, Jaejoon, Elva Bova, Tidiane Kinda, and Y. Sophia Zhang, 2013, "Distributional Consequences of Fiscal Consolidation and the Role of Fiscal Policy: What Do the Data Say?" IMF Working Paper 13/195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沉闷的科学?



在我们的播客上聆听对顶级经济学家及决策的采访：
www.imf.org/podcasts。

致命弱点

拉维·巴拉里斯南、查德·斯坦伯格、司马喆

收入不平等 制约亚洲续 写增长奇迹

在过去的25年中，亚洲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全球其他所有地区，许多人将未来贴上“亚洲世纪”的标签。随着该地区成功地融入全球市场，其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也逐渐涌现，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世界经济在未来数十年中将加快向亚洲的转移。

不过，收入不平等这个问题在过去的25年中一直与亚洲的增长如影随形，对该区域的未来发展前景带来了威胁。自相矛盾的是，亚洲的增长在降低绝对贫困的同时也扩大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这种贫富的两级分化不仅为该地区的经济成就带来了污点，而且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亚洲所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将无法得以实现。因此，该地区的政策决策者正在寻求有效途径来遏制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并实现包容性增长。

本文分析了收入分配不公现象逐步恶化的原因、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为提高亚洲增长的包容性可以采取的措施。

包容性增长非常重要

整个社会关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不公不应该仅局限于伦理道德方面的因素，还应该考虑到其更加切实的影响。

对于给定的增长率而言，分配不公日益严重通常意味着减贫力度的减弱。大量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收入差距与经济形势的恶化（如增长率降低、波动性

加剧等）具有相关性。在基本层面上，通常认为收入差距会因限制社会中人力资本的积累等原因而阻碍经济的发展和增长（见“扩大还是缩小”，《金融与发展》2011年9月号）。博格和奥斯特拉亚（Berg和Ostry，2011年）在其近期著作中也认为，在不平等的社会中实现长期可持续性增长的可能性较小。

概括性地衡量收入分配情况的最常用标准是基尼系数。该指数在0和100之间变动，其中“0”表示完全平等，即每个人都拥有相同的收入，而“100”则表示完全不平等，全部财富都由一个人掌握。基尼系数越低，则收入在社会不同成员之间的分配就越平等。在瑞典和加拿大等分配平等程度较高的社会中，该指数在25—35之间，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基尼系数集中在40左右。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基尼系数则更高。

一个国家基尼系数的长期变化情况可以显示其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包容性”，即该国的福利是否更多地被各个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所分享。基尼系数的下降表示收入的分配正在变得更加均衡。

从更窄的范围来看，我们可以特别关注一下那些最弱势的群体，比如位于最底层的20%人口，看看他们能够分享到多少经济增长的成果。例如，我们可以讨论国民收入增长1%将会为他们带来怎样的影响。如果其收入至少增长1%，则可以认为经济增长是具有包容

印度孟买的公寓楼和工人住房。

印度和中国的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状况

自从中国和印度分别于30年前和20年前开始实现经济腾飞以来，这两个世界人口大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至90年代中期间的下降速度是最快的，这得益于农村经济改革、初始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低以及医疗保健和教育机会的获得。1981年，中国是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84%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贫困比例之高，居全球第五位。到2008年，贫困人口比例为13%，远远低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印度也实现了减贫，但速度低于中国。1981年，60%印度人口的每天生活费不足1.25美元，贫困人口比例低于中国。到2010年，其贫困人口的比例降至33%，但比中国的贫困人口

比例还是高出1.5倍。

不过，收入不平等现象在上述两个国家中均有所加剧。根据官方估计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指数为零时表示收入分配最为公平，指数为100时表示最不公平）从20世纪中期的37上升至2008年的49。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12年）的资料，印度的基尼系数也从1993年的33上升至2010年的37。同时，基于性别、种姓以及社会服务的获取等方面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

中国和印度的整体不平等之中，有1/3至2/3反映了农村和城市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

性的。但是，如果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不足1%，则经济增长不具包容性，因为经济增长使这部分人群更加贫困。

亚洲创纪录增长背后的瑕疵

在过去的25年中，大多数亚洲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要高于其他新兴市场。这样的快速增长显著降低了绝对贫困人口（处于极端贫困之中的人口，每天生活费在1.25美元以下）的数量，由1990年的15亿多人降至2008年的8.5亿多一点，几乎减少了一半。尽管亚洲在减贫方面的整体表现不俗，但该地区依然生存着全球2/3的贫困人口，其中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就占了几乎一半（见专栏）。

此外，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在整个亚洲有增无减。对于该地区而言，这是一个新的现象，与1990年之前持续30年之久、引人注目的经济起飞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实现经济平等增长”是那一时期的主旋律，当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将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相对较低水平的分配不平等（在很多情况下，出现了分配不平等的下降）结合在一起。因此，亚洲近年来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不良记录与之前相比是个巨大的倒退。

从国际上看，在过去的25年中，亚洲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有甚于全球其他所有地区（见图1）。在中国和东亚尤为突出，该地区的基尼系数多处于35和45之间，不过这依然低于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上述地区的基尼系数都接近50。但在过去的25年间，拉美国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及中东和北非）却逆全球趋势而行，总体上降低了分配不平等，缩小了与亚洲之间的差距。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亚洲居民的购买力已经提高，但处于最底层的20%人口的收入增长并没有达到其他阶层的增幅（见图2）。这在包括中国和大部分南亚等欠发达经济体以及中国香港、韩国、新加

坡、中国台湾等更为发达经济体中均为如此。亚洲的经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拉美经济体）形成了鲜明对比。自1990年以来，拉美经济体中最底层的20%人口的收入增长幅度超过了其他阶层。毋庸置疑，亚洲在过去25年中在增长率方面居全球之首，但其增长的性质在所有新兴经济体中大概是最不具包容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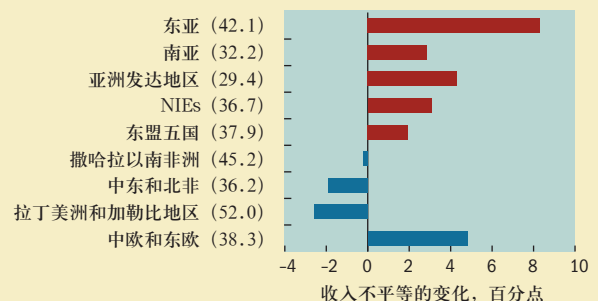
欠缺包容性

在过去的25年中，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已经成为一个几乎全球性的现象，基尼系数的不断上升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均已成为常态。许多分析人士将基尼系数增长的部分原因归结为任何单一国家均无法

图1

欠缺平等性的增长

在过去的25年中，亚洲的收入不平等恶化速度超过了全球其他任何区域，尽管其收入不平等总体水平低于拉美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资料来源：环亚经济数据；各国当局；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收入不平等数据库；世界银行，PovcalNet数据库；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收入不平等情况的变化反映了基尼系数的点变化，按人口加权。基尼系数在0至100之间，0表示完全平等，所有人都具有相同的收入；100代表完全不平等，其中一个人拥有全部收入。NIEs包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东盟五国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括号中的数值是最近的基尼系数。

控制的国际性力量，如全球化趋势和更加青睐技术工人的技术变革。

亚洲的经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历的不同之处说明，除全球性因素外，亚洲的增长可能存在一些导致该地区收入不平等恶化的特定因素。我们的分析显示，这些特定因素包括财政政策、劳动力市场结构、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的获取等，针对这些因素作出改进可能会扩大亚洲增长受益的惠及面，并进而实现增长的可持续性。增加教育支出、提高受教育年限和劳动力

亚洲财政政策的再分配影响受到较低的税收/GDP之比的严重制约。

的收入比重以及出台改善金融服务可获得性的政策等均可显著提升增长的包容性，即当平均收入上涨时，最贫困人群收入的上涨幅度。亚洲在上述许多领域均处于落后状态。

由于政策选择的原因，社会部门的公共支出处于低水平：亚洲在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相对较低，这说明财政政策（税收和支出政策）在增强包容性方面可以发挥重大作用（见图3）。据估计，在发达经济体中，税收和转移政策（如那些针对福利和失业的政策）通常可以将收入不平等降低 1/4 左右（以基尼系数来衡量）。相比之下，亚洲财政政策的再分配影

响受到较低的税收 /GDP 之比的严重制约，亚洲的税收占 GDP 的比重平均仅为发达经济体的一半，在所有发展中地区中处于最低（Bastagli、Coady 和 Gupta，2012 年），这导致该地区极低的社会支出水平。对累进程度不足的税收和支出工具的更多依赖也使收入不平等加剧。在亚洲，对商品和服务消费所征收的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一半，而该比例在发达经济体仅为 1/3。此类税收更多地由穷人承担。

劳动力的收入比重大幅下降：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数据（2012 年），过去 20 年间整个亚洲的劳动力在总收入中所占份额显著下降，而资本所占比重相应上升，平均值约为 15 个百分点。这导致了收入不平等，因为资本收入通常为富人所得，而在正式部门就业的贫困人口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工资。技术进步也是资本在国民收入所占份额增加的部分原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经济增长不再像过去那样引发劳动力需求的大幅上涨。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力的收入份额变化可能也与亚洲部分地区对具有高资本劳动力比率的产业的特殊偏爱有关。这种产业上的倾斜体现在上述地区的制造业和出口主导型政策，与其快速增长率相比相对较低的就业收益以及财富集中在企业而非居民手中等方面。此外，不断恶化的收入不平等与劳动者相对较弱的议价能力有关。在亚洲，许多劳动者在管理不规范的非正式部门从事着繁重的劳动，收入水平不高。此外，即使在正式部门，低技术劳动者在提高相对工资方面也基本没有议价能力。

金融服务覆盖很少：缺乏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是亚洲许多地区的一个主要障碍，在这些地区，超过一半的人口以及大部分中小型企业无法获得银行、保险以及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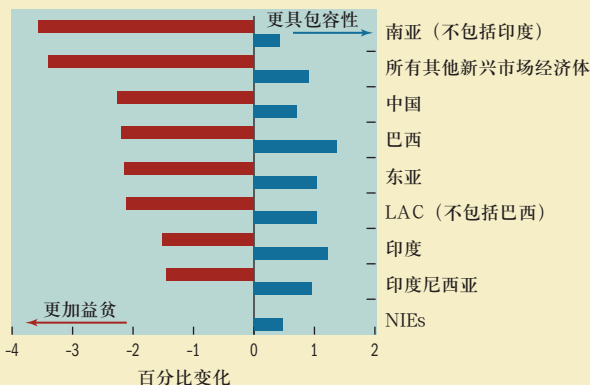
图2

不成比例的改善

尽管亚洲的增长促进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大量减少，但在帮助贫困人口改善相对地位方面效果并不显著。

（自1990年以来的减贫情况）

（包容性程度）



资料来源：佩恩表7.0；世界银行，PovcalNet数据库；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红条代表增长的益贫程度，也就是说整体人均收入增长1%会带来多大的绝对贫困（人均每天收入在2美元以下）减贫影响。没有NIEs的相关数据。蓝条代表增长的包容性程度，及整体人均收入增长1%会对最贫困的20%人口带来多大的收入变化影响。东亚包括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LAC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NIEs包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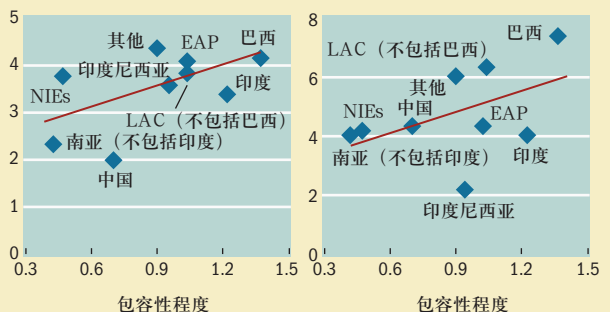
图3

增加支出以改善收入不平等

在教育和医疗保健上增加支出有助于提高社会最贫困人口的相对收入。

（教育支出，占GDP的百分比）

（医疗保健支出，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注：EAP指东亚和太平洋地区。LAC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NIEs包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其他”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包容性的程度反映总体人均收入变化1%对最贫困的20%人口收入增长的影响。

券等正式金融体系的服务。有关研究显示，金融发展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也有助于促进分配的均衡性。这是因为，缺乏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以及与交易和合同执行相关的成本对贫困人口及小企业主最为不利，这部分人群通常缺乏抵押品或信用历史以及业务关系。上述不足之处导致贫困人口几乎无法获得融资，即便他们掌握着高预期回报的项目也是如此。通过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工具的开发（如可以帮助企业和个人更好地应对意外事故或死亡的保险产品），政府既可以促进增长也可以帮助提高分配的公平性。

改善绩效

那么，在此基础上采取什么类型的政策能够帮助亚洲经济体纠正近年来增长缺乏包容性这一问题？

财政政策：亚洲各国政府在保持财政审慎的同时，必须提高在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提高税收在GDP中的比例来实现，尤其是通过更具累进性的税收体制或者通过增加直接税税基来扩大财政政策在重新分配方面的影响。同时，应增强针对弱势家庭的社会支出。在低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有条件的现金转移计划（如要求家庭遵循社会所鼓励的特定做法，例如提高就学率或接种疫苗）的应用在不断增加。巴西的“家庭补助金”和墨西哥的“机会”计划是其中两个规模最大的，在提高贫困人口收入方面被公认为是成功的计划。

劳动力市场政策：改进农村就业计划的劳动力政策可以提高正式部门的就业人数并降低非正式部门的规模，消除劳动力流动性的阻碍因素以及改善劳动者

的培训机会并提高技能，从而可以向低技能人员提供政策倾斜。此外，一些国家引入了最低工资制度并提高最低工资，这也对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提供了支持。例如，中国于2013年2月公布了一项包含35个要点的计划以应对收入不平等，其中的一条指出将于2015年之前在大多数地区将最低工资提高至平均工资的40%以上。总之，我们发现包容性与就业保护程度以及最低工资水平呈正相关（见图4）。

金融服务：基于国际经验的建议包括通过促进农村金融提高信贷的可及性、发放微额信贷（针对小型初创企业的小额贷款）、为贫困人群贷款提供补助、促进信用信息分享并为初创型企业培育风险资本市场。

坚持到底

如果亚洲国家采取政策措施来扩大增长的惠及面，尤其是通过提高医疗保健和中小学教育的支出、强化社会安全保障网、为低收入劳动者进行劳动力市场干预以及增强金融服务方面的包容性，则这些国家有可能遏制收入不平等的进一步恶化。

许多上述政策还可以同时降低对资本和大型公司实体的青睐，扩大经济增长给居民收入和消费带来的益处。如此一来，这些政策也可以促进亚洲的经济模式发生必要的改变，从外部需求驱动转变为内部需求驱动，这将使该地区的增长奇迹持续更长时间，并为全球的再平衡做出贡献。这么做意义重大。如果亚洲不对收入不平等进行纠正，则该地区将很难在未来数年中继续保持其高增长率，也无法占据全球经济的核心地位。■

拉维·巴拉克里斯南（Ravi Balakrishnan）是IMF西半球部副处长；查德·斯坦伯格（Chad Steinberg）是IMF战略、政策和检查部高级经济学家；司马喆（Murtaza Syed）是IMF驻中国副常驻代表。

本文基于IMF 2013年的工作论文“The Elusive Quest for Inclusive Growth: Growth,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Asia”。

参考文献：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2, “Outlook 2012: Confronting Rising Inequality in Asia” (Manila). www.adb.org/publications/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12-confronting-rising-inequality-asia

Bastagli, Francesca, David Coady, and Sanjeev Gupta, 2012, “Income Inequality and Fiscal Policy,”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2/0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2/sdn1208.pdf

Berg, Andrew, and Jonathan Ostry, 2011, “Inequality and Unsustainable Growth: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1/08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1/sdn1108.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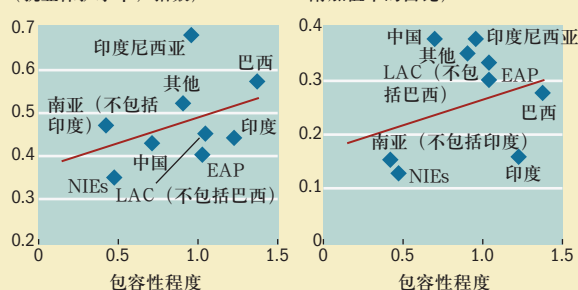
图4

劳动法发挥一定的作用

当就业保障力度较强，同时最低工资水平较高时，贫困人口的经济状况会有所改善。

（就业保护水平，指数）

（最低工资在每位劳动者创造的附加值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

注：就业保护指数所衡量的是劳动法的保护作用，是替代雇佣合同、额外工作成本、员工雇佣成本和解聘程序的平均值。EAP指东亚和太平洋地区。LAC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NIEs包括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其他”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包容性的程度反映总体人均收入变化1%对最贫困的20%人口收入增长的影响。

公正的评估

房产税是一种减少不平等的有效但不受欢迎的方式

约翰·诺雷加尔

正如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南非近年来也面临着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问题。在南非开普敦的某个高档住宅区里，一套面积为 1600 平方英尺的公寓标价在 48 万美元左右。按照当前税率计算，业主每年需向当地政府缴纳约 2700 美元的房产税。

相比之下，如果是在吸引力较小的地区，假设某人购买了一套价格相当于其 1/10 的公寓，房主无需支付上述房产税的 1/10，也就是 270 美元/年，而是按照更低的比例，每年只需支付 150 美元。

政府能够通过房产税将富人的财富重新分配给穷人，从而减少所在选区的不平等问题（虽然按理说重点应放在所

有政府税收和支出总和对再分配的影响）。但是，政府通常未能充分利用房产税来解决收入和财富的不均等问题和增加收益，原因是房产税不受欢迎（可能因为很难逃避）且难以管理。

广义上来说，“房产税”通常包括一系列征税，例如基于不动产价值（或大小）的年度税、销售不动产税、净财富税、继承和赠予税、证券转让税。我们在本文中使用的概念为传统和狭义的常规不动产税。这些税收的运用可以追溯到古代，例如古中国和古希腊时期（《经济学人》，2013 年）。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温斯顿·丘吉尔等杰出人物曾强调这类税收的优良特性。近期，各国掀起了一阵通过房产税增加收益的高潮，其中包括哥伦比亚、中国、克罗地亚、埃及、希腊、爱尔兰、利比里亚和纳米比亚（详见 Norregaard, 2013 年）。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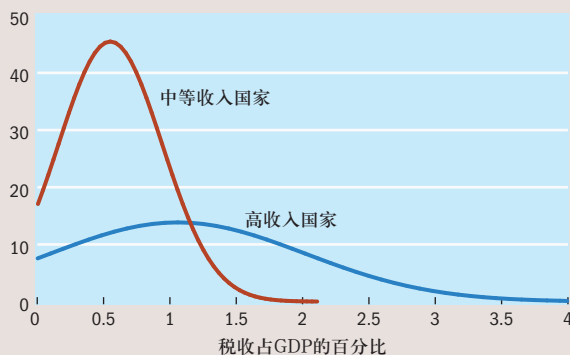
潜在收益

在大多数国家，不动产税所产生的收益十分有限。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房产税收益占 GDP 的 1% 左右，是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 2.5 倍，后者所占比重仅为 GDP 的 0.4%（尚不清楚税收收益在低收入国家的重要性）。此外，这两类国家内部的税收收益也存在巨大差异，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见图）。税收收益的巨大差异无疑反映出民众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税收的使用以及税收管理

税收依赖性

高收入国家的房产税存在显著差异——从几乎为零（克罗地亚、卢森堡和瑞士）到 2% 以上（法国、日本、英国和美国）。而中等收入国家对这类税收的依赖程度较低。

（国家比例，百分比，2010 年）



资料来源：IMF，《政府财政统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IMF 工作人员的计算。



南非开普敦的海滨住宅区。

面临的技术限制，但同时也表明税收使用存在较大的提升潜力。

中等收入国家的最高收益水平恰巧是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即占 GDP 的 1%。这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而言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总体收益指标。然而，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等一些高收入国家，年度财产税收占 GDP 的 3% 以上，另外法国、以色列、日本和新西兰等国的比例为 GDP 的 2% 以上。因此，占 GDP 2%—3% 的指标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似乎是一个实际的长期目标。

旨在扩大税基、提高税率的财产税改革被许多国家列为重要政策议题。虽然各国的原因各不相同，但普遍反映出增加税收以减少赤字、推动其他税收减免的需要，以及对于效率和公平的考虑。另外一些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近期提高了财产税，旨在压制房价的强势上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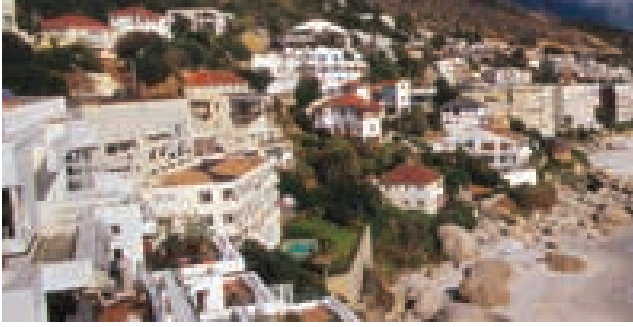
财产税一般被认为比其他税收（尤其是所得税）更有效，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财产税并不会抑制工作、储蓄和投资。此外，由于涉及不动产，此类税收比其

他税收更难逃避。房产价值体现了特定位置属性：政府能够轻易发现位于湖边的一座舒适的避暑别墅，房主也不可能把其隐瞒在离岸银行账户内。

政府能够通过财产税将富人的财富重新分配给穷人。

有关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研究普遍发现，与其他税收形式（尤其是直接税）相比，不动产税收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很小（OECD，2010 年）。但是，住宅房地产征税通常比商业房地产征税的效率更高，因为土地和建筑物是生产的中间投入。税收作为一种粗略的服务付款方式的情况除外。

财产税改革容易引起政府间的紧张局面。常见并且广受推崇的做法是将税收收益分配到地方政府层面。毕竟，公开提供的本地服务质量通常体现在房产价值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税收主要由中高收入人群负担。

中。地方征税可以改进问责制，提高政治机构的效率，但可能需要减少部分政府间的转移。此外，有必要制定最低和最高税率协议，限制地方政府之前的税收竞争（削弱对方）和税收输出（将大部分负担转嫁给非居民）。

公平与否？

多年以来，在财产税的公平性，也就是谁承受了实际负担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税收主要由中高收入人群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在不平等程度不断加剧的情况下，人们将许多国家加强财产税的做法视为提高总体税收制度公平性的方式。可以采取各种措施强化累进税，减免低收入或贫困业主纳税负担。例如，可以只对价值超出一定数额的财产征税，然后逐步提高税率；免除年长者或残疾人的税收负担；或是允许低收入家庭“按揭”或延迟支付财产税。如果财产税确实按照税务专家所称的“受益税”进行收费，与获取的服务价值相等，那么这些变革将不会影响再分配。但是，这在实践中几乎无法实现。

由于财产税具备一些有吸引力的经济属性，例如比其他税种更真实、更公平但收益潜力更大，所以经济学家倾向于大力支持增加对（精心设计的）财产税的依赖。但是，民众普遍反对增加财产税的使用，部分原因是税收的透明度以及避税和逃税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事实上，尽管支持者将财产税称为“完美的税收”（Webb, 2013年），反对者却经常污蔑其为最令人厌恶的税收（Cabral和Hoxby, 2012年）。

财产税不仅不受欢迎，实施起来也有一定的困难。根据市值计算土地和建筑物税收充满挑战性，需要对管理基础设施进行大量投资，其中包括建立综合的官方登记簿，记录物理坐标以及所有权和房产价值数据。这是一项数据密集型工作，通常需要多个实体部门（包括税务机关、地方政府、法院和测绘局）之间进行广泛合作和信息交换。为确保税收收入的增长（税收收入增长与房产价值增长相挂钩）和公平性，需要建立有效的估价系统，通过定期更新跟踪市场价值。虽然

有效计算机辅助集中评估（CAMA）系统的开发极大地简化了估价流程，但仍存在许多实际限制，例如很多国家缺乏有资格的房产估价师。

最后，许多国家并未有效征收财产税，不仅因为它在政治上不受欢迎，还因为在历史上它并未创造大量收益。另外，税收动力不足，因为责任实体未必是最后获得收益的实体。

在加强不动产税收方面存在强有力的经济理由。然而，财产税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仔细的规划和执行，外加基本管理基础设施的改进。在很多情况下，强烈的政治意愿也必不可少。这些因素催生一种创收和减少不平等并重的税收制度，而开普敦房产的例子便是对该税收制度做了很好的诠释。■

约翰·诺雷加尔（John Norregaard）是IMF财政事务部副部长。

本文基于作者所著的2013年IMF工作论文“Taxing Immovable Property: Revenue Potential and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参考文献：

Cabral, Marika, and Caroline Hoxby, 2012, “The Hated Property Tax: Salience, Tax Rates, and Tax Revolts,” NBER Working Paper 18514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The Economist, 2013, “Governments Should Make More Use of Property Taxes,” June 29. www.economist.com/propertytax13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2010, “Tax Policy Reform and Economic Growth,” Tax Policy Studies No. 20 (Paris). www.oecd.org/tax/tax-policy/46605695.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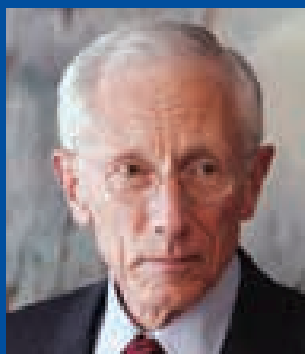
Webb, Merryn Somerset, 2013, “How a Levy Based on Location Values Could Be the Perfect Tax,”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27. www.ft.com/cms/s/2/392c33a6-211f-11e3-8aff-00144feab7de.html#axzz2ik1AY700

经济学人物

一览经济学家的风采



保罗·克鲁格曼



史丹利·费希尔



恩戈齐·奥孔约-维拉



劳拉·德·安德烈·泰森



彼得·布莱尔·亨利



林毅夫



《金融与发展》的“经济学人物”专栏对全球金融和经济领域的一些诺贝尔奖得主、政策制定者以及智慧的领导者进行了富有独到见解且深刻的采访。让读者能够一览我们这一时代的伟大经济学思想家们的风采。

www.imf.org/people

全球房价节节攀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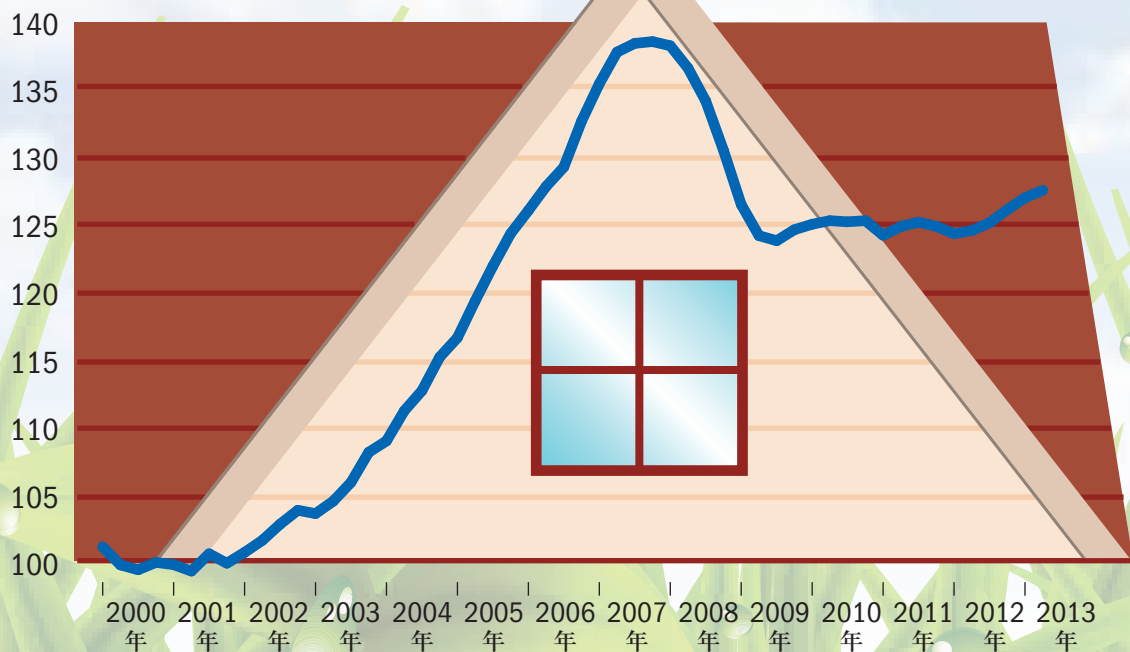
房地产市场正在复苏，然而很多国家的房价仍然过高

全球房价在 2013 年第二季度再次攀升至新的水平。这是自 2012 年年初以来，房价连续上涨的第六个季度。在 IMF《全球房地产价格指数》中，51 个发达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里有 32 个的房价出现上涨，而在房地产危机严重的 2009 年第二季度仅有 9 个。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增长和下降更为均衡。但很多 OECD 国家的房价与租金之比——这是衡量房价的典型工具——仍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将房价调控至合理水平仍存空间。例如，加拿大的该比率高出平均水平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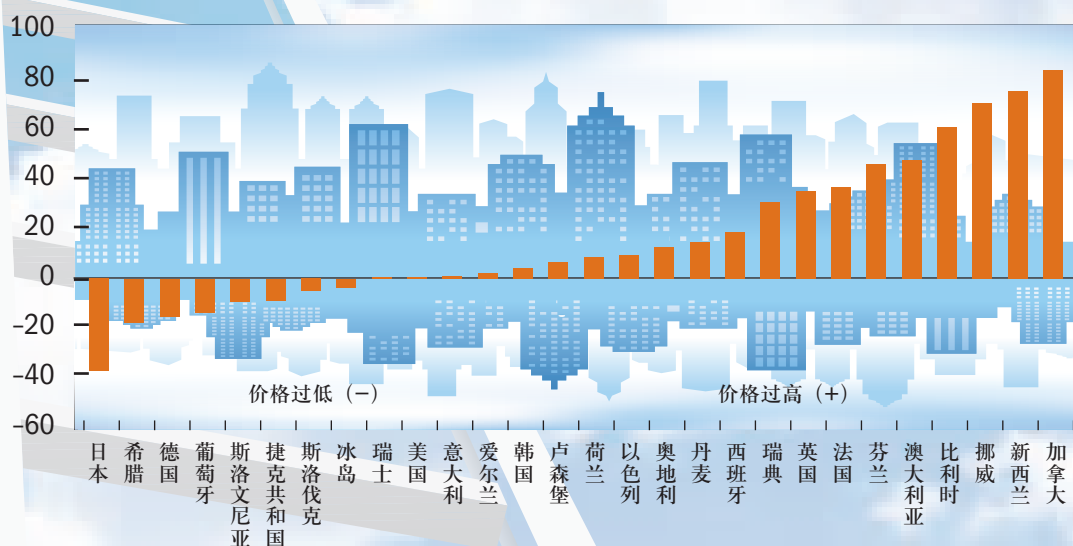
房价上涨，但增速放缓

(IMF《全球房地产价格指数》，51 个国家的简单平均，2000 年 = 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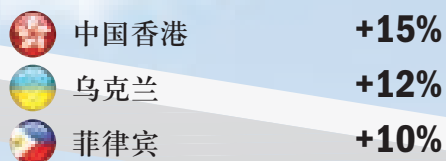


价格并不公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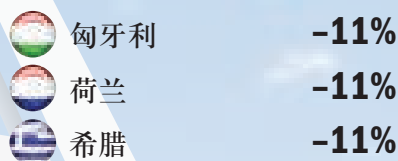
(房价与租金之比, 2013年第二季度, 与历史平均水平的偏离度)



房价上涨最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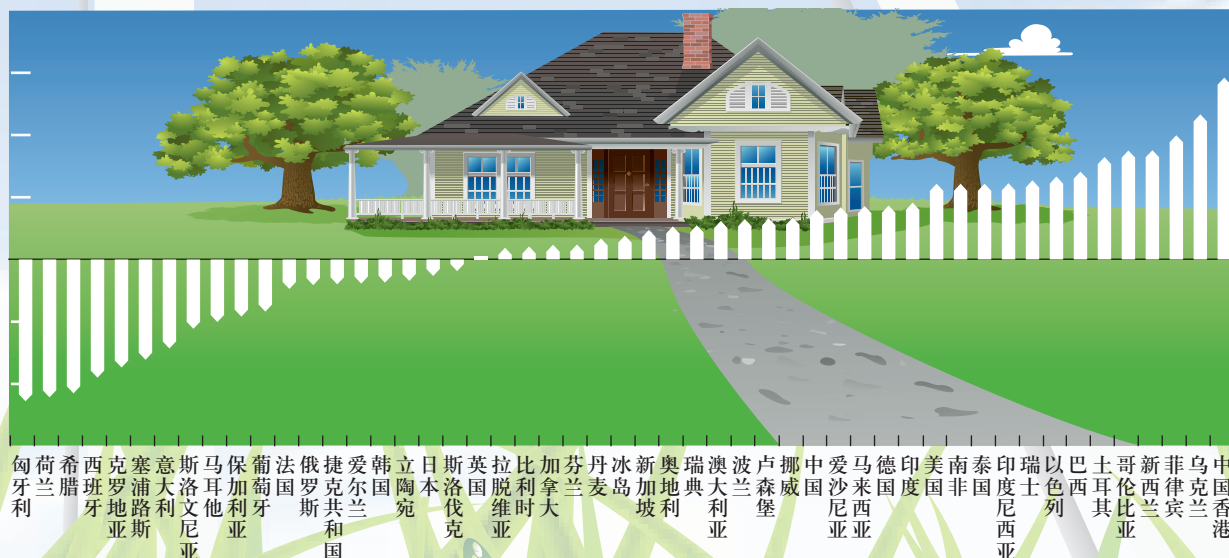


房价下跌最多的



全球房价情况

(年百分比变化, 2013年第二季度)



本文由IMF研究部的海茨·阿希尔 (Hites Ahir) 和普拉卡什·洛嘉尼 (Prakash Loungani) 撰写。数据来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全球贫困指南》以及哈弗分析。除特殊注明,数据均为2013年第二季度的数据,或最近可获得的数据。



土库曼斯坦新的10马纳特纸币的照片插图，上面绘制着该国著名诗人马格图姆格利·皮勒吉（Magtymguly Pyragy）。

新货币

阿克·隆纳博格

启用新货币
是一个复杂的
过程，而
土库曼斯坦
取得了成功

IMF 华盛顿总部那条长达 40 英尺的成员国货币展示走廊一直是参观者的热门“景点”。

尽管某些国家加入了货币联盟并与联盟成员国共同使用同种货币，另有一些国家使用别国（通常为更强大国家）货币，但大多数国家均有本国货币，这是一国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国家在某些情形下必须启用新币。位于中亚的前苏维埃共和国土库曼斯坦就于 2008 年决定启动货币改革。

土库曼斯坦的官方汇率与非官方汇

率（或市场汇率）差距较大，这意味着该国价格系统已经变得复杂和缺乏效率。这种情形又增加了会计与统计报告的复杂程度。因此，该国政府决定在开展市场化改革之前启用新货币。该国将货币改革视为进一步强化宏观经济体系，尤其是货币传导机制的基础：相对美元而言民众对本币的依赖程度越高，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力度就越强。

土库曼斯坦于 2008—2009 年期间针对货币体系开展了全面、有序的彻底

改革，这项改革在诸多方面均可作为其他国家可资借鉴的典范。

重大决策

启用新货币并非草率之举。恶性通货膨胀、汇率大跌、现有货币的严重伪造，甚至战争都可能促使启用新的货币。或者，启用新货币也可能是一项目性的变革举措，例如加入货币联盟（如欧元区等）。

变更一国货币是一项高度政治性的决策。有时，现有货币并不符合经济要求。现金交易、美元化程度高及多种货币同时流通，都是需要进行货币改革的典型经济情形。

在任何经济体，本币兑换外币的价格是最为重要的价格。一些国家针对不同的商品或服务或者进出口实施非市场化汇率，这容易导致经济发生严重扭曲。久而久之，该情形通常会造成长期增长放缓。最终，民众、企业界以及政治家可能会施加压力，促使开展货币改革并启用新货币。

货币改革通常具有复杂性与风险性：全球经验表明，改革并非必定成功。央行与政府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采取必需措施，以确保公司、公众与国际社会感受到新货币具有稳定性，这是成功启用新货币的重要因素。

启用新货币的工作可划分为四个阶段。首先，宏观经济政策完善、金融立法完备等必要的先决条件应当均已实施到位或者正在推行之中。其次，需要开展细致的准备工作，如设立支持改革的政策与流程，草拟整个货币改革的详细预算（包括印制与铸造新币的成本）等。接下来是制造新币。最后，也是最具挑战性的阶段是实施。

做好准备

需要进行货币改革的政府在推行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通常能力有限。如果该国存在恶性通货膨胀，其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显然是不完善的。有时，即使在宏观经济困难的情形下也需开展货币改革。光凭货币改革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货币改革也仅在财政、货币措施予以支持的情形下才能够取得效果。然而，从心理意义而言，启用新货币本身能够促进经济稳定。货币改革有时与汇率统一政策一并实施，以降低官方汇率与非官方汇率并存的混乱情形。

土库曼斯坦在其实施统一汇率与变更货币单位的改革之前能够实现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2006—2007年间，该经济体年增长率超过11%，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个位数，财政状况与国际收支都处于良好状态。

货币改革必须通过金融立法予以支持。对现有法律，包括设立央行的法律以及监管银行与金融机构的法律等应当予以审查，以确保与国际最佳范例保持一

现金交易、美元化程度高是需要进行货币改革的典型经济情形。

致。此外，有必要制定关于特定货币改革的法律法规，同时监管会计与财务报告的法律等其他法律可能需要予以更新。该项工作可以借力于IMF与其他国家央行的技术建议。此等技术支持包括初期的一般性指导以及其他国家关于货币改革的详细建议。

在危机情形下，政府对不同货币的流通即使有控制力，但其控制也极其有限。因此，经济体的美元化程度很高，也就是说许多交易都是以外汇（通常是美元）结算。下一步，政府应当支持一种支持开放性交易与自由市场的汇率制度，一种允许国际竞争且不进行过份保护的汇率制度。

在启用新货币的过程中，央行是政府的左膀右臂，但它未必具备相应的能力。央行可能缺乏具有相关经验的职员，或者在全国范围内没有足够的分支机构以落实改革措施，甚至缺乏支持改革所需的资金。加强央行的机构能力并确保其具有所需资源，是开展货币改革关键性的先决条件。

私人银行也在货币改革中发挥关键作用。但私人银行可能实力较弱，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形同于无。在全球某些地区，非正式资金支付系统（如hawala和hundi）更加活跃，其国内网络比银行更加发达。在此情形下，央行与此等支付系统运营商之间的合作对于改革的成功而言至关重要。

央行必须评估假币流通的程度。央行应当会同财政部、商业银行拟定策略，以避免在货币改革的关键落实阶段出现假币增加的情形。

央行应当在货币改革前期拟定整个改革的预算，并应当随着改革的推进视需要修订预算。IMF能够提供拟定此等预算的技术建议。

启用新货币是一项非常复杂的项目，并要求具备完善的会计系统。在改革全程的不同阶段均必须具备适当的经过验证的会计系统，使独立审计师确保对货币改革进行正确的财务报告与会计核算，以保障货币改革的完整性。该项工作的失败并不仅仅关乎成本，还可能潜在地对货币改革的声誉造成破坏性影响。

所有此等准备工作都很重要，但货币改革的成功还取决于成功的公众教育计划。央行应当与其他机构、金融业代表、商人与公众合作完成该项计划。一方面

需向公众提供充分的信息，另一方面需要保密以防止向货币伪造者透露线索，必须认真维持这两方面之间的平衡。信息计划应当鼓励民众将现金存入银行。该计划必须明确，一旦启动货币改革，账户持有人能够以新货币支取现金。公众教育计划的第二个关键点是在货币改革的各个阶段及时提供信息，以防止具有临时流动性问题的银行出现挤兑。

在土库曼斯坦，央行在货币改革初期即开始开展主动的公众沟通策略。关于重定货币单位的相关术语均经过仔细的定义并提前公布。央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教育计划。全国与地方的报纸均刊载了待发行新货币的手册并配以解释性文章。此外，还向公众发送旧币与新币面值对比的口袋大小的卡片。土库曼斯坦央行还开设了热线，接听并回答企业与公众的疑问。

灯光、相机、开拍

确定新货币名称是一项具有心理性重要意义的政府决策。一种方案是保留旧币的名称或在旧币名称前加“新”，以强调与旧币的连续性。另一种方案是政府为新币确定全新名称，以强调这是与过去的分水岭以及进入全新货币时代的标志。

在土库曼斯坦，政府决定将重定货币单位的新币仍然称为“马纳特”。但为了与各国和央行的国际公约保持一致，国际标准组织变更了ISO4217三位数代码，2007年以前马纳特的代码为TMM，新马纳特变更为TMT。

纸币的印制商与硬币的铸造商均应在国际市场上通过竞争加以选择。即使有国内生产商，政府也应当要求此等厂商通过竞争获得合约。不同的国际性公司制造不同面值货币的情形也并不少见。

土库曼斯坦的纸币由英国托马斯德纳罗印钞公司印制，硬币由另一家英国公司皇家铸币局铸造。托马斯德纳罗目前正在测试以质量闻名的本地原材料土库曼棉花来制造纸币。

关于纸币艺术设计方面的决策通常总是耗时费力。设计必须融入必需的安全功能：面值越高，需要具备越先进的安全功能。此等功能通常包括水印、安全线、对印图案以及隐形数字等。纸币的大小也需要进行决策，需确定是参照美元将纸币大小标准化还是参照欧元不同面值的纸币大小不同的做法。最后还需决定色彩体系，同样需确定是参照美元将色彩标准化还是参照大部分其他国家采取不同色彩的做法。

恶性通货膨胀与汇率下跌严重降低了本国货币的价值并迫使政府以更高的面值发行纸币。南斯拉夫在1993年发行过面值达到5000亿第纳尔的纸币，津巴布韦在2008年发行过最高面值达100000万亿津巴布韦

元的纸币。在此等情形下，重定货币单位不仅是适当的，也是必要的。重定货币单位是指通过行政手段变更货币面值。就此举本身而言，重定货币单位并不变更财富价值。从技术层面而言，大部分重定货币单位的措施是以10、100或者1000为比例并且简单地将小数点左移一定数量的单位以设定新面值。此等变更措施易于向公众解释，企业也容易落实。该举措还是针对是否存在哄抬物价情形进行监管的一种明确方式。

土库曼斯坦货币改革的第一步是统一汇率。过去由于外汇缺乏，该国一直存在双重汇率体系，一种是5200马纳特折合1美元的官方汇率，另一种是约23000马纳特折合1美元的非官方平行市场汇率。

之后，政府将官方汇率贬值至6250马纳特折合1美元，并采用20000马纳特折合1美元的商业汇率，银行使用商业汇率与公众进行自由交易。两个市场于2008年5月1日成功实现统一，汇率定为14250马纳特折合1美元，符合该国国际收支良好的情形。兑换点位于客户可能希望将美元兑换为马纳特的地点，这使民众能够以接近非官方汇率的价格方便地换汇，因此扼制了对非官方市场的需求。

2008年6月初，土库曼斯坦政府发布新的外汇监管规定。按照该规定，土库曼斯坦央行开始向银行与授权换汇商提供获取外汇的快速通道，该通道随后也向以市场为主导的私人部门开放。此前央行一直通过限制获得美元的方式支持价格低到不切实际的官方汇率。央行向全国范围外汇局的广泛网络充分提供外汇的做法取缔了黑市汇率。

统一汇率自然是很重要的，当局还须将本币现代化，以使货币改革具有全面性。土库曼斯坦的现代化措施是发行一系列尺寸小于旧纸币的新纸币（旧纸币尺寸过大且不合理）。此外，还包括重新启用新的硬币。土库曼经济长期以来一直以现金交易为基础，美元极受欢迎。马纳特对美元的折合率很低，换汇时通常需要数千马纳特，民众认为不可接受。纠正此种情形的方式之一就是重定本币的货币单位。

在成功统一汇率之后，当局继续推进启用新马纳特，并按1:5000的比例重新确定面值。14250马纳特折合1美元的汇率则变为2.85新土库曼马纳特折合1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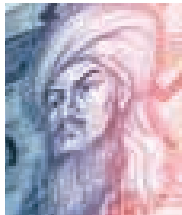
该国于2008年8月27日发布总统令并宣布于2009年1月1日启用经重定货币单位的马纳特。

即使不重定货币单位，新货币的面值结构也是值得考虑的。通常会淘汰更低的面值并增加更高的面值。一般而言是将之前发行纸币的面值转为硬币的面值。对文化与社会偏好也必须予以考虑。例如，某些国家的民众不喜使用硬币，如索马里与南苏丹等。另一些国家民众希望获得面值很高的纸币。适用于发展中国

家的经验法则是本币的最高面值不低于 20 美元折算的金额。

手里的钱

土库曼斯坦于 2009 年 1 月 1 日发行了六种不同面值的纸币：1、5、10、20、50、100 新马纳特。高面值货币大大增加，之前面值最高的纸币，即 10000 旧马纳特，现在仅折合 2 新马纳特。六种新发行的纸币大



一般而言是将之前发行纸币的面值转为硬币的面值。

小不一，均比原纸币更短更窄。纸币正面系著名的土库曼历史人物。反面和过去一样，是土库曼首都阿什哈巴德新建的建筑物与纪念碑。

与此同时，该国发行了下列面值的新硬币：1、2、5、10、20、50 腾格，2009 年新增 1 马纳特与 2 马纳特的两种流通硬币。在此之前，高通胀与巨大的汇率压力造成此前发行的硬币几乎毫无价值，此举实际上是重新启用硬币。

一旦选定新货币的设计与面值，央行必须根据总体货币需求，特别是不同面值现金货币需求的分析确定印制数量。过去对纸币与硬币需求的数据应当能够提供合理的评估数量，但必须根据公众相对外币而言对本币需求方面的最新变化对此等数据进行评估。可以从诸如托马斯德纳罗印钞公司与捷德公司等印钞公司获取纸币面额方面的技术建议。关于硬币面额的技术建议则可来自于皇家铸币局等公司。

货币改革的下一阶段是将旧的货币现金转换为新币。当局必须确定何时开始兑换，何时结束，以及是否需要设置按绝对价值计算的兑换数量上限。当局还须作出货币兑换公布与宣传方面的决策。其他关键性决策包括兑换率、金融资产、居民/非居民账户以及现有货币合同在兑换时的处理方法等。

除了央行与财政部的指导以外，还应当考虑司法部、商务部、国防部、警察机关、商会、银行代表与非正式支付系统（如在该国发挥重要作用）代表、普通民众、非政府机构以及重要媒体机构的意见。

在央行的领导下，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应当制定发行新货币的详细计划。他们必须确定兑换点（公众能够将旧币换成新币以及能够暂时存储新币现金的地点）；建设更长期存储货币的设施，如保险库、保险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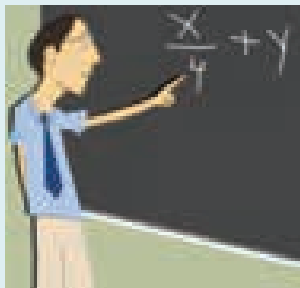
等；并且解决各种后勤问题，包括兑换点人员配置等等。

央行在其货币改革计划中必须决定如何管理即将过时的旧币。已兑换为新币的旧币应当通过标注墨点或者打孔的方式使其立即失效。在第二轮盘点之后，应当将当时已失效的货币撕毁或烧毁。此外，还需设置旧币的回收与运输的通道，央行可能会将其作为废金属出售或者最终将其熔化。

按照通用国际惯例，土库曼斯坦央行允许 2009 年流通两套货币。在 2010 年之前，在所有银行均可以将旧币兑换为新币。在此之后则停止使用旧币并仅保留其钱币价值。

IMF 的货币陈列窗由于办公楼维修的原因近期已被拆除。如果货币陈列窗得以重建并更新，届时参观者能够看到数种新货币，包括新的土库曼马纳特。■

阿克·隆纳博格（Åke Lönnberg）是 IMF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刚退休的一位高级金融专家，目前任中央银行顾问兼 IMF 的顾问专家。



什么是价格？

或许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答案可能因交易不同而有所变化

伊雷娜·艾斯门德逊

从最基本的解释来看，价格是购买者在获得商品或服务时付给销售者的钱的数量。当一个人付出2美元后得到1磅西红柿，那价格显而易见，就是每磅2美元。当现实的、可见的交易发生时，价格有时被称作交易价格或现货价格。

但价格有许多不同种类。其中一些是概念性的，如边际价格等。其他的则与潜在交易发生的时间或购买者和销售者的相对实力相关。然而，所有这些最终都与现货价格存在联系。

假设西红柿交易的形式略有变化。销售者可能表示愿将西红柿以某一价格出售，成为售价或卖价。购买者可能示意他愿出一个不同的价格，成为买价。这样交易只有在销售者将西红柿的价格定在2美元或以下，同时购买者将西红柿的价格定在2美元或以上时才可能发生。也就是说，买价至少要与卖价一样高。否则，双方都只能持有原来的物品，无论是西红柿还是钱。

市场出清

多数时候，当经济学家们提到价格时都是指市场出清价格，即在一个市场中，所有销售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数量与所有购买者需求的数量相等。总体而言，经济学家认为当价格上升时需求减少，当价格下降时需求增加。当两个价格相等或交叉时，这个价格即是市场出清价格（见图）。如果农民提高西红柿价格，较其市场出清价格高出许多，则无法将西红柿全部售完，如果降低价格，西红柿在购买者需求尚无完全释放的时候就已经售完，因此，农民只好回绝后来的顾客了。

但市场出清价格并不是板上钉钉一成不变。因为供需都可能发生变化。例如，如果所有顾客突然比以往更青睐西红柿、更愿意对相同数量的西红柿支付更高的价格，那么市场出清价格将会上升。如果西红柿

供应量下降，例如由于种植决策或天气等因素，那么市场出清价格也可能上升。同样，市场出清价格也可能随供应量增加或需求减少而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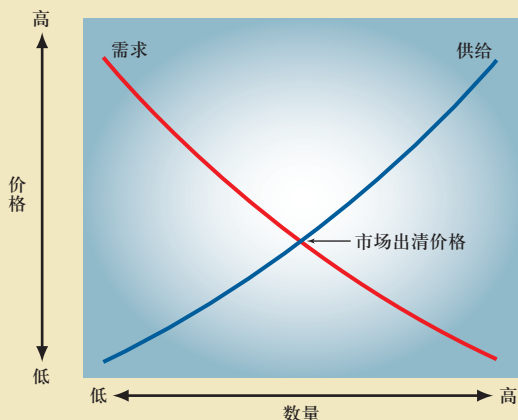
许多不同价格

以上例子假设每个人在购买相同货物或服务时都支付同一价格。但实际生活中，市场上会有许多不同价格同时存在，这些价格依买卖发生的条件而定。

假设当地超市有大量西红柿在几天之内会坏掉。超市管理人员为吸引顾客，决定降价销售。1磅西红柿仍然是2美元，但如购买2磅只需支付3美元。这样，边际价格（指增加的一个单位商品的价格，这个案例中指1磅西红柿）和平均价格就会出现不同。如果购买2磅西红柿，那么平均价格为每磅1.5美元，但边际

完美和谐

市场出清价格对于一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与供给达到平衡时的价格。



价格为第1磅西红柿2美元，第2磅为1美元。

价格也会因实际交易发生的时间和条件而不同。例如，假设一个顾客想买10磅西红柿，第二天将其挑好。约定好的未来交易价格被称作期货价格。也许农民会很高兴为其留出10磅西红柿。或者农民担心顾客会忘记，导致西红柿不能完全出售。因此他可能会要求顾客提前支付或支付一部分作为定金。如果顾客提前支付，他可能会冒农民忘记给他留出西红柿、导致他不得不在其他家到处寻找的风险。这样，价格就取决于农民和顾客赋予西红柿的相对价值。

为确定性付钱

如果顾客对得到西红柿的确定性非常看重，那么他便愿意支付更高价格。例如，这些西红柿可能用于某个喜欢吃西红柿的人的生日晚宴。但如果西红柿是用于野餐中的掷西红柿游戏，那么顾客可能会用水球或鸡蛋来代替。

假设农民有大片田地，10磅西红柿只是其日常销售中的一小部分，那么他赋予顾客出现的价值就相对较低，且他在顾客出现之前就将西红柿售完的风险也很小。顾客是否会从他那购买对他的西红柿定价而言并不重要，顾客的期货价格应与第二天预期出售的现货价格基本一致。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顾客可能都不必与农民约定期货价格。当销售者有定价权时，购买者无法讨价还价，这样销售者就是价格制定者，而购买者是价格接受者。

然而，如果10磅西红柿占到农民一天销售量的一半，那么顾客对西红柿赋予的价值就非常重要了。如果顾客想将其用于他妹妹的生日，他可能愿意支付更高的期货价格，农民当然愿意接受。如果顾客对西红柿并不非常看重，他可能不愿支付所有货款来保证供应。当顾客有许多农民的西红柿可供选择购买时，单个销售者并不能制定价格，这时销售者则变成了价格接受者。

当有许多购买者和销售者存在时，单一的市场出清价格很可能被每个人接受。

最后一种价格类型与未来选择有关。一个人可以购买在未来以某种价格交易的权利，支付所谓的期权价格。一个人作出选择支付的价格被称作期权执行价格。这个价格是在出现现货价格可能发生变化的不确定性时支付的价格。

再以西红柿的情况为例。西红柿需要炎热、干燥的天气才能成熟。如果近期天气如此，那么西红柿产量将非常丰富，价格也会相会较低。但如果预报近期有雨，那么销售者和购买者都会预期西红柿产量将下降，价格会上升（假设需求量不变）。在后一种情况下，

顾客现在可能愿意支付少量价钱（期权价格）来保证未来能以约定价格购买10磅西红柿。如果现货价格高于期权执行价格，顾客能够作出选择，以期权执行价格购买西红柿。如果现货价格更低，顾客按照现货价格支付，以节省一些钱。因此，期权价格必须足够低，才能够引导顾客为确定性付款，同时还要足够高，以期权执行价格低于现货价格时弥补销售者。

价值和价格

由于影响价格的因素很多，因此许多人努力在测试市场前制定出一个好的价格。例如，假设工程师发明了一个采摘西红柿的机器，并建立一个公司对其进行生产。由于工程师需要资金，因此将公司的所有库存机器出售以筹集资金。如果制定的价格过高，可能

实际生活中，市场上会有许多不同价格同时存在。

无法全部售出，那么也就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如果定价过低，购买者可能有幸转手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工程师必须认真权衡，使价值和价格相符。那么他在定价时应考虑哪些因素呢？

依然是供需在发挥作用。新工厂在一年内能生产多少台机器？这些机器将以什么价格出售？有多少种植西红柿的农民会购买？这将取决于西红柿的价格和采摘西红柿工人的工资水平以及借钱购买机器的成本等因素。工程师在制定机器的市场出清价格前就必须确定上述因素的价格，而市场出清价格则决定了公司库存机器的价格。库存机器的价格还取决于发明者对公司未来运营状况的预期。他们可能认为明年就能研发出大豆采摘机。如果决定发明的任何因素价格发生变动，由于收成不好或种植大豆的农民开始支付更高的价格或竞争者在第二年也发明了大豆采摘机，那么公司库存设备的价格也会发生变动。

价格的类型有多种，代表了不同的交易类型。每个价格也代表了购买者和销售者经过讨价还价后最终达成一致的价格。各方的动机以及价格都像天气一样瞬息万变，捉摸不定。■

伊雷娜·艾斯门德逊（Irena Asmundson）是加利福尼亚财政部门的首席经济学家。

透明度至关重要

国家透明程度越高，抵抗全球金融形势波动的能力就越强

路易斯·布兰多-马奎斯、加斯頓·杰罗斯、娜塔莉·梅尔加

过去 20 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全球金融市场的程度越来越高。例如，1994—2012 年期间，美国投资组合持有的、由 27 个重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实体发行的长期证券（股票与长期债券）占发行国 GDP 的份额大约增长了两倍（见表 1）。

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使新兴市场经济体受益良多，既降低了其资金成本（意味着增加了投资机会），完善了风险分担与投资组合多样化，加快了技术转让，又有助于推广投资者保护与管理的最佳范例。

然而，金融一体化的深化也使诸多此等经济体付出了代价，即此等经济体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影响的程度加深，但各经济体受影响的程度差别很大。为制定政策以降低与全球一体化程度提高相伴而来的波动性，政府必须了解国家特征如何塑造全球金融市场影

响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方式。

为此，我们对源自全球金融中心的金融冲击不断扩大时国家透明度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相对于在透明度各方面得分较差、透明度较低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透明度更高的经济体，即提供的数据更多、更及时，公司披露标准更规范，政策预期度更强，治理力度更大的经济体，其对全球市场情形趋好与趋坏的反应均没有那么强烈。

国家透明度与资本流动

许多个体国家因素会影响金融危机在各国之间传播的速度与程度。诸如银行与共同基金的共同风险敞口等金融联动关系在共同冲击与金融危机的蔓延方面

新加坡的金融区。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众所周知，金融一体化是跨国金融流动壁垒降低的结果，其在总体上也会促使金融冲击的国际性传播（Bekaert 等人，2011 年）。

然而，关于各国透明度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这点并不是很明确，透明度是指投资者对于适当评估与投资某国相关风险与回报的信息的可获取性。我们经常听到的主张是，提高透明度在吸引投资与防止资本流动波动性方面均具有益处，其理由是，透明度越高，越能够促使金融市场有序、高效地运行。透明度能够减少诸如羊群效应（即投资者仅出于跟风作出投资决策），情绪驱动性投资资金波动以及投资者对新闻反应过度等情形的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促使人们重新关注不透明度在恶化金融危机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然而，一般而言，提高透明度实际上可能会导致波动性增加，并且造成不稳定。例如，透明度可能会造成公开信息过多（因政府或市场参与者披露而获知的信息，此等信息潜在地排挤了更加精确的私人信息），

降低了信息效率并提高了波动性，在此等信息混乱（金融界的用语为存在“信息噪音”）或者与基本情形无关的情形下尤其如此。例如，及时发布初步（和不准确的）官方数据可能会导致市场参与者对此等新闻反应过度，并造成金融市场价格波动过大（Morris 和 Shin，2002 年）。提高透明度（通过降低信息成本与不对称的方式）将加快金融一体化进程，并增强市场间价格的同步波动（Carrieri、Chaieb 和 Errunza，2013 年）。

尽管有证据表明各国透明度能产生有益作用（Gelos 和 Wei，2005 年），但总体证据却模棱两可。此外，现有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危机期间金融冲击的传播问题。

我们通过研究债券与股票的价格表现，分析了国家层面的不透明度在经济周期期间是否会放大全球市场情形对本地的影响的问题。基础假设条件是，在全球金融环境良好的情形下，国际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其不了解潜在风险分布的市场（即“模糊”市场），而在全球情形恶化时则更倾向于逃离此等市场。投资者的这种行为具有多种原因。在其他投资处于良好情形时，投资者更倾向于模糊性投资。另一种可能是在经济不景气时，基金经理在证明其投资组合合理性方面需面对更加严格的监管与更大的压力，并通过回避风险不易确定的资产以降低风险敞口的方式予以应对。因此，相比不景气时期，投资者在繁荣时期更倾向于持有透明度更低的资产。另一种情形是，模糊性可能使投资者更加难以分辨根本性冲击与纯粹的信息噪音冲击，促使投资者将金融中心的良性信号与模糊市场的良好基本面相互联系。

无论出于何种理由（且各种可能性不具备互斥性），市场越不透明，在金融市场情形良好时其繁荣程度会被放大，而不景气时其衰退程度也会被放大（见图）。

表1

买入

美国投资者所持有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发行的长期证券数量日益增长，以占发行国家GDP的比例衡量。（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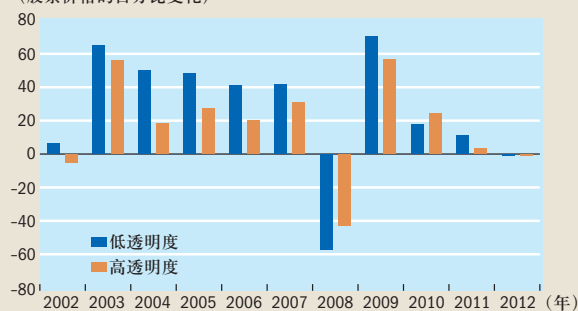
	1994年	2001年	2007年	2012年	变化 1994 - 2012年	平均TGP 2002 - 2012年
中国香港	13.38	18.92	57.34	49.86	36.48	5.71
中国台湾	0.21	6.76	20.66	18.66	18.45	5.17
南非	3.81	6.63	18.54	22.12	18.30	6.12
以色列	5.94	17.23	32.44	22.39	16.45	4.58
新加坡	9.88	25.03	38.33	24.99	15.11	4.80
韩国	1.64	6.83	13.26	15.23	13.60	3.97
土耳其	0.67	3.05	10.16	13.54	12.87	3.94
匈牙利	1.34	3.84	6.68	10.14	8.80	3.75
巴西	2.20	6.04	13.82	9.75	7.55	3.71
波兰	0.09	1.63	3.26	6.73	6.64	3.22
智利	4.84	8.22	7.41	10.22	5.38	4.97
菲律宾	3.89	5.26	9.69	8.65	4.77	3.71
哥伦比亚	0.68	2.81	3.26	5.38	4.70	4.15
秘鲁	1.03	3.10	4.05	5.56	4.53	3.70
印度尼西亚	1.22	1.15	4.25	5.13	3.91	3.51
印度	0.41	1.46	6.87	4.25	3.85	4.40
俄罗斯	0.01	3.33	6.23	3.33	3.32	3.14
埃及	0.00	0.62	8.14	1.68	1.68	3.73
捷克共和国	0.99	0.75	2.96	2.22	1.24	3.69
中国	0.37	0.23	2.78	1.60	1.22	4.32
泰国	3.67	1.38	2.60	4.60	0.93	4.29
墨西哥	12.22	7.84	10.58	12.73	0.51	3.89
巴基斯坦	0.44	0.25	1.23	0.51	0.08	3.38
约旦	0.63	1.09	0.65	0.63	0.01	4.22
摩洛哥	1.20	0.98	0.60	0.99	0.21	4.34
马来西亚	12.84	4.59	12.43	12.04	0.80	4.98
阿根廷	6.34	1.63	3.77	1.57	4.77	2.80
平均	3.33	5.21	11.18	10.17	6.84	4.75

资料来源：美国财政部，国际资本系统数据库；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CEIC亚洲数据库；EMED新兴EMEA数据库。
注：该表反映了美国投资组合对27个新兴市场经济体发行的股票与长期债券的持有情况。TGP指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政府决策透明度指数。可能的最高得分为7分。

起起伏伏

透明度最高国家的股票价格出现极端变化的情形通常低于透明度较低的国家。

（股票价格的百分比变化）



资料来源：MSCI新兴市场指数。

注：透明度基于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政府决策透明度指数。

评估透明度

评估国家透明度操作难度极大。首先，我们需要一些衡量标准，这些标准承认无法对不同事件的相似性进行精确界定。因此，我们很关注那些能够衡量所有相关信息可获得性的不透明度指数，投资者可借助这些信息评估与投资于既定国家相关的风险。其次，我们需要覆盖多个国家且往前追溯较长时间的指数。因此，我们很重视衡量腐败、治理、公司披露措施、会计标准以及政府政策与统计数据透明度等方面的指数。

为了量化全球金融冲击对新兴市场资产价格的影响，我们使用 VIX（一种评价投资者对未来 30 天股票市场波动性预测的工具）来衡量金融中心流动性情形与风险规避。在此过程中，我们将几种评价国家不透明度的衡量标准（包括公司披露程度与政府政策透明度以及对腐败的认知等更为广泛的不透明度衡量标准）作为控制变量。通过使用 1997—2011 年期间股票与债券市场的数据，我们发现相对于透明度更高的经济体，在透明度的不同方面得分较差的新兴市场对全球市场情形的反应更加强烈。

即使在我们开展了更广泛的风险、信用质量与流动性评价措施的情形下，结果依然如上所述，这具有重要意义（Brandão-Marques、Gelos 和 Melgar, 2013 年）。实际上，我们预计 VIX 每上升 10%（被认为是轻微负面冲击），政府政策最透明国家的主权债券息差（指一国购买该债券的利率与购买美国国债的利率之差）的涨幅比中间水平国家的涨幅大约低 0.4 个百分点。对比而言，透明度最低国家的涨幅比中间水平国家高 0.3 个百分点。根据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债券指数（一种跟踪新兴市场经济体向国外买方发行的债务工具总收益的指数）的评估，透明度更高国家的“透明度收益率”约为息差平均周变化率的两倍。股权的透明度收

益率更高，达到摩根大通新兴市场指数（一种对全球约 1600 支股票绩效进行评估的指数）平均周变化率的 2.5 倍（见表 2）。这几乎是一国的国际投资组合规模增

新兴市场在应对全球市场波动性时并非束手无策。

加一倍后所增加的风险敞口的三倍。定性地看，不仅政府政策的透明度会产生此等结果，上述其他透明度衡量标准也会产生这样的结果。

政策挑战

我们的研究表明，新兴市场在应对全球市场波动性时并非束手无策。希望从金融全球化中获益的国家通过更加及时地提供更多数据、完善公司披露标准、增加政策的可预见性以及更常见的提高治理水平等方式来提高透明度，能够降低其不希望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为了降低资金流动的负面效应，提高透明度是各国政府在考虑采取其他措施之前可能优先考虑采取的有效工具。■

路易斯·布兰多-马奎斯（Luis Brandão-Marques）是 IMF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高级经济学家；加斯頓·杰罗斯（Gaston Gelos）是该部门的一位处长；娜塔莉·梅尔加（Natalia Melgar）是 IMF 驻乌拉圭常驻代表办公室经济学家。

参考文献：

Bekaert, Geert, Campbell R. Harvey, Christian T. Lundblad, and Stephan Siegel, 2011, “What Segments Equity Market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 24, No. 12, pp. 3841–90.

Brandão-Marques, Luís, Gaston Gelos, and Natalia Melgar, 2013, “Country Transparency and the Global Transmission of Financial Shocks,” *IMF Working Paper 13/156*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Carriero, Francesca, Ines Chaieb, and Vihang Errunza, 2013, “Do Implicit Barriers Matter for Globalization?”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 26, No. 7, pp. 1694–739.

Gelos, Gaston R., and Shang-Jin Wei, 2005, “Transparency and International Portfolio Holdings,” *Journal of Finance*, Vol. 60, No. 6, pp. 2987–3020.

Morris, Stephen, and Hyun Song Shin, 2002, “Social Value of Public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2, No. 5, pp. 1521–34.

表2

透明度至关重要

当投资者预计市场出现波动性时，透明度最低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券息差扩大，股票价格下降，而透明度更高的国家的表现则更好。（百分比，2002—2012年）

	透明度最低	透明度最高	透明度收益	平均周变化率
债券息差变化率	0.32	0.36	0.68	184
股票价格变化率	0.16	0.18	0.34	244

资料来源：EMBIG，债券息差周百分比变化；MSCI，股票价格周百分比变化。

注：该表记录了在 VIX 指数（衡量未来 30 天股票市场波动性预期的指数）增长 10% 的情形下，相对于假设的中等透明度国家，低透明度与高透明度国家债券息差与股票价格上涨的幅度。在 2002—2003 年至 2011—2012 年期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政府决策透明度指数所衡量的所有国家中，透明度最低国家在所有国家中排在后 10%，透明度最高国家则排在前十。

选举与波动



克里斯汀·艾柏科、迪兰·奥尔可

经济学家早已对政府随意调整税收和政府支出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整体福利达成共识。

而选举是引起政策波动的源头之一。为了在连任选举中获胜，在位者可以操纵经济政策工具，其中包括通过增加公共支出、扩大政府赤字来增加总需求、创造就业（即使是短期行为），以使民众对其继续执政充满信心。

但选举前的支出增加往往会导致在选举后出现后遗症。选举结束后，政府往往会实施紧缩计划，以弥补选举前自由支出政策带来的副作用。这一由政治催生的繁荣与衰退周期会损害一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和稳定。

选举前出现的经济繁荣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Shi 和 Svensson, 2006 年）。我们重点关注低收入国家，即年人均 GDP 低于 1175 美元且无法持续地、实质性地获得国际金融市场资金的国家。

通过一组覆盖 21 年的数据，我们发现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 68 个低收入国家存在这种由选举导致的周期波动。选举前一年的支出和赤字都会增加。之后，为重建财政缓冲器，政府会削减投资支出，同时增加税收。我们也研究了两个对在位者因政治因素调整财政计划的重要的潜在制约因素，即为预算设定具体目标的财政纪律，以及包括清晰的财政目标的 IMF 项目。我们发现，这两个因素能够明显地限制政治预算周期的影响。

政治商业周期

20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的政治商业周期实证研究几乎涵盖了所有发达经济体。总体而言，研究者们没有发现明显数据来证明发达经济体存在这样的政治商业周期。然而，近期关于当前政

低收入国家
通常在大选
前会出现政
府支出扩
张，而大选
结束后则会
出现财政紧
缩

府支出、间接税收入及预算赤字的研究证明了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由政治活动导致的经济周期。

多数研究并没有明确地针对低收入国家，而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即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此外，尽管这些研究者们对大选时的具体变量进行了研究，但并未就大选后进行调整的因素提供强有力的分析。

我们之所以关注低收入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尤其容易出现与大选有关的经济周期。低收入国家的机构能力更为薄弱，预算透明度较低，可能会使在位者使用财政政策帮助其在连任选举中获胜。由于大选期间低收入国家的财政缓冲器受到损害，这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经济对负面因素的脆弱性，同时也限制了其处理外部冲击的能力，如商品价格突然出现动荡等。因此，更好地理解在低收入国家中出现的受选举影响的预算周期，并研究控制财政政策波动的途径至关重要。

选举后的几年间，通常会为重建财政缓冲器作出努力，但这是有代价的。

我们对大量低收入国家 1990—2010 年期间的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在分析选举对支出、赤字等财政变量的作用中，我们考虑了低收入国家财政情况的其他决定因素以及国家宪法没有要求的其他选举形式的作用。我们采用了各种不同的关于选举的数据，包括来自海德和马尼诺夫 (Hyde 和 Marinov, 2012 年) 的数据——这是一组包括 68 个低收入国家在 21 年间情况的数据。其中，约 50 个国家在这期间经历了至少一次选举。我们发现，低收入国家存在政治预算周期，政府在大选年份一般会增加政府支出，约为 GDP 的 0.8 个百分点。因此，整体财政赤字会膨胀。选举后的几年间，通常会为重建财政缓冲器作出努力，但这是有代价的。公共投资将下降，约为 GDP 的 0.5 个百分点 (见图 1)。尽管我们没有对其进行具体研究，这种选举后在投资方面的财政紧缩会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生产性政府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必须保持稳定。例如，一条设计良好的道路建设项目可能因为选举后的紧缩措施半途而废，这不仅造成浪费，还影响经济活动。

提高税收

我们也特别指出，在大选后的几年中，政府会加大增税努力，但以损害经济增长的方式。我们将总税收分解为不同税种，发现在大选后低收入国家政府为

重建财政缓冲器，一般会提高贸易税 (无论是进口税或出口税)。即使是在选举前支出规模较大而导致进口需求下降的情况下，贸易税收也出现上升。这可能反映了低收入国家贸易税征收相对容易，因为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通常低收入国家收税 (尤其是国内税) 的难度更大。但大幅提高贸易税可能损害一国的外部竞争力，最终使该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下降。我们的研究结果非常有说服力，即使是当我们将在位者可能操纵选举时间以获得良好的经济条件的可能性考虑在内，也同样如此。

我们并没有对低收入国家财政纪律和 IMF 项目相似性、规模及政治预算周期的构成进行实证研究。

专家们通常对低收入国家的财政纪律持怀疑态度。因此，我们通过 IMF 近期对财政纪律发布的数据，对低收入国家财政纪律的重要性进行了测试 (Schachter 等人, 2012 年)。尽管采用国家财政纪律的国家数量还在增加，国家财政纪律在低收入国家并不普遍。依靠财政纪律作为财政政策制定依据的国家有亚美尼亚、佛得角、肯尼亚和尼日利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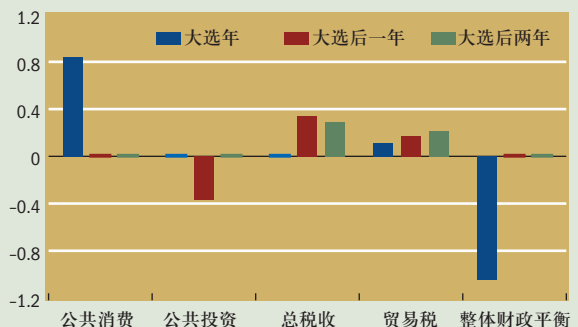
在过去十年中，许多低收入国家也有 IMF 项目。考虑到贷款与这些项目相关联的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在位者在选举年进行挥霍。

我们对国内财政政策 (如通过法律建立起来的财政纪律) 的制度约束以及 IMF 项目带来的制约进行了区分。如果国家财政纪律能够防范在位者在国内大选时扩大财政支出，国家财政纪律就可能降低因选举导致的财政操控程度。在低收入国家，本国国内的财政纪律较超主权财政纪律更加有效，且实施范围更广。超主权财政纪律一般通过货币联盟等区域协定，对该协定的所有成员国都具有同等强制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没有制定国家财政纪律的低收入国家，政治预算

图1
先是派对，然后是宿醉

低收入国家在大选年出现政府消费支出与预算赤字上升。第二年，则将勒紧裤腰带，降低公共投资。

(占GDP的百分点，1990—2010年)



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的估算。

周期对政府消费的影响约为 GDP 的 1%。而当一国制定了清晰明确的国家财政纪律，大选年份的财政扩张会降至 GDP 的 0.13 个百分点（见图 2）。

IMF 协定

此外，我们测试了参与 IMF 项目的这些低收入国家，以找出这些国家是否会因受到 IMF 项目条件的约束而导致出现政治预算周期的可能性减少。项目条件的关键因素之一是要求这些国家采取可持续的宏观经

济政策。因此，如果得到落实，这些条件会增加政府在大选期间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难度，从而限制政府财政。

有些学者提出，政府在大选期间不愿受到 IMF 协定的约束，研究也表明政府愿在大选后接受这样的协定（见图 3）。但即使在考虑了政府的不情愿及对其他与 IMF 申请项目相关的制约因素后，实证结果也证明 IMF 项目制约了低收入国家的政治预算周期。在没有 IMF 项目的情况下，大选期间政府支出约增加 GDP 的 1 个百分点，而在参与 IMF 项目的情况下，则可能降至 GDP 的 0.34 个百分点。即使在一国决定加入 IMF 支持项目时考虑经济条件与选举周期，我们的研究结果依然能够站得住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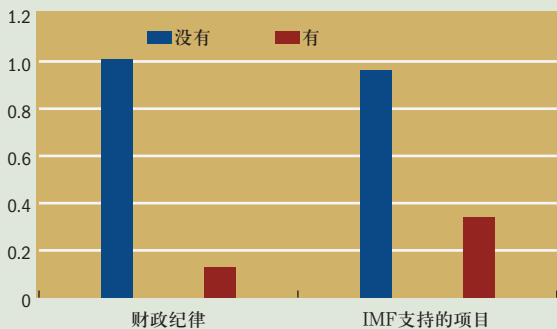
我们发现，国家选举是低收入国家财政波动（支出和税收上的变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对长期经济增长存在潜在的副作用。财政纪律和 IMF 项目可以制约政治预算周期。但至今几乎只有很少的低收入国家采用了清晰的国家财政纪律，且多数国家建立可靠的财政纪律的难度也非常大，因为其经常受到冲击（如自然灾害以及商品价格波动），这些冲击对这些国家预算纪律的破坏作用要比对经济发展更好的大经济体严重得多。IMF 项目和国家财政纪律都无法替代政府保持预算一致的政治决心。■

图2

控制政府支持的消费

财政纪律和IMF支持的项目都会抑制大选年的政府消费增长，而财政纪律的效果更佳。

（预计与选举相关的消费增长，占GDP的百分点，1990—201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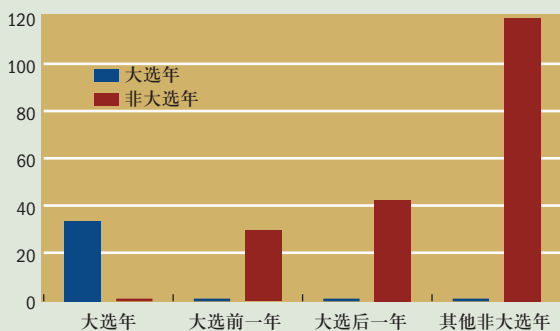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的估算。

图3

等到大选之后

政府通常在大选后接受IMF支持的项目，因为这些项目一般会限制政府的支出和借款。

（在低收入国家生效的IMF支持项目的数量，1990—2010年）



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的估算。

注：图中柱状表示低收入国家在1990—2010年间分别于大选年、大选前一年、大选后一年以及其他非大选年时拥有IMF支持项目的数量。例如，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的项目通常会持续三年。如果在大选前一年开始，则在大选前一年、大选当年、大选后一年分别算一次。如果一国在此期间有多个IMF项目，那么每个项目各算一次。

克里斯汀·艾柏科（Christian Ebeke）是IMF欧洲部的经济学家，迪兰·奥尔可（Dilan Ölçer）是瑞典中央银行的经济学家。

本文基于IMF工作论文13/153，“Fiscal Policy over the Election Cycle in Low-Income Countries”。

参考文献：

- Fatás, Antonio, and Ilian Mihov, 2003, “The Case for Restricting Fiscal Policy Discre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8, No. 4, pp. 1419–447.
- , 2013, “Policy Volatility,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95, No. 2, pp. 362–76.
- Hyde, Susan D., and Nikolay Marinov, 2012, “Which Elections Can Be Lost?” *Political Analysis*, Vol. 20, No. 2, pp. 191–210.
- Schaechter, Andrea, Tidiane Kinda, Nina Budina, and Anke Weber, 2012, “Fiscal Rules in Response to the Crisis—Toward the ‘Next-Generation’ Rules. A New Dataset,” IMF Working Paper 12/187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Shi, Min, and Jakob Svensson, 2006, “Political Budget Cycles: Do They Differ across Countries and Wh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Vol. 90, No. 8–9, pp. 1367–389.

压力之下

对资源开发进行良好的管理需要公民和政府树立正确的认识

肯尼亚图尔卡纳地区的石油钻井。

保罗·科利尔

过去，许多贫困国家出现的资源繁荣都没能持续地改变这些国家的命运，它们基本还与发现资源之前一样贫困。

过去十年中，低收入国家又出现了新一轮的资源发现，主要以石油为主。国际组织实施了三项活动，以努力确保新的资源繁荣不会重蹈历史覆辙。

- IMF 与其他经济机构开展了培训项目，以帮助这些国家政府提高技术理解能力。

- 八国集团 (G8)、二十国集团 (G20) 以及经合组织 (OECD) 正在就跨国公司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则，以防范税收外逃和行受贿。

- 非政府组织在其参与的一项由 G8 组织的活动中，正努力帮助公民提高对公共税收的监督能力。

失败的责任应由掌握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政府和开采资源的企业共同承担，而上述活动反映了对政府和公司能力与动机的一种现实批判的观点。但上述活动还远远不够。

控制资源开发的经济决策链条很长，也很复杂。这也是政府为什么需要进行大量的专业能力建设。但

如果说政府需要强化自身的认识，那么民众也同样如此。民众不仅仅限于监督那些税收数字。如果没有正确认识，民众会向政府施压，以民粹主义的姿态要求政府分配新资源财富。普通民粹主义者在发现资源后的反应是，向政府施压，要求提高公共部门工资。1974年，尼日利亚是第一批经历石油繁荣的贫困国家之一。第二年，在民众的高度期待下，政府被迫将公共部门工资提高75%。2012年，肯尼亚又重演了同样的一幕。

资源民粹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要求为中产阶级提供廉价的汽油。2012年，尼日利亚经济改革者们欲叫停当年为照顾民众情绪而作出让步的能源补贴计划，结果引发了暴动。2013年，苏丹继续步尼日利亚的后尘。普通民众支持将资源税收作为补贴分发给所有民众，而有些评论员对普通民众作出良好决策的能力很有信心。蒙古国采取了这一方式，结果导致资源并没有按照合理的比例进行分配。选民向各政党施压，政党们为获得选票竞相为民众提供最大限度的补贴，结果导致国民收入的一半被分散出去，远高于政府获

得的资源收入。

以上事例揭示了，民众不会自发地了解如何对资源开发进行良好的管理。那些贫困的小国基本上没有专业的经济类报纸杂志，来帮助民众树立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因此，政府应弥补这一空缺。正如公民有责任监督政府如何使用资源税收，政府也有责任帮助民众树立资源税收的管理需要非凡的经济决策这一认识。

过去十年间，政府努力帮助民众树立监督政府的认识，并得到广泛关注。《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以及该行业公司有义务向政府汇报其支出是这一领域取得的两项里程碑式的成就。但在政府努力与民众沟通、树立民众的正确认识方面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甚至许多国家政府也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是政治领导的一项基本工作任务。但在石油发现后，在位的政治家一般都没有可供学习借鉴的国内经验。此外，尽管国家领导层会从全球范围内广泛邀请发现石油后如何管理的经济学家提出意见（见专栏），但在国际范围内还没有关于树立公民正确认识的这类专家团队。国际金融机构（如IMF和世界银行）给出的专业的经济政策建议也主要是由技术专家提出的，并且对象也是技术专家，根本没有考虑如何被民众接受。同时，公关公司向政治家们提出的专业沟通建议一般主要关注短期政治，而非长期的自然资源管理经济学。

决策者在帮助民众从现实的角度认识发现石油对其自身和整个社会福利的影响时，有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广泛传播正确认识

大众传媒工具中，新闻最为直接：“我们发现石油了”这一新闻报道会快速传播开来。但大众传媒工具对传播正确认识却要困难得多。许多成年民众离开课堂很长时间了，缺乏耐心来消化吸收冗长的报告。因此，编写这样的信息内容并同时确保其能广泛传播，与制定高技术含量的经济决策一样，都极富挑战性。许多贫穷国家的媒体沟通模式还仅限于提出观点。但观点

发现资源后

40年的学术研究对发现石油资源后决策者应采取何种措施已经有了成熟的意见。从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而获得的收入有其自身特点：这部分收入不稳定，也就是会随着资源的枯竭而消失。为解决这种不稳定性，应节省部分收入以备不时之需，为资源枯竭做好充分准备。同时，应积累其他资产，以便在自然资源耗尽时，国家能通过新资产获得的额外收入保持正常的支出规模。

通常可以灌输一种理想目标，却不能灌输对实现这一理想目标的过程的正确理解和认识。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应采用叙事的方式。观点是静态的，叙事则是在讲故事，而故事是使民众了解改变过程的精神媒介。

石油的发现常常引发民众不切实际的期待。

合理管理石油开发带来的意外之财取决于诸如为未来储蓄等贫穷国家认为极具挑战的事情。优秀的领导人能够抓住故事中重要的信息。二战中，英国需扩大粮食种植。时任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用了一句简单的话解释道：“为胜利而种”。当博茨瓦纳发现钻石时，当地民众面临同样的挑战。其领导人塞雷茨·卡马爵士(Sir Seretse Khama) 同样找到一句绝妙有效的話。

叙述语言应得到广泛传播，而政府不可能当下就让所有民众全部知晓。故事的传播需要借助传播网络。专家们发现叙述传播的成功主要依靠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人物。究竟哪些人属于这个群体依照不同的社会及叙述语言的内容而定。要使具有批判精神的那部分民众树立石油开发的正确认识，就不应依靠媒体口号，而应通过找到适当的叙事表述，同时增加对传播网络的了解。

石油和天然气（通常随石油一起被发现）有三个特征，这使得与民众对该问题的有效沟通较其他多数经济问题而言难度大大增加：

- 油气发掘通常让人联想到无需努力就可获得财富。
- 化石燃料没有天生的所有人。
- 资源最终会耗尽。

石油的发现常常引发民众不切实际的期待。存在这个问题的不仅限于贫穷国家。1966年英国发现石油时，讽刺类杂志《笨拙》(Punch) 刊载了一副预言未来的漫画：两个流浪汉并肩而坐，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当时我们发现北海石油时，觉得工作毫无意义可言。”

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可能会很快为政府带来问题。2012年3月，一家石油公司宣布发现了石油，预计在肯尼亚北部。那种情况下，无法知道这次发现是否具有商业可行性——即使在最好的情形下，也至少需要四年时间才会出油。但就在第二个月，公共部门的工会已经提出了大幅加薪的要求。

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可以通过对基本事实的简短陈述来予以回绝。心理学家发现，事实的阐述方式不同，人们对此的反应也相去甚远。例如，2013年埃克森美



博茨瓦纳吉瓦能钻石矿厂。

孚公司向利比亚支付了5000万美元以取得勘探权。对于普通利比亚民众来说，5000万美元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应现实地讨论一下，如果这笔钱平均分配，每个利比亚人仅能得到12美元，而这12美元能买到什么。如果这样来描述这件事，利比亚民众或许能够理解埃克森美孚公司支付的这笔钱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对于肯尼亚来说，应向民众沟通的基本事实不是每人能分到多少钱，而是该国落后的状况和面临的不确定性。有些人用“不要高兴得太早”来回复之前那种不成熟的涨薪要求。

不存在所有人

沟通策略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石油的另一个特点：自然资源没有天生的所有人。没人声称因此前将石油埋藏在地下而对其拥有所有权。然而，由于石油价值很高，因此对其所有权必须达成一些基本共识。心理学根据以往经验得出明确结论：人们倾向于接受符合自己利益的观点。除非在发现前建立起明确的所有权，否则从原则上来说，任何自然资源的所有权都是可以争取的。因此，民众将选择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基本原则作为所有权理论的基础。离发现石油位置最近的居民认为当地对石油拥有所有权，而其他地区民众则声

称国家拥有所有权。对有些国家而言，所有权归属的规则已达成共识，但对许多贫穷国家而言，相对较新的国家认同经常与古老而根深蒂固的地区认同发生冲突。

以坦桑尼亚为例。由于建国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的努力，坦桑尼亚较多数非洲国家而言，具有较强的国家认同感。支持地区利益的思想未能占据上风，各民族之间明白如何合作。此外，坦桑尼亚政府在开放天然气勘探时，仅出售了离岸石油区域的勘探权。由于坦桑尼亚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且没有境内勘探，政府理所当然地认为发现的天然气属于国家财富，这一点不言自明。

2012年，石油公司在姆特瓦拉地区东南沿岸以外的海域中发现了天然气。该国民众的反应诠释了即使在一个国家认同感如此强的国家，先发制人的沟通策略也至关重要。当地民众并非从政府公告中得知这一消息，而是通过推特(Twitter)从公开贸易公司了解到的。因为按照法律，公开贸易公司必须在发现石油或天然气后立刻公之于众。当消息传到姆特瓦拉，这意味着数万亿立方英尺的土地将带来数万亿美元。公众的想象彻底疯狂了：关于每户居民每月将收到200美元的谣言广泛流传。正如《笨拙》(Punch)杂志漫画中的流浪汉一样，当地青年立即声称他们不用再继续工作了。更为严重的还在于，姆特瓦拉当地居民声称他们拥有所有权，并对发现的天然气属于整个国家这一论调非常愤怒。事实也是如此，当地居民因坚信他们的权力受到侵犯而发动了暴乱：2013年5月，有四人被杀害。如果说坦桑尼亚由于海上天然气的发现引发了这些问题，那么贫穷国家就更没法幸免了。

那么，沟通策略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预料到会出现归属问题并在一开始就将其解决。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政府也需要引导公共情绪。因为高价值的自然资源可能蕴藏在一国的任何地方，无论发现什么都是属于这个国家的，每个公民应就这一点达成共识。

博茨瓦纳的成功

博茨瓦纳是少数在自然资源管理中取得成功的国家之一。博茨瓦纳的成功证明，这是可以实现的。该国第一任主席卡马想出了一句非常简单的话：“我们一无所有，因此我们同意我们所发现的任何财富都归大家所有。”这句话通过网络广泛传播。卡马游历全国各地，说服所有部落首领同意这一观点。只有在发现财富以前，“天真的面纱”存在的前提下，才能达成此类共识。如果民众在发现之前没有就所有权规则达成一致，当本地所有权和全国所有权发生冲突时就会引发冲突。

石油使得沟通策略显得重要的另一特点是其不可再生。由于采掘耗尽了资源，因此税收也不会持久。在非洲发现资源的案例中，所发现的资源基本上在一代人当中就会耗尽。此外，快速的人口增长降低了人均财富。例如，假设石油财富在50年内耗尽。如果人口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25年后人均财富就会减少70%。而石油未来的价值还要取决于其价格。由于气候问题，全球政策可能会控制碳排放，那样，几十年之内，这些储存的石油将会变成“搁浅的财富”——因税收和监管规定而变得毫无价值。

由于这只是暂时的收入来源，因此应将其一部分用于其他资产的积累，以保障采掘期间的支出规模（见“获取资源收入”，《金融与发展》2013年9月号）。拥有自然资源，节省收入的教训就更有道理了，因为石油不仅属于现在这一代人。如果现在这代人将石油收入挥霍在不可持续的消费中，那么下一代将会抱怨他们的父母不负责任。这就是“我们不必再工作了”这样的语言危害巨大，使大家不能相信它的原因所在。对于一个贫穷国家而言，无需通过努力就能获得新财富不会使工作的必要性下降。反而，石油为民众通过积累收入来改变国家贫穷的命运提供了唯一的机遇。当博茨瓦纳发现钻石以后，政府马上提出了一句流行的口号：“我们贫穷，所以我们必须负重前行”。在必

须负重前行的共识下，政府用于投资的收入比例较以往其他非洲国家高得多。博茨瓦纳从该地区最贫穷的国家行列迈入了最富有的国家行列。而这正是许多贫穷国家政府面临的问题。通过有效沟通，博茨瓦纳使其民众自身定位为“后代机遇的管理者”，而非一次盛宴幸运的受邀人。从本质上而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优秀的管理”。

为取得良好的效果，描述语言必须辅以传播网络。而有时最适当的策略取决于权力机构的架构，对于博茨瓦纳则是指那些部落首领们。但有时则取决于信息本身的内容。“优秀的管理”这样的描述语言恰好与许多宗教信条相呼应。在多数贫穷国家，宗教组织完善并在人民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发现的石油进行良好的管理这一理念也会通过教堂和清真寺进行传播。

谨慎的政府应在发现资源以前做好充分准备，有目的地通过语言和传播网络树立民众的正确认识。因此，应在勘探以前就解决好所有权的问题，并通过陈述易于理解的事实来击碎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是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治学院的经济与公共政策教授、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COLUMBIA | SIPA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PROGRAM I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PEPM)

Confront global economic challenges with the world's leading economists, policymakers, and expert practitioners, including Jagdish Bhagwati, Guillermo Calvo, Robert Mundell, Arvind Panagariya, and many oth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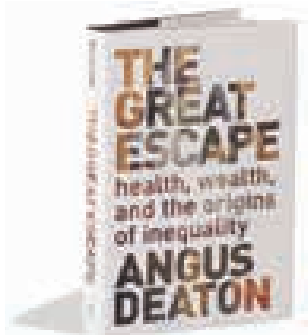
A 14-month mid-career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ocusing on:

- rigorous graduate training in micro- and macroeconomics
- emphasis on the policy issues faced by developing economies
- option to focus on Economic Policy Management or International Energy Management
- tailored seminar series on inflation targeting,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financial crises
- three-month capstone internship at the World Bank, IMF, or other public or private sector institution

The 2014–2015 program begins in July of 2014. Applications are due by January 5, 2014.

pepm@columbia.edu | 212-854-6982; 212-854-5935 (fax) | www.sipa.columbia.edu/academics/degree_programs/pepm
To learn more about SIPA, please visit: www.sipa.columbia.edu

协助及教唆



安格斯·狄顿

大逃亡

健康、财富以及不平等现象的起源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3年，360页，29.95美元（精装）。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格斯·狄顿（Angus Deaton）的这本书讲述了从史前时期到现代社会美国 and 世界各国在健康和物质财富方面的发展史。其用词典雅，涉猎广泛，内容引人入胜。

“大逃亡”这三个字从字面意义上来说指的是脱离贫穷和疾病，地球上的一小撮人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大部分人正在实现这一目标，还有极少一部分不幸的人尚未开始这一进程。阅读本书就像经历一次人人都可参与的美妙旅行，旅程中可以倾听国际权威专家解读全球健康和收入数据。此外，对这些数据中包含的假设、偏见以及缺陷的讨论同样会为您带来美妙的阅读体验。本书很大一部分篇幅都可以视作是对我们的警告：所有的经济、健康数据都难免有不完美的地方以及诸多不确定性，不能过于相信。

发出警告之余，狄顿还在书中简要介绍了全球发展的历史、所处的程度以及促成发展的主要原因。更重要地是，他在书中指出摆脱高死亡率和摆脱贫穷两者之间的关系

微乎其微。在西方国家，私人财富的增长并不是健康状况改善的主要原因。相反，公共服务的完善，例如水的供应和卫生条件的改善，才是健康状况改善最直接的原因。如果问过去50年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增长速度更快的国家的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速度也是最快的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作者或许应该修改一下本书的书名，因为“大逃亡”这三个字会让人以为仅仅只是一次逃亡。

狄顿指出，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的国家以控制全球人口为名，犯下了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罪恶。而这又让人关注到另一场逃亡：各个国家都已经逃脱了前工业革命时代的马尔萨斯陷阱，人口增长不再和收入下降以及健康状况恶化联系在一起。

如果回头看看狄顿关于我们认知界限的论述，那些想要通过简单的政策方针来促进一国（这些国家处于全球争端中错误的一方）收入增长，或全球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人士可能要大失所望。书中，狄顿谈到了寻求“增长的秘诀”（也可以说是经济萧条的秘诀）这一行为的愚蠢之处。他说，这些行为试图“依靠巧合来对事情进行错误的概括。这种伎俩伊特努里亚和罗马地区的巫师拿一堆鸡杂碎作法也能办到”。狄顿还认为，为精英量身定做的机构“不利于增长”。这也是促使本书关注不平等现象的原因之一。

不过，在帮助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方面，《大逃亡》这本书却给出了详尽的政策建议：减少援助预算。狄顿说，补助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大方的补助实际上还会“阻碍进步”。它会腐蚀政府机构，让统治者在无须征得人民同意的情况下便可进行统治，因为他们不用对公民征税。但是，他也支持某些形式的补助，及提供该补助的方式：比如为新技术开发（包括药物开发）提供资金支持。他还指出，“外部补助挽救了贫穷国家数以百万计的

生命”，尤其是降低了儿童因传染病而死亡的数量。但是，即便是补助，由于其无助于建立基本的医疗体系，在健康方面的作用仍然有限。

想要论证补助在总体上对贫穷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着实不易。狄顿认为，世上还有其他更加强有力的政策工具能够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包括移民、贸易自由化、补贴改革等等。许多，甚至有可能绝大多数的补助，都在过去白白浪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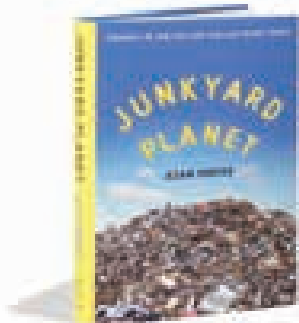
但是与此同时，目前也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能够证明补助带来了负面的影响。IMF工作人员最近的研究（IMF工作论文12/186）指出，在政府执政水平低下的贫穷国家，补助和税收是一比一的替代关系。但是对于普通的补助接收国而言，1美元额外的补贴仅仅能将政府征收的税款减少9美分。有证据显示，即便是在管理不力、依靠补助为生的国家，补助有时也能帮助建立基本的医疗体系。2004—2010年，阿富汗居民的人均寿命从42岁提高到了62岁。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资助，阿富汗卫生部管理的一个救济项目。该项目为90%的阿富汗人提供了基本的医疗服务。

各类补助已经挽救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许多国家覆盖诸多领域的补助项目也都取得了成功。尽管仍有不少项目遭遇了失败，但是这恰恰是改革补助体系的理由，而不应该成为削减补助的借口。这些改革，连同移民数量的增加和贸易公平的改善，能帮助数以百万计的人摆脱赤贫和疾病，这一点已经在狄顿的研究和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地说明。

查尔斯·肯尼
(Charles Kenny)

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作家，著有：《越来越好：为什么全球发展能够取得成功以及我们如何让世界变得比以前更好》

回收让未来更精彩



亚当·敏特

垃圾星球

行走在价值10亿美元的垃圾贸易之间
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 纽约, 2013年,
304页, 27.50美元(精装)。

我们都知道, 在恐怖电影里被吸血鬼咬过的人也会变成吸血鬼。亚当·敏特(Adam Minter)的这部作品中也有类似的例子: 环境污染会把无辜市民变成制造污染的人。在这部关于垃圾的游记中, 作者考察了全球的垃圾产业。他造访了中国文安。文安是中国塑料废品回收产业的中心, 来自中国, 乃至美国、欧洲的塑料废品都在此回收。废品回收威胁着当地居民的健康, 因为回收的过程会产生有毒物质。中风、高血压等疾病在这里比比皆是, 居民人均寿命普遍较低。

文安人还记得, 过去他们这里曾是一片满目青翠的乐土, 桃树和清澈的小溪远近闻名。但是后来缺乏监管的石油产业带来了工业污染, 破坏了原本纯净的溪水和土壤, 农民从此再也无法种植农作物, 文安人只能靠处理垃圾废物为生。敏特在书中提到, 文安可能是他所到访的地方中污染最为严重的一处。而大部分的垃圾废物来自于他的祖国——美国。

敏特的父亲是明尼苏达州的一

名废品经销商, 敏特本人则是一名记者, 目前驻扎在上海。他本人对垃圾场很有好感, 对他目前这份报道垃圾处理的工作也非常满意。尽管有人更乐意保护熊和鲸鱼, 敏特却坚称垃圾场也是地球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然而, 本书并没有刻意渲染环境污染的可怕, 也没有落入吹嘘环保生意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俗套。它是对废品回收产业一次深思熟虑的审视, 一方面, 它强调回收产业很重要, 能够吸引有创新意识的创业家进入这个行业; 另一方面, 它也指出回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污染和破坏。

材料回收可以节能。比如说, 铝这种材料如果从矿石中提取会非常耗费能源, 但是如果从废品中回收的话, 所需要的能源就少得多。敏特同时指出, 采矿往往涉及到居民的重新安置和对当地生态系统的破坏。但他并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 即把废物从欧美运到中国一定意味着对后者的剥削, 这可能是本书颇受争议的地方。敏特认为, 中国公司回收废物的积极性很高, 因为废物回收为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提供了原材料。尽管有文安等地方的例子在先, 但是监管和回收技术的改善正在逐渐减少这一行业所带来的破坏。

不过, 虽然对于在旅途和采访中遇到的各类废品回收商, 敏特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感。他却也坦言垃圾回收并非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我们把易拉罐放进回收箱, 可能会觉得自己很高尚, 但是敏特却说, 我们只不过把废品回收外包给了其他人而已。更糟糕的是, 敏特引用科学研究说明, 回收会让我们比以前更加浪费。)

再利用比再回收要好, 一开始就不使用则最好。虽然本书可能会被解读为对市场的热情赞颂, 但是它对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却持批评态度。每当一名企业家进入废品回收行业, 都意味着有一件产品被人弃置, 而这些产品一开始是不应当

被扔掉的。不过, 这么做却对产品的制造商有利。敏特在作品中强烈建议制造商延长科技产品的使用寿命, 并且使其适于改装, 而不是最后扔掉了事。如果我们想要显著减少对环境的整体损害, 最好这么做。

亚当·敏特让我们想起了已故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丽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她是第一位获此奖项的女性(见《金融与发展》2011年9月号中对她的采访)。她研究了所谓的“公地悲剧”, 发现公地非但没有陷入悲剧, 反而常常在当地居民处得到了精心地保护。埃丽诺不相信环境末日这类假设性的模型, 相反, 她专门研究了

但他并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 即把废物从欧美运到中国一定意味着对后者的剥削, 这可能是本书颇受争议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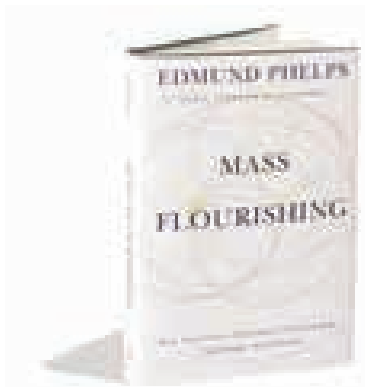
人们解决生态问题的创意方法。敏特虽然不是研究人员, 但是却有着和奥斯特罗姆类似的视角, 他询问人们具体的操作方法, 提倡实践出真知, 反对先入为主的观念, 并且指出越是简明的方法, 越能轻易解决问题。

《垃圾星球》这本书读起来引人入胜, 让人爱不释手。微言大义, 更像是小说, 而非枯燥无味的大部头。焚烧和填埋绝非是解决我们扔垃圾恶习的长久之道, 但是回收也并非像其表面上看上去那样, 永远都是环保的选择。

德里克·沃尔
(Derek Wall)

英格兰和威尔士绿党国际协调专员、
作家, 著有《埃丽诺·奥斯特罗姆可
持续经济学》

对现代经济的 几点古典建议



埃德蒙·费尔普斯

大众的繁荣

草根创新如何创造就业、带来挑战和变革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3年，392页，29.95美元（精装）。

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的这部作品是专门为我们所处的时代而创作的。它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宣言。本书的篇幅不长，但是提出了很多新颖大胆的观点。作者的文字时而鼓舞人心，时而又愤世嫉俗、咄咄逼人。作者热情赞颂亚里士多德的道德观念和思想原理，也非常赞同他对于现代经济的看法，即现代经济制度的终极目标应当是 eudaimonia（希腊语）。这一概念常常被翻译为“幸福”，但是不少当代作者却认为，eudaimonia 指的是一种程度更高的繁荣。本书的另一个核心观点是生机论。生机论能够驱动创新，而创新在费尔普斯看来恰恰是现代经济的基石。

费尔普斯认为，20 世纪初的欧洲和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的美国，都是日益猖獗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m）的受害者。社团主义这一概念由费尔普斯首创，指的是公共部门日益膨胀、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项目增多、强大的工会、有实力的雇主和大公司同流

合污这一社会现象。结果，官僚主义出现了，而创新则越来越不为人们所重视。作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偏激地认为美国已经遇到了和当前希腊同样的问题。

和本书内容最接近的一本书可能是约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那本基调阴郁的作品《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1942 年出版）。和熊彼得的书一样，《大众的繁荣》很难在传统的政治领域下找到其分类。这本书既不同情左翼分子支持建设福利国家的观点，也不认同传统的价值观。在费尔普斯眼中，传统价值观似乎就是一些崇古的、没有商业价值的观念，比如利他主义。在其中某一个章节，费尔普斯试图用实证的方法说明为什么传统社会工作满意度较低。他认为，传统价值观的持续存在是发达经济体中所存在的危险社团主义倾向的根源。

书中各个章节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人类的创新能力进行了阐述。对经济史的研究揭示了过去两百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石——敢于冒险。另一章则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三种不同的制度：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社团主义在经济活动中的表现（尤其是工作满意度）。还有一章从哲学或理论角度阐释了资本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的思想体系，并将其与传统主义进行了比较。

费尔普斯认为，传统主义的支持者害怕变革和危机，并且在政府和国际组织中比例过大。作者一度反对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家推行所谓的“平衡增长”。他告诫 IMF 不必担心全球失衡，或者一心想着预防危机。否则的话，就说明“IMF 忽视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转良好的基本原理”。

费尔普斯在书中集中讨论了文化，还讨论了如何通过衡量文化来解释经济增长。但是，他也看到了差距：“现代思想”起源于 1500 年，但是“现代经济”却是在拿破仑战争后才出现的。他认为，只有采用全新的视角，即多数人都勇于冒险，勇于创新（而不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个创业家），才

能带来现代经济的增长。

书中，费尔普斯对一些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比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在 1776 年不可能理解技术发展带来的可能性）、德国传统经济学（过于强调制度的作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他对禁欲和储蓄更感兴趣，而不重视“试验、探索和未知能力”）、熊彼得（他重视英勇的创业家，但是沿用了德国传统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及乔尔·莫克（Joel Mokyr，他过分强调科学的作用以及工业革命的起源）。和现代经济学史学家的看法一致，费尔普斯也认为 1800 年之前的世界大体上进入了停滞状态，收入没有显著增长。但是奇怪的是，他在书中却只字未提当今世界对于 1800 年之后变革最为通行的解释，即从自然资源中获取的能源取代了人力和畜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化石燃料。

在书的最后，费尔普斯得出了惊人的结论，却令人振奋。它包含了多元的价值体系。有的人可能将现代主义思潮作为生活方式（该思潮应当包含再分配的观点，以保证结果公平）。有的人则更倾向于传统主义观点（即在家庭或社区上投入更多）。后者不应当从任何再分配正义的观点中获益。对于那些想要追求被费尔普斯认为是非亚里士多幸福生活观的人来说，再分配原则应当将其排除在外（因为他们“在可再分配的社会剩余的的生产过程中，不是合作的一方”）。再分配原则的基石是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社会公平理论。两种思潮非比寻常的目标差异旨在说明传统仍然可以为当今世界所容纳。但是这种差异却和这本书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不太吻合，即对熊彼得现代经济自我毁灭动态这一观点的革新。

哈罗德·詹姆斯

（Harold James）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和国际关系学教授

A

- Khaled Abdel-Kader, 回归基础: 什么是结构性政策? 3月号
- Hites Ahir和Prakash Loungani, 图表释义: 全球房价节节攀升, 12月号
- Masood Ahmed, 实现共同繁荣, 3月号
- Nada al-Nashif和Zafiris Tzannatos, 但求公平, 3月号
- Rabah Arezki和Marc Quintyn, 发展的程度, 3月号
- Rabah Arezki、Gregoire Rota-Graziosi和Lemma W. Senbet, 资本外逃风险, 9月号
- Irena Asmundson, 回归基础: 什么是价格? 12月号

B

- 回归基础: 什么是结构性政策? 3月号; 什么是影子银行? 6月号; 什么是产出缺口? 9月号; 什么是价格, 12月号
- Ravi Balakrishnan、Chad Steinberg和Murtaza Syed, 致命弱点, 12月号
- Adolfo Barajas和Ralph Chami, 金融方面的思考
- Jagdish Bhagwati, 新体系的黎明, 12月号
- Mark Blackden和Mary Hallward-Driemeier, 蓄势待发, 6月号
- Nicholas Bloom、M. Ayhan Kose和Marco E. Terrones, 因不确定而掣肘, 3月号
- Luis Brandão-Marques、Gaston Gelos和Natalia Melgar, 透明度至关重要, 12月号
- Niccole Braynen-Kimani、Glenn Gottselig、Lika Gueye、Yusun Lee和Maureen Burke, 她们成功的秘密, 6月号
- Maureen Burke, 经济学人物: 克里斯蒂娜·罗默, 3月号; 彼得·布莱尔·亨利, 12月号

C

- Ralph Chami和Connel Fullenkamp, 本国之外, 9月号
- Stijn Claessens和Juan A. Marchetti, Global Banking Regroups, 12月号
- Paul Collier, 压力之下, 12月号

D

- Philip Daniel、Sanjeev Gupta、Todd Mattina和Alex Segura-Ubiergo, 获取资源收入, 9月号
- Mitali Das和Papa N'Diaye, 廉价劳动力的终结, 6月号
- Jacqueline Deslauriers, 液体黄金, 6月号

E

- Christian Ebeke和Dilan Ölçer, 选举与波动, 12月号
- Luca Errico、Goran Amidzic和Alexander Massara, 数字聚焦: 具有包容性的亚洲, 3月号

F

- Lily Fang, 联接华尔街, 6月号
- Davide Furceri和Prakash Loungani, 谁让基尼系数飙升? 12月号

G

- Chris Geiregat和Susan Yang, 过犹不及, 9月号
- Peter H. Gleick, 珍惜每一滴水, 9月号
- Glenn Gottselig, 图表释义: 未来的矿产, 9月号

H

- Thomas Helbling, 非常规油气开采蓬勃发展, 3月号; 如履薄冰, 9月号
- Hideaki Hirata、M. Ayhan Kose和Christopher Otrok, 区域影响, 9月号
- Bernard Hoekman, 附加价值, 12月号
- Mark Horton和Jonathan Dunn, 欧亚大陆的下一道曙光, 9月号

J

- Sarwat Jahan和Ahmed Saber Mahmud, 回归基础: 什么是产出缺口? 9月号
- Sarwat Jahan和Ke Wang, 小国家, 大问题, 9月号

K

- Herman Kamil和Jeremy Zook, 失而复得, 3月号
- Tümer Kapan和Camelia Minoiu, 信贷体现的实力, 9月号
- G. Andrew Karolyi、David T. Ng和Eswar S. Prasad, 未来潮流, 6月号
- Laura E. Kodres, 回归基础: 什么是影子银行? 6月号

L

- Christine Lagarde, 直言不讳: 敢于不同, 6月号
- David Lipton, 直言不讳: 把握契机, 3月号
- Åke Lönnberg, 新货币, 12月号
- Prakash Loungani, 经济学人物: 史丹利·费希尔, 9月号

M

- Paolo Mauro、Rafael Romeu、Ariel Binder和Asad Zaman, 审慎, 还是挥霍, 6月号
- Ann Mari May, 视线不同, 6月号
- Marwan Muasher, 自由与面包可以兼得, 3月号

N

- Vali Nasr, 观点: 不同以往, 3月号
- John Norregaard, 公平的评估, 12月号

O

- Hiroko Oura和Liliana Schumacher, 跑步机上的银行, 6月号

P

- Rohini Pande和Petia Topalova, 女性掌权, 6月号
- 经济学人物: 克里斯蒂娜·罗默, 3月号; 卡门·M.莱因哈特, 6月号; 史丹利·费希尔, 9月号; 彼得·布莱尔·亨利, 12月号
- 图表释义: 贸易、增长与就业, 3月号; 平等对待, 6月号; 未来的矿产, 9月号; 全球房价节节攀升, 12月号
- 观点: 不同以往, 3月号

R

- Natalie Ramirez-Djumena, 图表释义: 平等对待, 6月号
- James L. Rowe Jr., 经济学人物: 卡门·M.莱因哈特, 6月号

S

- Sebastián Sosa和Evrídiki Tsounta, 前景堪忧, 9月号
- Janet G. Stotsky, 职业女性, 6月号
- 直言不讳: 把握契机, 3月号; 敢于不同, 6月号
- Amadou N.R. Sy, 首次借款, 6月号

V

- Thierry Verdier, 智力贸易, 12月号

W

- Andrew Warner, 经济复兴如雾里看花, 9月号

书 评

- Anat Admati和Martin Hellwig, 《银行家的新装: 银行业, 你怎么了? 我们该拿你怎么办?》, 3月号
- Stephen Bell和Hui Feng, 《中国人民银行的崛起》, 9月号
- Jagdish Bhagwati和Arvind Panagariya, 《经济增长缘何是关键: 印度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及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意义》, 6月号
- Angus Deaton, 《大逃亡: 健康、财富以及不平等现象的起源》, 12月号
- Robin Jeffrey和Assa Doron, 《印度电话大全》, 3月号
- Adam LeBor, 《巴塞尔大厦: 一家神秘银行操纵世界的阴暗历史》, 6月号
- Adam Minter, 《垃圾星球: 行走在价值10亿美元的垃圾贸易之间》, 12月号
- Edoardo Nesi, 《失落的普拉托》, 6月号
- Edmund Phelps, 《大众的繁荣: 草根创新如何创造就业、带来挑战和变革》, 12月号
- Benn Steil,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战斗: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以及创建新的世界秩序》, 3月号
- Juan C. Zarate, 《财政部的战争: 新一轮金融战争爆发》, 9月号

免费试读我们的 最新出版物



我们的出版物内容涉及
中国、能源补贴、全球
经济学、非洲等等。



elibrary.imf.org/page/free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Finance & Development, December 2013 - Chinese \$8.00



MFICA2013004